

毛泽东之子

毛岸龙



阿银马建 著

一条龙，一个谜

有人说他夭亡
有人说他神经
有人说他失踪

.....

现在他突然以一个矍铄
老人的形象出现了
其中的曲折和苦难就是
本书的内容

古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K827=7

M33/A 毛泽东之子



毛

岸

龙

阿
银

马
建

FG14/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1 号

毛泽东之子：毛岸龙

阿银 马建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新城西街 82 号)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香港南丫岛宝华园 85 号二楼 A 座)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内蒙古天伦彩印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60 千 插页：2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204-02035-9/I·347 定价：6.00 元

(ISBN 962-497-159-5)



1943 年秋在浙东纵队五支队任一中队文化教员及在大队部任文化干事。

▲ 1938 年 8 月，音乐家章枚团长来教我们唱新四军军歌，此照是由叶挺军长抓拍的。前排左是我，中间是叶正明，右是叶正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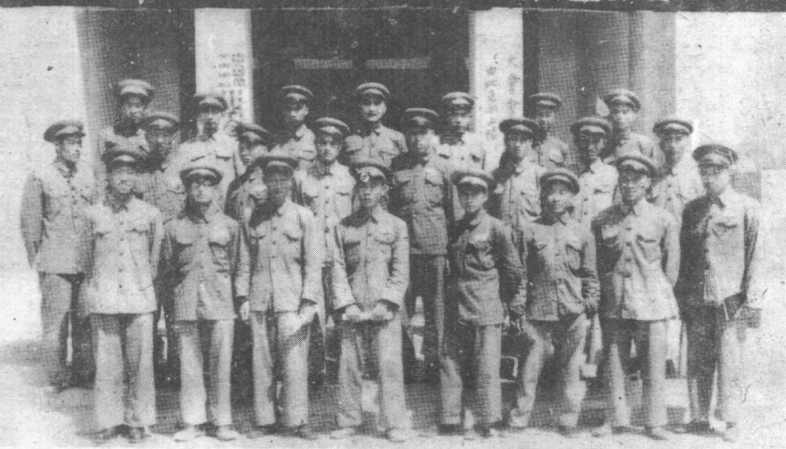
◀ 母亲杨开慧之墓碑，1930 年冬男岸青、岸英、岸龙立修。

1964年夏在装甲兵学院10期完成班毕业照。



1952年冬在朝鲜。

華東軍區野學校模範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合影一九五〇。



1950年在二十军教导团学生大队任副政治指导员时照，前右二为毛岸龙。

目

录

开 篇	一只蜻蜓对一架山岭的访问.....	1
第一章	心血 资料 证据.....	9
一、	简历	10
二、	曾用名	15
三、	身上留下的人为记号	17
四、	关于照片	18
第二章	从离开母体到离开母亲	21
第三章	在 10 岁的“小妈妈”的怀抱里.....	46
第四章	出没或飞翔在阴沉的苏州 河畔的小小星辰	65
第五章	话说长征：吃千家饭，走万里路	85
一、	大个子叔叔、奶奶和一位一闪而过的妈妈	87
二、	干妈宋庆龄	90
三、	走虎口、入龙潭	96
四、	少林弟子.....	102

五、流浪小艺人·····	105
六、桃园办事处，保安队哨卡，河中险滩， 山中寺院·····	108
七、打青梅，骑竹马；檀香头，一个疤·····	113
八、卖入卖出·····	118
九、沈寄爹，张伯伯，大陆叔叔，红军小分队 ·····	120
十、一个爸爸，两个娘娘·····	123
十一、对水的又一次体验；栽了一头泥·····	127
十二、笼子里的小松树·····	128
十三、小鸟小鸟，我给你洗澡·····	130
十四、先放鹅，后放火·····	131
十五、两个党员·····	133
十六、一进鞠家·····	135
十七、山回路转，二进鞠家·····	136
十八、一泡大尿闹学潮·····	139
十九、一条鞭子一条命·····	140
二十、铭记深仇大恨·····	142
二十一、重操旧业·····	144
二十二、三进菊家·····	146
二十三、反动口号换馒头·····	149
二十四、短暂的重逢·····	150
第六章 小少爷和小交通·····	152
第七章 小小新四军·····	166

第八章 钢军的由来：伴随枪弹走过	172
一、东洋刀，逼着出西洋	173
二、四个鬼子打死仨	174
三、出生入死，命大命奇	176
四、轻巧活：去做小女婿	180
五、操你妈的日本鬼子	183
六、“沙家浜”中的角色	185
七、刺刀捅进肚子，象捅冬瓜	188
八、抱鸡腿，炸飞机	191
九、来抓共产党啦	194
十、敌人搞治安，我们就捣乱、破坏	197
十一、举起右拳，庄严面对。黑色小轿车	200
第九章 延安：十八吹火棍及其它	203
第十章 钢军的成长：伤身与伤心	215
一、走进动摇不定的地盘。两次接头	217
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20
三、蹲一次班房	224
四、放走了一个坏人	227
五、喘了一口气，负了一次伤	230
六、给别人打仗，吃了一通批评	234
七、伤心	237
八、巧遇	241
九、来一个戴大口罩的人	243
十、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244

第十一章 钢军的继续：和平年代的种种考验·····	249
一、不在意，沾上光·····	250
二、接收四万万同胞·····	254
三、解放台湾再回家与一通虎威·····	256
四、建议与封嘴·····	260
五、藕断丝连：华沙小汽车·····	264
六、“清队”重点对象·····	266
第十二章 结束语与新序言·····	270

开篇 一只蜻蜓对一架山岭的访问

消息是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得到的。当时我正做敛神思考一个与这则消息毫不沾边的问题。消息突然来临，令我突然兴奋又突然怀疑。

主席和他的第一夫人杨开慧生了三个儿子，是真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是真的；次子毛岸青终身带疾至今健在，也是真的。唯有小儿子毛岸龙，生死不明，众说纷纭。

1982年第四期《党史研究》，刊登李静峰的《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的生活》一文，文中说“毛岸龙患紧口痢，经医治无效，于1931年5月底6月初病亡。”该文又被林宇摘转到同年8月24日的《文摘报》上。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编者李湘文写道：老三岸龙在几次迁移中是病死还是失踪，各说不一，但不论怎样，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华英编著的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的儿女们》，也讲：岸龙终于与两个哥失散，从此杳无音讯，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毛泽东再没见过这个儿

子。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R·特里尔跟着斯诺说，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后，“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住在韶山。”

小到“街谈巷议”，大到“国家喉舌”，或说他夭亡，或说他呆傻，或说他失踪，总之他象一颗小小的石子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泥流里。这也已被人们认为是真的。

• 现在突然有人自称毛岸龙，又怎能让人一下子接受呢？

不可全信，也不可一点不信。无风不起浪，有浪必有风。这个“起死回生”的消息，犹如一个磁场，将我吸住。

主要是好奇心。我每走一步，大都是好奇心牵引。想想人类也应如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好奇心的牵制。好奇心不可阻挡也不会消失。

我象是飞到了朋友家。见到朋友的爸爸，我喊叔叔，他曾与所谓的毛岸龙共事多年。

叔叔是个少见的和蔼的老人，脸上的笑容好象从我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就没离开过他的面庞。他动用一下午的时间和精力，据他所知，据他所识，据他所闻，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模模糊糊，述说毛岸龙，给我打开一个宽广的完全陌生的视野：

毛岸龙从小被一位姓鞠的开明地主收养；
毛岸龙 14 岁参加江南抗日部队；
毛岸龙 41 年到过延安；
毛岸龙在抗美援朝战场负伤；
毛岸龙反对毛泽东；
毛岸龙曾被毛泽东“封口”，不准他承认自己是毛岸龙……

我的视野跃出一座远山的轮廓，我预感那架山岭很美。鸟语花香，虎啸龙吟；奇松怪石，乱云飞瀑。它没有被人开发，它召唤人们向它挺进，走近它、游览它、观赏它，向世人报道它的真实面容。

一个大疑团被轰然炸开，无数个炫目的小疑团，拖着光亮的尾翼，闪烁着，飞行在我的脑际：

他留没留下手镯之类的身世证据？

他有没有保存家人的书信？

他可记日记？

他为何反对主席？

他以前为什么沉默？

他现在为什么不愿再沉默下去？

……

叔叔不是毛岸龙。叔叔说不清。我只能去找知情人。
我开始了我的访问。

北京，杭州。两千多公里，30 多个小时。硬座。

秀丽的南方名城；新旧建筑互辉互映的街道；种满花草搭着棚架的大院；散发家的温暖的门牌号码……红纽扣般的门铃按钮按下之后，室内的音乐声和脚步声几乎同时响起。

门，关闭已久的门，“咿呀”打开。

门的打开就象一道大幕的打开。一位老军人，宽肩、方脸、高大、双鬓斑白、山一样稳健的老军人，立在我眼前。

他就是毛岸龙吗？他就是我要寻找的谜一般的人吗？我仔细审视着他的五官、身材、言谈和举止，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主席的遗留。

不象，面孔不象。看照片，他与毛岸英的相似之处，大于主席。

遗传仅仅是相貌的遗传吗？不是，还有性格及气质。

我的来临就象白云生处的山户人家的客人的来临。他的兴奋使偌大的房间动荡起来，他的热情使一路冷落的我险些融化，他封存几十年的话语，宛若“江入大荒流”的千里波涛，滚滚而下。

一口江浙方言，在我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的脑袋里，散乱地打上钉子般的印记。

“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我很高兴啦。……你应该先打电话，我去车站接你。……这么多年，不能说，不敢说，要憋坏人的。……五十年代，我们没有相认的原因就多啦。我血气方刚，不理解老头子缺儿短女的心情，老

头子也不理解我啦。我与他不和，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家庭矛盾，并不是反对他领导的政党和国家。我也是个党员，也为新中国出过汗流过血。……谁不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趁他停顿换气之机，我说：“你的身世最终还得通过法律来澄清。我这次来，只能把你的经历介绍出去，告诉人们你还活着。要让人相信，你就要实话实说。”

“就是实说，别人也会怀疑的。坦白地说吧，你来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没有怀疑吗？不可能没有嘛。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家人不相认，为什么？现在相认，又为什么？别人是要这么问的。甚至还会说我是冒牌货啦。……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老头子在时，我去认，有人会讲我高攀；现在相认，总不会说我高攀了吧。……我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想当官，能教育好子女，安度晚年，心满意足啦。可我老了，自己的身世总该弄明白吧？……我们一家人，为了革命，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没剩下几个，剩下的也快剩不下了，老啦，一家人也该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喽。”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应是“晚情”。

逝去的亲人，不能相见，是一种悲痛及怀念；在世的亲人，皓首若雪仍难以团圆，则是一种不幸和悲哀。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黄昏一样动人的忧伤。

忽然，他气于形色，近乎愤怒地说：“最可气的是，有人说我死啦。1982年第四期《党史研究》发出一篇文

章，作者是李静峰，这篇文章在同年又被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文摘报》摘登，摘者是林宇。讲我‘于1931年5月底6月初病亡’。这违反了历史真象，这种胡说八道也有损我党威望。我怎么死了呢？他见到尸体了？我这不是活的好好得吗？好！你说我活着，说不定我还要隐名埋姓，你要是说我死了，那我就站出来给你瞧瞧，打你这个信口开河的耳光。”

听了此话，观他神态，我好象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根骨头。这是一根倔犟的骨头，一根争斗、反抗的骨头，一根支撑着他并给他带来威严和灾难的骨头。

我忽然想到主席。他与父亲毛顺生的抗争，与军阀反动派的抗争，与陈独秀、李立三的抗争，与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与超级大国的抗争，与不同政见者的抗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和争斗中度过的，也有一根骨头支撑着他。

这两根骨头是不是一脉相承？

我注视着面前的这位老军人；“死亡之说”的阴云仍没有从他的脸上散开荡尽。对他而言，这太不公平：“毛岸龙死了”的传说早已钻进他的耳朵或心中；“毛岸龙还活着”的消息仍没有让那些说“毛岸龙死了”的人听到。

这就是隔膜。隔膜可因时空而产生，也可因人为而产生，但最终都应该被时间之刃刺穿。

当今流传的有关毛泽东家事的书刊，毛岸龙仍在失踪、死亡之列，或被掩埋在省略号里。

时间之刃真的太钝吗？不是，也不应该是。“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被冤屈被误解的时候早已过去了。

人真的不可貌相吗？刁钻古怪之辈和堂堂正正一身浩气之人，凭第一感觉，不是可以分出个一二三四五吗？

他是位老军人，不敢说“一剑曾挡百万师”，总是“一身转战三千里”。戎马生涯，出生入死，荣禄耻辱，置之度外。可“人因垂老渐知秋”，“云横秦岭家何在”。他要说话，他要寻家。

他豁达乐观，一身豪气，言谈之中，不时爆发荡气回肠的朗笑，还有斩钉截铁的手势。

他坦率真诚，直言不讳，功过得失，不藏不掖。那直言有时令我尴尬，比如：“你写成此文可挣一笔大钱”；“还好！你不象个吹鼓手”。

他幽默地说“我们一个南腔，一个北调，也许要话不投机啦。”

太投机就不正常了。我冷静地总结他给我留下的初次印象：属于正面人物。最终也应如此！

我相信我已来到一座云缭雾绕的山岭下，依稀看到山中的沟沟壑壑，听到了山的声音。

山门大开，我就要走进这座山岭，一层层地揭开烟云，在每一条高低不同曲曲弯弯的山径上，追踪流逝的岁月。

但愿我这支翅膀一样单薄无力而又忙碌的笔，能如实描绘这架山岭的真实图形。

但愿我的真诚，能忠实地记录他艰辛历程中的每一个时点上的哭声、笑声、枪声、炮声。

第一章 心血 资料 证据

我开始阅读他有关的资料。他把这些资料小心翼翼地交给我时，象在递交他的一生。那神情，那话语，让我觉得那叠不算太厚的资料沉重如碑。

“我年纪大了，写字很吃力，一天也写不了几个字。这都是老太婆帮我抄写的。都是一份，你小心些，别给我弄掉了。”

“这自传是我79年写的，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领导让老同志写回忆录，发挥余热，我又写了一份，呶，就是这个。这些资料也曾给上级看过，89年我又去北京，找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不巧的是，北京正在动乱。你写好文章，发表可要找个好机会，时运不济，就倒霉。”

“我把一切全交给你啦。你先了解我的大致情况，我们再好谈谈，我有好多话要说啦。”

读者也先了解一下他的大致情况吧，我摘抄其中的文字如下。

一 简 历

1927年4月4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在武昌市医院。

1931年春，在上海大同幼稚园。证明人：周恩来、邓颖超、毛泽民、胡乔木、刘澜涛、管文蔚、毛岸青、杨秀生。

1931年夏，大同幼稚园被敌人破坏，转到天主教神父董健吾家。证明人：毛岸青、杨秀生、董健吾。

1932年春，因组织中断供应，董家住不下去，三兄弟流落苏州河畔。证明人：毛岸青、胡乔木、杨秀生。

1932年夏，三兄弟失散，我被送到宋庆龄家寄养。此后王首道叔叔又把我送到嵩山少林寺，拜画师钱钧为师。证明人：杨秀生、王首道、钱钧。

1933年初，先后到过博山、枣庄、南京、成都、嵯县、上海，曾寄养在周扬、沈雁冰、鲁迅等人家。证明人：钱正英、刘澜涛、管文蔚、巴金、王学文、胡乔木。

1933年春至1934年夏，寄养在上海市南汇县鞠如涛家，在泥城小学、大团小学、塘湾小学读初小。证明人：顾德熙、朱人俊、鞠耐秋及王金连、王阿兰夫妇。

1935年，住上海顾小汀、蓝苹家，曾在水小学读书（后转育才小学）。证明人：陈云、陈丕显、胡乔木、

薛暮桥、蓝苹（江青）。

1936年，西安事变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证明人：陈云、陈丕显、乔晓光、黄文欢（越）、宋平、蓝苹、康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到青浦县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证明人：罗星元。

1938年4月，去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政治队任小鬼队班长，后因病住叶挺军长家。证明人：叶正明、叶正达。

1939年3月，去茅山地区“江抗”三路五支队。证明人：顾德欢、蒋平。

1939年夏，给阳澄湖的伤病员运送食物和药品。证明人：夏征农。

1939年冬，在上海光实中学，后到开明中学读书，并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入党，志愿书填上两个姓名：鞠涛、王向东。出身栏填写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栏填着四句话：我的妈妈姓木易，湖南板仓名开慧；何健杀死在长沙，血海深仇长大报。是熊向辉帮我填的。证明人：傅浩、施义之、熊向辉、李正保。

1941年春，去延安，因偷吃房东红枣被主席打了一顿，赌气回到上海。证明人：蓝苹、万里、孙毅、廖梦醒、张玉明。

1941年8月，在青浦县薛霞滨小学代教英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证明人：顾德熙，诸敏、林岭、郁忠。

1941年11月，在开明中学，同时秘密筹建抗日游击队，任副支队长。证明人：姜太公、杨国夫、蔡阿二。

1942年5月，被派入顽方县长孙云达部，秘密组建政工队，任班长，从事策反工作。证明人：刘晓、张晓初、张凡（即顾德熙）、韩念龙。

1942年8月，在浙东第三战区游击司令部所属的崇德部队，后去青训队。证明人：吴建功、顾小汀、王连生、刘亨云。

1942年11月，在浙东纵队教导队政治队学习后分到浙东纵队政治部文工团任班长，在队长丁柯、政指金虹的带领下到顽方占领区章家埠活动，做统战工作。当时政治部主任是张文碧、宣传部长叫江岚。

1944年8月，在浙东纵队五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任文化教员，后任王荣贵大队部干事，在灰色隐蔽区海盐、平湖当交通员。证明人：张季伦、曾平、金子明。

1944年11月，在上海浦东淞沪支队任过四个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即华山中队、泰山中队、衡山中队、南汇县井中中队。证明人：朱亚民、陈伟达、张锡祚、赵熊、朱木良、翁阿坤。

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上，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任一纵三旅七大队三营七中队即任观杰中队政指。证明人：顾复生、杨明德、计金根、王友生。

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被误认为“嫌疑”，受关押。

1948年2月，任华野一纵队三旅七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证明人：徐放、杨明德、阮世炯。

1948年11月，任二十军六十师178团一营副政教。证明人：张季伦、汪志华、瞿俊、董明儒、金乃坚。

1949年10月，任二十军教导营一中队政指（正营级）；50年成立教导团，任四大队副政教。证明人：彭飞、袁天枢、姜宿。

1951年10月，入朝任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政治部青年科长。后任178团干部处处长。证明人：李克农、杨国夫、王学文（杨秀生）、彭飞、杨家保、徐放、杨盛、王荣贵。

1952年5月，任六十师坦克自行火炮团副团长。归国后到徐州华东装甲兵司令部。证明人：都曼令、曹鹤丹、郑梦治。

1953年2月，在北京军委装司第一坦克学校第三期完成班学习（因病参加第四期毕业典礼）。证明人：华丁、刘元奎、肖明。

1954年4月，任北京军委装司第二坦克学校训练部教务处长。证明人：林彬、马骥、王光德、田申、江成、叶藻。

1955年，授我军政大学名誉学员证明，学校领导要授我上校军衔，调中南海警卫营任政教，我未同意。邓力群发给我中南海出入证，与陈云、邓小平、宋庆龄、康生、江青、陆定一、茅盾、周扬、夏衍、杨尚昆、文化

部助理部长吴仲超、溥杰、溥仪有来往。

1959年，因有言论问题被批斗。

1961年2月，任洛阳军委装甲兵第六坦克学校训练部副部长，证明人：王胜、史世屏。

1962年，第三、第六坦校合并南移浙江省江山县，随行。证明人：黄策、史世屏。

1963年2月，在山西大同军委装甲兵学院第十期完成班学习。证明人：谢锐、邱相田、王胜。

1965年4月，任济南军区二十六军司令部装甲兵处处长。证明人：程洪、赵峰、程世清、杨栋梁。

1967年7月，因病误诊而免职休息。

1968年8月，受文革冲击，到“清队”学习班受审，未到坦克八师任职。

1978年，调浙江军区炮兵处，因病未去任职，后调独二师任政委，又因故未去任职。

1987年5月至今，在家休息，未下离休命令，等级未批。等待组织处理。

这些经历是从他的记忆而来。个人不是党组织，一个强大的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个时点上，几乎都有文字记载的详细或粗略资料。而个人没有。他没记过日记。他的资料只能源于他的记忆。证明他的身世，也只能从这些资料入手。

• 怎么证明这些特别是他幼年时期的经历是真的？单

说证明人吧，有的早不在世了，有的是个化名，有的至今健在但不知去向，有去向的又那么容易访问吗？

再说，他的记忆有无偏差，他写出的证明人的名字有无谐音字。

在那恐怖的岁月；地下工作者的名字绝不会象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那么真实。

他至今能记起的曾用名就有五十多个。

他现在的名字仍是一个化名。

二 曾用名

小名叫毛毛、小龙、小三、又叫毛毛虫、小聋子、小猴子、阿三。

30 年从长沙去板仓，叫王英林；妈妈牺牲后，三兄弟从长沙去上海，叫杨永泰、国平；

住董健吾家，董家大姐姐叫我董沛；

寄养宋庆龄家，干妈宋庆龄给我起名葛晓白；

去少林寺拜钱钧为师，又叫钱贵（魁或柜、桂）；

离开少林寺住韩芳志家叫韩於甄；

从枣庄去南京沿途叫殷民；

到了四川成都周扬和李柿柑叫我王庆祥；

浙江嵊县越剧团学艺糊口时改名居（锯）涛；

住上海张伯伯（周树人）家，张伯伯给我起名朱嘉

琛；

离沪奔无锡常州一带，住大陆叔叔（陆定一）家又
叫陆阿狗、张阿毛；

住南汇县李寄洲家叫李正德；

私塾先生林有章叫我毛曼增；

寄养泥城镇近郊鞠如涛家改名鞠友卿（幼钦或友
庆）；

住顾小汀、蓝苹家又叫顾义同、李淑珍。

上育才公学叫鞠凤飞；

林伯渠伯伯叫我林猛、林怀部；

李克农叔叔叫我李志民；

住南通市张家叫张晓良；

再回鞠家叫蔡干；

徐沛（谭震林）叫我徐嘉良；

住上海贾家叫贾来珠；

在叶挺军长家叫叶超（小超）；

阿丕叔叔（陈丕显）叫我顾渊；

慕华大姐叫我陈为东；

入党志愿书除填了“鞠涛”外，又填上王向东；

参加地下工作曾用张玉和、王肇和、李公德、张公
仆、何有宗等化名；

去青浦朱家角参加“江抗”叫刘世忠；

筹建游击队任副支队长改名马家俊、刘长生；

去浙东时叫杨永太；

到四明山浙东教导队学习时叫菊陶；
二十军军史上写着的是鞠陶；
战争年代嘉奖令上一直写着菊陶；
56年邓力群给我签发的中南海出入证上写的是鞠陶。

现在我叫鞠涛、鞠陶、菊陶或菊涛。

不要惊叹他有这么多名字。为了隐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要改一个名字；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他要改一个名字；一个保护人把他交给另一个保护人他要改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因时因事而起，他的名字就象他那时的饭碗——生存工具，吃一顿换一个。

这些名字象一个铁链，中间的任何一环脱落，或说对不上号，都有可能使他的最后一个名字不等于他的第一个名字。

有什么证明鞠涛、鞠陶、菊陶、菊涛就是小龙、小三、毛毛。

三 身上留下的人为记号

背上，左臂胛骨下，浅白色伤疤。这个疤是30年三兄弟由长沙去上海的途中，护送人李崇德用嘴咬过之后，杨秀生用香烟头烫成的。

脊椎骨左侧约第五第六根肋骨间，有针刺记号。这是住周扬家刺的（组织上知道）。又在左腿肛门边用丝线扎起一团肉，点燃檀香烫糊，并涂上印章用的红油墨，留一记号。现油墨退色，凸起的伤疤仍在。

寄养在鞠家，用衣针在右脸刺出牛郎织女星座，左脸刺出桃瓜星座，现有黑斑。

在江南抗日义勇军某乡村驻地。常州市工委负责人化装成医生，看过我身上的印记，又用针灸刺背，并注射墨水，现留有黑斑疤。

解放后，北京医院医生魏忠曦、马海德，杭州128医院内二科强主任、主治医师康伟及赵医生，检验过这些人造的记痣。

四 关于照片（1930年至1950年）

1927年在武昌，同妈妈和岸青在院子里合影；

1930年夏在长沙舅舅茶叶店附近的照像馆与妈妈二哥合了一张；

1931年3月，从长沙去上海，在杭州与舅母等人合影；

1931年冬，住董健吾家、三兄弟在窗前台阶上合影；

1931年夏，三兄弟在苏洲河畔木棚房前合影；

1932年秋，住宋庆龄家，与宋庆龄等三百多人合影；

1933年10月，在成都周扬家，在天井里与一个小女孩合影；

1933年11月，在浙江嵊县城剧团，与圆周率（周而复）及全团人员合影；

1933年12月，在乌镇沈雁冰家与他在堂屋前合影；

1934年1月，住张伯伯（周树人）家与他全家合影；

1935年初，与“影星皇后”蝴蝶、阮玲玉、蓝苹等十多位电影明星合影；

1935年3月，阮玲玉服毒身亡，站在她灵棺前被新闻记者拍照，刊在《中国时报特刊》等报刊杂志上；

1938年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青训队，与全队人员合影；

1938年夏，住叶挺军长家，与他全家合影，后又与新安旅行团全体团员在唱歌时合影；

1939年春，在江南抗日义勇军某驻地，与大队长柴成文及其儿女、卫士合影；

1941年8月，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照了一张单人照片；

解放战争中授我英雄奖章后照过单人照，集中在二十军英模册上；

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在长江沿线农村宿营地与毛泽东等十余人合影；

抗美援朝时，在防空洞照过单人照，在青年科长会议照过集体照，在英模会照过集体照。

这些照片，有的他见过，有的收集在他手中，有的则不知去向。

好在我找到了他的去向。书归正传。

第二章 从离开母体到离开母亲

这要从他出生前的两个月说起。

1927年2月，毛泽东一路风尘赶到武昌。他是在考察湖南5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之后，搜集到足够说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的资料，心情兴奋且充满斗志地跨进武昌都府堤街41号大门的。他参加了正在这里举行的各省农民联席会议，并急切地向会议提交了“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

此时，34岁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充其量是一位满腔热情到处碰壁的革命者和优秀宣传员。道路的曲折，事业的受挫，使他很难离开他的亲人。家里的温暖多少可以抵消他在家外遭受的冷落，支撑他继续斗争。近些年，他一直把妻儿带在身边，保持“重比翼，和云翥”的生活。

十天后，毛泽东在武昌火车站，接到他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开慧、岳母向振熙、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及

保姆陈玉英（孙嫂），高高兴兴地把她们领进带有红柱和拱廊的 41 号。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在这年 3 月，毛泽东写出他的力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举办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各地的农民代表宣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张。

自结婚后，帮助丈夫整理文稿、抄写文字就成了杨开慧生活的一个部分。尽管身体不便，在 41 号大院里，她还是没少陪毛泽东在灯下奋战通宵。

4 月 3 日夜，毛泽东书房里的灯依然亮着，微弱的光芒透过窗子，象金粉一样洒在院内被黑色笼罩的婴儿般幼嫩的绿叶上。

运笔若行云流水的毛泽东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对旁边正一字一句帮他誊抄文稿并被他吐出的烟雾呛得咳嗽不止的杨开慧厉声地说：“不行！你该休息了。”

也许是流泻在笔下的某些文字令深入其境的毛泽东猛然想到自己的妻子，才说出这命令式的严厉话语。他意识到之后，赶忙按灭烟头，轻声地说：“你太累了，开慧。”

“你写不累，我还能抄累？”

“你怀着伢子。”

“你呐，身上的负担恐怕比我还重。”

毛泽东被妻子深深的理解所激动。“巧妻常伴拙夫

眠”的歉意由然而升，顿时从一位投笔如枪的革命者，变成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温情丈夫。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我们有两个伢子，这次，你可要生个妹子。”

“放心吧。”

“那你马上去休息，我可不愿累着你身上的妹子。”

杨开慧满不在乎地说：“都不累。”

可她到底是累着了。次日，也即4月4日，腹疼阵阵而来，如割如绞，已有两次经验的杨开慧知道自己要生了。

4月4日，是3月7日开课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首批学员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在为四面八方奔来的农民骨干作慷慨激昂的演讲。

陈玉英手忙脚乱地唤来一个车夫，把呻吟不已的杨开慧送进武昌市医院。

是早产，产下一男婴。

孩子生下的第四天，忙忙碌碌的毛泽东才腾出时间，兴冲冲地来到医院。他进门就问：“是伢子妹子？”

陈玉英把孩子抱到毛泽东跟前，说：“是个伢子。”

毛泽东接过孩子，风趣起来：“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他朝孩子的小额头亲了一口，孩子却“哇”地一声，嚎啕大哭。“喔，不行不行，还是你来。”他把孩子交给陈玉英，走到妻子床前。

杨开慧带着母亲的幸福和妻子的温情，还有没被毛泽东刚才的风趣掠净的歉意，对丈夫说：“对不起，让你

美中不足。”

“对不起应该我说嘛。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毛泽东又幽默起来：“妻子在‘闹革命’，不在身边的丈夫可要戴上‘逃兵’的帽子喽。”

杨开慧笑了笑：“这有什么要紧的，你工作忙嘛。我生孩子，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孙嫂对我照顾得很好，你放心好了。”

一周之后，毛泽东把妻儿接回 41 号。

毛岸龙就是这样来到人间，成为毛氏家族的一员。他离开温暖的母体，倚入母亲温暖的怀抱。这个转折，开始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

他的啼哭给这个人间添加了一曲嘹亮的音响，可这个人间为他的到来准备了什么？！

是的，母亲的怀抱是稳健而安全的，可母亲乘坐的是一只刚刚启程的革命的小船，出没在浊浪排空、腥风血雨的河面。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

5 月 17 日，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

5 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大屠杀；

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控制的党，否决了毛泽东“革命是暴动”的土地革命战争主张。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开始变阴。“7·15”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转入地下。他秘密地给长沙东乡板仓的杨秀生——杨开慧的族兄——写了一封信。

8月初，杨秀生闻讯赶到武昌，接走保姆陈玉英、次子毛岸青及11件行李。

8月1日，“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受命去湖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组织领导后来被称作“秋收起义”的革命暴动。

8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带着妻子、岳母、及两个孩子，由武昌搭乘一辆货车，秘密地赶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

四个月的毛岸龙第一次回到陌生的故乡。

足足睡了12个小时的我，精神抖擞地迎来了南方的第一个早晨。早餐后，我们走进客厅，开始交谈。第一个话题是他的出生地和生日。

这属于他记忆范围之外的事件。他说他没有资格谈论这些，但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把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耳部，生怕漏掉一个字，

或一个细节。

“人在哪里出生，身上又没带哪里的记号，还有人说我生在浙江，从老头子以前的活动地域来看，这对不上号。我生在武昌的可能性最大。就这么确定吧，出生地点又无关大局。

“至于我的生日，是4月4日不假。老头子记得，保姆陈玉英也记得，都写在了书上。从这个日子看，我是生不逢时。你想想，4月5日清明节，是上坟扫墓的日子，4月4日鬼就出门，准备享受供品啦。我不成了迷信中的‘鬼出门’了吗。”

我俩都乐了。他把捧在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继续说：“你可别以为我是鬼。我是与‘鬼’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小时候流浪上海街头，被人骂成鬼（龟）孙子；寄养在别人家里又被看作鬼儿子；参加部队叫小鬼；打的是日本鬼子；后来又去朝鲜打美国鬼子；文革时又被划进了‘牛鬼蛇神’；你把我的经历写出去，说不定有人会认为是鬼话，又要说：‘毛岸龙早变成鬼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又把茶杯捧在手里。

我被他的笑声感染：“与‘鬼’打了一辈子交道，你身上可看不到一点鬼气，鬼是怕你这条龙，躲得远远的……”

“说到名字想起来了。我总觉着我和大哥换了名字。我用了他的名字，他用了我的名字。你想想，老头子是深通中国文化的，龙是咱们民族的图腾，望子成龙嘛，长

子应该叫龙，才合老头子盼儿成才的心情。怎么叫英？英是女孩的名字嘛。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生了两个儿子后，老头子很想要一个女儿，在妈妈怀我时，他盼女心切，就急不可待地把名字起好了？”

我心里一惊，要是他哥俩的名字换了，或者人换了，误会就大了，急忙追问：“你是老小，这不会错吧？”

“不会。名字若错了，也就错了，反正都这么叫开了。名字嘛，就是个代号啦，象运动员背上的号码。号码换换没关系，人不换就不会出差。我小时候是有两个哥哥的，他们常带我玩……噢，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出生不久照的，后来我见过。在我家住的 41 号大院天井里，妈妈抱着我，二哥站在身边，不知哪位叔叔给我们合影，保姆陈玉英前来把我们面前的一条板凳拿走，走慢了，还照上一只脚。”

“你有这张照片吗？”

“我怎么能保存那时的照片呐？”

也是，他不可能保存那时的照片。照像之时，他无记忆，又怎么肯定妈妈怀中抱的孩子就是他呢？那两个孩子就不可能是岸英和岸青吗？

疑团，又一个疑团。

在历史进程中，在个人履历里，有多少个坚硬的飞翔的疑团，令人晕眩。

疑团可以解开，有的却永远找不到钥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带着那支衣冠不整的军队走上了井冈山。

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在家乡开展艰苦的地下工作。她走村串户，深入农家，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霞姑”、“霞姐”。

毛泽东和杨开慧过着“我思君处君思我”的两地生活，夫妇互相惦念，通过曲折的渠道，传递“抵万金”的家书。

引用文字：

他们夫妻通信，我常到附近的罗家铺子取回主席的信件，也托交（开慧的）信件。对主席的信，开慧总是看了又看，舍不得放手。

——引自陈玉英《在主席和开慧身边的日子》

三兄弟跟随妈妈在板仓生活。有关他们这段生活，世上披露过少，不知我能否从我对面这位老人身上开掘出一些东西。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板仓。我问：“鞠先生，你能记起在板仓的生活吗？”

“深刻的事还记得。那是个夏天，30年夏天，我快4岁了，差不多能记事了。”他忽然话语一转，象首长命令士兵：“你采访我，要不断提问，这样我的脑子才能转起来，事才能想起来。没有提示，有些过去的事也就永远过去了。”命令之后是温情，“你别喊我鞠先生。你喊我先生，我就想起我的老师。老师才称先生嘛。在我家里，

你就喊我鞠叔叔。这样称呼气氛是不是好一点？好了，我讲讲板仓生活。

“我们住的是土坯垒起的草房，家门口有一棵大松树，树下有一块大石板。妈妈空闲时，就坐在石板上给我们兄弟讲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妈妈讲的‘一只筷子能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她让我们兄弟好好团结，学习上进，长大了去跟爸爸打白狗子。

“大哥已经上学了，背着带补丁的书包，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怕别人笑话，就跟妈妈闹着要新衣服。小孩子嘛，见别的孩子穿新衣，哪有不想要的。一天晚上，妈妈在灯下给大哥缝件新衣服，大哥偎在她身边，望着妈妈穿针引线，我和二哥也在旁边眼巴巴地望着。一件衣服，三个小家伙要争哩。妈妈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头，却给大哥试穿。我就闹开了。大哥一瞪眼，又很自豪地说：就你会叫，你又没上学，等你上学了再穿。好象上学就高我一头，是件了不起的事。我又嚷着：我要上学要穿新衣。妈妈高兴了，说：好，你要上学，妈妈现在就教你。妈妈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工工整整地写出一个又一个字，边写边教我们兄弟念：慈母手中线，密密缝新衣，送儿上学去，望儿学成归。妈妈念得很慢，一遍又一遍教我们，直到我们都能背诵。

“家门口的松树下，大石板上，是我们兄弟玩耍的好去处。我们做游戏，打松子。有一次，大哥放学回来，带我去树下打松子。他咬着一根小竹竿，噌噌爬上松树，一

阵乱打，松子哗哗落下。我就在树下捡啦。一颗松子正好落在我头上，用手摸摸觉得很疼，竟哇地哭了。太娇嫩了吧？我小时挺爱哭的，动不动就咧开嘴巴，又哭又叫又流泪。竟把‘哭’哭完了，长大后就再没哭过。大哥见我被松子砸哭了，慌忙溜下树，哄我，说给我烧松子吃，松子顶香顶香。我抽抽咽咽地止住哭声。大哥捡来一把柴禾，把松子埋在柴堆里，点着火。谁知火堆里的松子，噼地一声炸开了，溅了我一脸灰，眼睛眯住了，睁不开，我又哇地哭了。大哥生气地说我：你不象条龙，象条虫。

“门前还有个水塘，塘水很清，水中长着莲花、菱角。塘边有只小木船，用绳子拴着，象拴着的一条大鱼。我们兄弟三个，也常到船上去玩。大哥当船老大，我和二哥当船工。大哥站在船头，喊一声‘开船喽’，我和二哥就用小竹竿划水，不是划，是打水，打得水珠乱飞，溅到我们的衣上和脸上。船光晃悠，不能离岸。这样也挺开心，更开心的是，大哥有时还下到水里，给我们摘菱角吃。嫩菱角吃到嘴里，又鲜又脆又甜又香。那可是老家的特产啦。

“那一次，大哥上学去了，二哥把我带到船上，玩老游戏。他要当船老大，让我当船工，我不干，非要当船老大不可。我很羡慕大哥站在船头喊‘开船喽’的神情。二哥让我，二哥比我和大哥都老实温顺。我爬到船头，站起身来，模仿大哥的样子，用尽力气地喊：开船喽。可

能是我没站稳，也可能是二哥划水太重，船身一晃，我咕咚一声，跌进水里。二哥肯定吓坏了。慌慌张张跑去喊来大人，把我捞上来。保姆陈玉英跑回家里揭下烧饭的铁锅，倒扣在地上，把我放上去。圆鼓鼓的肚子一接触锅底，我嘴里就冒出一汪水，接着是又咳又吐，又哭又叫。那天老头子刚好在家，他挺生气，操起一根小竹竿，在二哥头上敲了两下。还罚他面对白墙站着反省……”

我惊讶地打断他的叙述：“你是说主席？”

“是他。他打了二哥，责怪二哥没看好我。”又若有所思地，“二哥应该能记住这件事的。”

就此打住。我要插入部分文字。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走上井冈山，从此再没见过杨开慧，更没见过他的小儿子。这个“悲欢离合”的最后一离，是世人公认的。

引用文字：

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想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引自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P8 正数第2行至第4行

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板仓老家，不意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引自李湘文《毛泽东家世》P77 倒数第5行至第3行

两段引文只有一字之差，“想”改成“意”或“意”换作“想”。但说的是一件事，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我还想引用李淑一《忽报人间曾伏虎》中的文字，但怕又引出一位“老师”。就此打住。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并传到了地球的那一面。

引用文字：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开慧没有见过毛泽东。

——引自（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P119

1928年，毛泽东因杨开慧杳无音讯生死不明，与18岁的贺子珍相爱了。

引用文字：

毛泽东以他的成熟老练，赶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浓重的韶山话坦率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停了一会，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引自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P133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子珍是乡共青团的支部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这天晚上她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子珍同志和我已相爱了。”毛向同事们宣布。

——引自（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P120

姑且不论以上引文的正确性（美国人的话尤不可信）。这些文字已出版发行，“以飨了读者”并影响了他们。

试看文字矛盾：

华英说主席和杨开慧“杳无音讯”，陈玉英讲“我常到附近的罗家铺子取回主席的信件，也托交信件。”也许其中有个时间差，主席和贺子珍相爱时，因“烽火连三月”，已与杨开慧中断鸿书往来？

华英和李湘文说“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我对面的这位老军人说“老头子用小竹竿在二哥头上敲了两下”。也许杨开慧当时不在家。这可能吗？也许这位老军人胡编乱造，但看他那沉入往事的神态，又不象。

插言结束，话归原处。

我仍不失惊异并且兴趣浓重地追问：“你是说，你在板仓见过主席？”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

“当时妈妈在场吗？”

“怎么不在。老头子就是回来看妈妈的，妈妈还和他吵了一架。”

情况复杂了。山中有幽洞嘛。我不敢插言，象墙角的那盆君子兰似的，静静地听他叙说。

“老头子是突然来临，又突然走掉。来去无踪。有时来了，还带个小分队。岗哨都放在老远的山头上。他回到家里也不闲着，看地图，写文章，怕我们孩子吵，有时也不在家里睡觉。妈妈当然很关心他啦，想法给他弄些好吃的。可后来老头子抽上鸦片，妈妈生气了。”

“老头子有胃病，犯起病来，疼得他额头冒汗。那时没条件，缺医少药的，只好用土方子治病。我们当地信鸦片，就是大烟，都说它能治百病，特灵。那时那玩艺长沙城里特别多。舅舅就从城里给老头子捎些鸦片回来，一吃，还真见效。老头子胃不疼了，可吃上瘾了。妈妈不高兴啦，就和他吵了一架，说：润之，你怎么糊里糊涂的，这东西害过多少人你还不晓得吗？吵过老头子，妈妈又吵舅舅，说是他把老头子弄上瘾的，再带鸦片来就不让他进门。自那以后，老头子就戒了鸦片，但烟瘾特别大。”

“舅舅好心没得好报，也不高兴啦。走了，回长沙，他在长沙城里开茶叶店。舅舅一走，我还问妈妈：表姐还会来吗？表姐是舅舅的长女，叫杨展，比我大哥还长两岁。有一回舅舅来送鸦片，把她带来了。她一来到我

家，就带我出去玩，是做一个牵着手的游戏。大哥放学回来，见我们玩得开心，也要和表姐牵着手玩，表姐不干。那时她懂事了，不好意思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子牵手。跟我牵手没事。弄得大哥挺不高兴，还骂我小猴子。”

他哈哈地笑起来，起身倒水，又感慨地说：“小时候的事，想想真有意思。长大就不行喽。”

我也差点被他讲述的童年往事迷住了。山清水秀茂林修竹有松有石有口水塘开满荷花的地方一个天真烂漫的小表姐牵着一个纯真无邪的小表弟……

是什么突然赶走我脑袋里飞翔的美丽的红蜻蜓，把我从一幅画中拉回这个客厅。

我不知道，我没有时间去分析那些象流星一样闪过我脑中的念头。我冷静下来，发问：“你讲的是真的吗？书上都说主席上了井冈山后再没见过杨开慧？”

听了此话，童年回忆给他带来的快乐笑容象一方彩纸从他脸上“唰”地揭去；真实受到怀疑而产生的惊讶、茫然、继而是生气，使他温和而富有弹性的面孔一下子变成一块板硬又冷淡的墙壁。他倔强地反问：“你看到的书上就没有错的？！”

一句话把我噎住。

也是，旧社会到新中国，几十年过去了，因时光的流失、岁月的变更、观念的不同及个人位置的迁移，记事之类的书上所记载的事情，哪能都象我面前这位倔强

的老人及他坐着的棕色沙发一样真实呢？

书上有些资料，不也是后人推测的吗？比如：山顶洞人生活在一两万年前；还有“大约”、“可能”之类的含糊字眼。

书上有些资料，也可能是张三抄李四、李四抄王五的。而王五又可能是听刘六说的，甚至王五又能反过来抄到张三的头上。俗言“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就看你抄得好不好。

书上有些资料，是以讹传讹。

书上有些资料，是一面之词。一面之词或源于自己的记忆、或录自他人的诉说。前者的可靠性又大些。

一面之词存在的条件是允许另一个一面之词的存在。

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的一面之词，源自他的童年记忆。

应该说明的是：大脑不是电脑，尽管电脑是大脑创造的。输入电脑的资料，不论放多久，何时想用，一敲命令键就可全部调出，一点不会出差。大脑就没这全盘储存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储存深刻的记忆，并将平淡的往事挤走。

记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不可能象此时此刻我们眼前的这些文字一样清楚。比如，让我们回忆10年前哪怕是1年前的某件事情，也许我们会搞错发生地点、有关人物、具体日期或当时的环境。但我们不会搞错那件事情的本身。要么就没有这个记忆。

记忆的另一个特性是，它喜欢吸收新环境或特殊场合所发生的事件，对习惯环境中没有刺激性的事件，则采取冷淡态度。比如，我们能记住三、四岁时，烫着、淹着、开门、挨打等事件，及大人带我们去的第一座大城市。环境时新旧，决定记忆的深浅。

1930年夏，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已经三岁半了。三岁半的孩子，记忆是模糊的，但不可能一点没有。

以下为插入状态。

1930年5月1日，因北伐之后各军阀分赃不均，蒋介石把冯玉祥集团军的军饷定得特别低，把兄弟翻脸，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投入兵力100万，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投出战员60万，在河南、山东、江苏、河北、安徽等省，摆开战场，打了一场为时6个月的，也是北伐之后中国最大的内战。

中国工农红军趁机发展自己的事业。以土地革命战争为主，以井冈山为中心，打土豪，分田地，扩充兵员，扩大根据地。到1930年夏，红军已有10多个军，先后创建10多块根据地。

在上海遥控红军的李立三，以为时机已到，下令红军攻占城市。

毛泽东并非是一位任人随意调动、随便冒险的人，他可能也看见了兔子，撒了鹰。

引用文字：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军团和一军团再次会师，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一、三军团合并为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

——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P150。着重点原文没有。

蝶 恋 花

从汀州向长沙

一九三〇年七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引自《毛主席诗词》P10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才被迫撤出。

——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P237

以上插入文字说明：1930年夏，主席到过长沙或长沙附近，彭将军占领过长沙。

在长沙城外——军队布防城外，可不能把这“城外”理解为城墙根边——住了两个月（七月至九月）的主席，会不会去板仓看望他的第一夫人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长沙至板仓，一百三十华里。

主席见到了杨开慧，28年与他相爱的贺子珍该怎么办？那段时间，主席有两位妻子？

是为了主席的形象众口掩埋了这段事实，还是这段事实根本就没发生，我眼前这位仍未缓和脸色的老人的记忆零件出了毛病？

为了继续交谈，我必须站在这位老人的一边，他一闭嘴，我准傻眼。

“你说得没错，30年夏天，主席到过长沙，彭德怀将军也占领过长沙。”

老人的面孔缓缓放开，由硬变软，由阴转晴：“我讲的这些经历，对你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可你要不信，这采访还有什么意思？你有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想法应是独立的，不受书的左右，也不受我的影响，不偏不向，象一个天平，称出合情合理的真实的东西，组织你的文章。文章千古事，乱写可要误人的。

“好，我接着讲。那时我也到过长沙。为什么去就不知道了。妈妈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记得上路时，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象过年似的。两位哥哥边走边逗我，就是小孩子们的逗乐啦。抱着我的妈妈也高兴地左闪右闪，躲避哥哥们伸过来的手和草茎。谁知妈妈的躲闪幅度大了些，没抱住，一失手，把我摔在地上，很疼啦。我哇哇大哭起来，一家子人又该哄我啦，可哄不好，摔得太疼，我一个劲地哭叫，弄得大家挺扫兴的，外婆还讲：这是龙虎斗哩。

“到了长沙，住舅舅家，大哥高兴地和表姐一齐上学校念书去了，还叫我小猴子。我没到学龄，只好在家玩。舅舅的茶叶店里，摆着好多蓝蓝的坛子。见到坛子我就有了反应。外婆总把芝麻糖放在坛子里。踩上一只小板凳，我就往坛子里掏。坛子里是茶叶，结果没吃到芝麻糖，把茶叶撒了一地。舅舅看到，很不高兴，喊妈妈来管我。妈妈过来就教训我啦，说：在舅舅家不许调皮，再调皮黑狗就来抓你。妈妈是吓唬我的，可没几天她还真让黑狗抓去了。

“那天大哥上学去了。妈妈带着我和二哥，还有保姆，到舅舅茶叶店附近的一家照像馆去照像。照像馆是个两层楼，楼下开票，楼上拍照。我们走到二楼，进了摄影室。妈妈抱着我，二哥站在旁边，保姆陈玉英手摇九连环响铃，站在对面，让我眼睛看她。‘哧’地一声，照完了。照完回家。刚走出照像馆，警笛就响起来，满街人，乱哄哄的，轰地跑开了。妈妈抱着我，跑不快，几个黑狗就抓住了她。”

“以后你就没见到妈妈？”

“不。妈妈又回来啦。那时候，经常抓人。黑狗一没钱花，就不论好人坏人抓几个，敲榨勒索，拿到一批赎金，人就放了，和土匪一样。妈妈没暴露身份，也可能找了门路，亲戚朋友塞给黑狗一些钱，就放出来了。”

“妈妈一回来，我们赶忙回板仓。外婆带着大哥，妈妈带着我和二哥，分开走的。临行前，妈妈一遍遍叮嘱我：路上若有人盘问你，你就说你叫王英林，妈妈叫霞姑，是托儿所阿姨，爸爸叫王金连，是教书先生，在外地教书。”

“在路上还出了一件事。妈妈和我们是坐船回板仓的。几个叔叔把我们母子三人送到长沙城里的码头，对一个大汉船夫交待几句，就回去了。那个船夫领着我们走上一条小木船，他摇桨，顺着湘江，向北划去。从上午漂到下午，还没到家。天快黑了，船夫就把小船停到一个靠村子的小码头。不走了。说过夜再走。他非要妈

妈上岸去，妈妈不干，两人就吵起来。那小子是起了歹心。

“两人吵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船夫黑着脸说：你不上去，我就喊警察。妈妈说：喊警察也不上岸。那小子还真去了，上岸找警察。

“船夫一走，妈妈就对二哥交待几句，让二哥快跑。二哥一上岸，就跑开了。见二哥没影了，妈妈又对我说：别人问你妈妈哪里去了，你就说大便去了。我点点头，记住妈妈的话。妈妈一转眼就不见了。船上就剩我一个，天又黑，我想哭，又不敢，怕招来黑狗。

“不一会，那个船夫带着几个黑狗吵吵嚷嚷走过来。一见船上就我一个小孩子，带头的黑狗，是个小官，生气地问船夫：共产党在哪里？船夫只好问我：你妈妈上哪去了？我连声回答：妈妈大便去啦妈妈大便去啦。船夫又让黑狗搜查。一只小木船，搭眼就看出来，有什么查头。一个黑狗打开船头仓看了一眼，又‘啪’地盖上，说：没有。几个黑狗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黑狗走后，船夫仍不甘心，又厉声问我：说！你妈妈哪里去了？我却‘哇’地哭了起来。

“二哥是去附近农会找人的，黑狗一走，一个健壮的叔叔提着手枪，带着几个叔叔跑了过来。船夫一见吓坏了，又磕头又作揖。那位叔叔也不理他，跳上船，抱起我，问：妈妈哪里去了？我边哭边说：妈妈大便去了。

“妈妈没有大便去，她就藏在船头的水草里。水边长

满了水浮莲、金鱼草，人往里一蹲，天又黑，很难发现。平常用来喂猪的水草，救了妈妈。

“妈妈一身是水，钻出来，见到叔叔们就哭，边哭边说：船夫是个坏蛋。船夫一听，就口喊‘饶命’。

“我们上了岸，抱我的叔叔把我放在另一个叔叔的背上，妈妈让叔叔们搀着，离开那个小码头。背我的叔叔边走边对我说：咱们找你的红军爸爸去。

“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那位提手枪的叔叔，干掉了船夫。

“提手枪的叔叔追上来，带我们上了山。我迷迷糊糊趴在叔叔背上睡着了。醒来时就到了板仓。”

讲完这段经历他长舒了一口气。这也许是他至今能记住的第一次坎坷遭遇。这个遭遇在他那近乎空白的婴儿皮肤一样柔软的记忆板上，烙下一个焦糊的黑色印痕。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就象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

1930年9月，红军撤出长沙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城里、乡村、墙壁、树身，到处张贴通缉毛泽东和朱德的悬赏告示。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出价一千块大洋，捉拿“毛泽东之妻杨氏”。

杨家母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隐入乡村板仓。但在那个黑云压城、鹰犬密布的年代，这家“孤儿寡母”又怎能逃得出巨大的魔掌呢。

引用文字：

1930年10月14日，天刚蒙蒙亮，范觐溪带着匪兵把开慧同志的家团团围住。开慧烧了文件，范觐溪就带人冲了进来，狡猾地说：“霞姑，这怪不得我。你还是要跟我们走一趟才行。”开慧气愤地问：“有什么事要捉我们？”范觐溪说：“冒么（湖南话，意即“没有什么”）子大事。只要你到长沙去，对证几句话。”开慧横眉冷对冲进来的匪兵：“要走就走。”敌人把开慧五花大绑，把我也绑起来了，并带走岸英。附近的农民纷纷赶来，对反动派的暴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抗议说：“她们女儿家，拖儿带崽的，走不得远路，你们不要拖着她们走，她们没有罪。你们要有点良心啦。”当时几个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主动用两部土车子送我们，到白水火车站。

——引自陈玉英《在主席和开慧身边的日子》

杨开慧等三人被捕后，被关进长沙协操坪监狱。在狱中宁死不屈。1930年11月4日，被敌人枪杀在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29岁。

“妈妈被捕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要不是范觐溪那个小子，敌人是抓不到妈妈的。范觐溪是板仓附近的人。他的老头子是个恶霸地主，民愤极大，闹农会时被农会人打死了。范觐溪从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何键的爪牙。我们全家回到板仓后，尽管处处小心，还是被他发现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嘛。那

小子就向何键告了密，带人抓走了妈妈。

“那天早上，我听到吵闹声，就从床上爬起来，出门一看，妈妈已被敌人带走了，我一屁股坐在门前，嚎啕大哭，边哭边喊：妈妈你快回来呀妈妈你早点回来。可妈妈回不来啦。不久就被敌人杀了。”

他是如此平静——就象我们平时唠家常一样——述说这段记忆，除了“范颢溪那小子”给他带来转眼即逝的愤恨外，没有激动，也没有悲伤。他那饱经苍桑的脸上一点也找不到“幼儿丧母”所投下的巨大悲痛的身影。也许是他悲痛过了，也许他的一生，悲痛太多太多，以致于专找软弱之人的悲痛，从他那铁一般结实的身體上愧然逃亡。

他的叫霞姑的妈妈，从此就象一片美丽的红云消失在天际，也消失在他四岁的缺少暖色的视野。没有吻别，没有留下一句叮咛。他的英雄的妈妈从从容容自自然然地走了，在他的哭声中走了，在他的呼唤中走了，在他的难以离开妈妈的幼子眼神的注视中走了。他永远离开了妈妈，离开了笼罩他保护他的那片母性的霞光。

“没妈的孩子象根草”，这是和平时期的歌曲。在那动荡不安硝烟弥漫充满血腥恐怖和死亡的年代，没妈的孩子又象什么？

万幸的是，他还有一位年幼的小妈妈：共产党。

第三章 在 10 岁的“小妈妈” 的怀抱里

主席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挥笔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痛言，并寄款修墓，厚葬爱妻。

杨开慧，这位年轻的妈妈，离开了一个活动的温暖的家，走进了一个固定的清冷的家。板仓杨宅后边的棉花坡，群松环抱一方矮矮的坟墓，沉重肃立的墓碑上，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名字，象兄弟三人的小小身影，永远垂立在妈妈的门前。

长子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经亲戚朋友说情作保，被释放出狱，回到板仓。

走出监狱，走不出敌人的监视。敌人演的是一出“钓鱼”的把戏，想用孩子，来钓主席这条“大鱼”。

为了安全，三兄弟分散隐蔽。四岁的毛岸龙被送到真正的老家——韶山。保姆陈玉英就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她的老家宁乡。

“我被一位叔叔背到韶山，87年我又去韶山时，那间养牲口的小草房子还在那山脚下，一位近亲收养了我。他们提心吊胆的，把我东藏西躲，不露风声，就这，也没逃出敌人的追踪。没几天，我就被他们捉住，也算是平生第一次被捕吧。

“敌人捉住我，并不打骂，打骂一个小孩子有什么意思？主要是想用我当鱼饵，来钓老头子这条大鱼。他们用一根长绳子将我拴紧，另一头系在一块拴牲口的石头上，那石头有个专门穿绳子的小孔。给我留出很大的活动余地。我坐在地上，坐累了就站起来走走，想妈妈了，就哭，哭累了就睡。来往的老乡见我挺可怜，就向看护我的敌人说情，结果被那个小子喝退下去，还把枪栓拉得哗哗响。一位老奶奶路过时，捧出一把爆米花，放在我身边，叹了一口气，走了。我很饿，不一会就把地上的那一小堆爆米花吃完了。

“我被敌人拴了两三天。一个深夜，我睡熟时，被人抱走了，不知那人是谁。他背着我，翻山越岭，来到一户农家，两位哥哥正在那里等我们。”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腾出手，来铲除他的心腹之患——红军。1930年12月，他集结10万兵力，兵分八路，向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围剿”的结果是：中央红军在“朱毛”指挥下，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一个半师，缴枪一万三千支。

“朱毛”的名声越来越响，毛泽东的名气越来越大，特别在湖南，几乎是如雷贯耳。

捉不到毛泽东，敌人便采取中国的传统手法：斩草除根。对毛家三兄弟从监视转变为追杀。

为了保护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党组织决定把三兄弟秘密送往上海。

引用文字：

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处境危险，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板仓去了一信，让家人把毛岸英兄弟三个按信上要求送到上海。

1931年初，毛泽民的信，几经周折送到板仓，适逢毛岸英的舅妈李崇德从南京返乡在家，经家人共同商议，由李崇德负责操办并完成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的任务。走前做了准备，从亲友中筹集路费；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岸青改名为杨永寿；商定了护送人李崇德、杨母〔向振熙〕与孩子们的关系，让孩子们称李崇德为妈妈，叫外婆向振熙为奶奶；还找人弄清了过去上海的路线等等。当时毛岸英九岁，毛岸青八岁，毛岸龙四岁。祖孙三代人扮成走亲戚的样子，于1931年春节前起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由汉口转乘船去上海。

这年的春节是在路上渡过的。一家人小心翼翼，不事声张，团圆饭无心吃，孩子们也没有放鞭炮。春节后，

他们一路风尘，终于到达上海，按照毛泽民在信中〔约定〕的接头地点——〔来到〕辣斐德路（现名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和夫人钱希均到酒店同杨开慧的母亲、李崇德及三个孩子见了面。

——引自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P20—21，〔〕内文字为引者所加。

“我们三兄弟见面后，就由大人护送去上海。都改了姓名，老头子的名声太大，不敢姓毛，我改名杨永泰，在路上大人也叫我金根，哥哥们改叫什么，就不晓得了。我们是分开走的，在路上没见到哥哥及外婆。

“舅母和一位叔叔带着我，那叔叔就是杨秀生，到上海后他一直跟着我保护我。我喊舅母妈妈，喊杨秀生爸爸，扮成一家人，到上海探亲。

“一路乘火车，年就是在车上过的，在车上，一路都是鞭炮声，还能看到焰火。小孩子过年喜欢点火放炮，对这记得清楚。

“有人说我们是从武汉乘船去上海的，那可能是说大哥他们，我记得我们路过杭州，还停留一下，玩了西湖，舅母抱着我照了像，我还用手去摸那光滑的彩色琉璃瓦。我背上的这个记号，就是在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留下的。

“从杭州去上海，有一位叔叔来接应我们，他长得五大三粗，又高又壮，走在人群中高出人半头。他把我们领进站，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没多久，就来了一个警察，

大个叔叔和那警察说起了话。不知是接头没对上暗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没讲几句，大个叔叔便说说笑笑拉拉扯扯，和那警察进了厕所。出来时，他插着匕首的绑腿上，有血迹。他在厕所里把警察杀了。

“从大人脸色看，情况严重，大个叔叔同舅母和杨秀生匆忙说了几句话，就快步离去。他一走，舅母便扒开我的上衣，抱紧我，在我背上，就是左臂胛骨下的那块肉，使劲咬了一口，疼得我啊啊大叫，咬了一口还不算完，杨秀生又用香烟头，在咬伤处乱烫，烫得烂肉滋滋响，疼啊，那才叫疼痛的记忆呐，我哭啦，哭得没人腔，招来许多乘客围观。怕招来警察，他们才住手，往我嘴里塞鸡蛋糕，边塞边说：不哭不哭，吃鸡蛋糕吃鸡蛋糕。嘴里有东西，就哭不出声啦。我边吃鸡蛋糕，边哽咽着，抽抽泣泣，满脸是泪。

“车上的人并不多，刚过年，人走动少。警察倒不少，他们不时就来往一趟，盘问、搜查，弄得大家提心吊胆的。

“那个大个叔叔又来了，他坐在我们附近，也不和我们搭话，警察一来，他就走，也不知躲在哪里，警察一走，他又坐回原位，看上去很神秘，象孙大圣似的。

“一车厢人，可能就数我最难过，背上的伤口，出了粘水，粘住了衣服，车厢一晃，或一不小心，就扯疼伤口，一疼我就叫，就哭，大人就手忙脚乱地往我嘴里塞鸡蛋糕。吃饱了，我就趴在舅母怀里睡着了。

“大人是怕我丢了，才咬我一口，作个记号。后来背上的伤口发了炎，留下个永久性的疤，现在仍能看到淡白色的疤痕。

“睡醒时，车就快到了上海。大个叔叔拿着一条麻袋走过来，要把我装进去，我不干。他就厉声说：你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进去。我有点怕他，不敢吱声。他撑开麻袋口，舅母就把我放进去。大个叔叔又说：不许哭，哭就没命了。他把麻袋口一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得车停时，是被人背下去的，到了出站口，背我的人又把我往空中一抛，我飞了一下，又稳稳落在另一个人手里。

“出了车站，也许是走了很远。他们才打开麻袋，放我出来。接着往前走，走大街，也走小巷，最后在一家小食品店门口，见到我的两个哥哥和外婆。一见面，大家都很高兴，但不敢笑出声。只有我，背上疼，有点想哭。

“后来我们又来到一家饭店，在这个饭店里见到我亲叔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刚失去亲人，又见到亲人，悲喜交集，大哥一见到叔叔就放声大哭，我见大哥哭了，背上又疼，也跟着哭起来，比大哥哭的时间还长。

“在叔叔那里吃了一顿好饭，他安顿我们一行人住下。可能就在那几天，我见到了大胡子爷爷周恩来。他一见面就抱起我，让我喊他爷爷，还说：见到长胡子的，喊爷爷；短胡子的，喊叔叔；没胡子的，喊哥哥。在场

的人都被他的话逗笑了。其实他比我老头子还小五岁，喊他爷爷吃亏了。

“没过几天，叔叔就把我们兄弟三人送到上海大同幼稚园，幼稚园是地下党办的（大同幼稚园系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互济会主办——笔者），里边的阿姨，我们喊姆姆，都是修女，黑裙子黑头巾，一身黑衣服，走起路来，慢腾腾的，显得很庄重、严肃。

“我的床铺靠着窗子，窗子漏风，杨秀生叔叔就用纸糊住。我那时小，杨秀生象个男仆似的，跟着我，保护我，不晓得那时他睡在哪里。

“开始时，在幼稚园吃饭是要靠抢的。姆姆们把一筐馒头什么的，抬进来一放，就不管我们了。几十个孩子，一轰而上，抢啊，谁抢到谁吃。我抢不过他们，杨秀生叔叔就把我抱起来，从孩子们的头上，伸过去。我两只手一齐抓，抓他三个四个的，杨叔叔也用另一只手去抓，一把就抓两三个，我们总能吃的饱饱的。后来就不行啦，吃不到饭的孩子饿哭了，姆姆就改革。开饭时，让我们排成队，姆姆发饭，一人领一份，谁也别想多吃。杨叔叔也沾不上光，只好到外边去吃，他有钱，地下党给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活费，都装在他口袋里。

“那时我是很调皮的啦。杨叔叔这个人嘛，也不朝好处教我，我调皮，他还很得意，有时他还出点子教我调皮，气那些姆姆。姆姆一生气，他就乐得哈哈大笑。

“姆姆们都有一只专用的圆凳，那是谁也不许坐的，

甚至不许我们动一动摸一摸。姆姆来时，就正正规规地坐在那圆凳上，教我们唱歌、认字、讲道理。一次，姆姆不在，杨叔叔把我抱起来，放到那只圆凳上，让我站直，向他敬礼，敬完礼，又教我唱湖南老家的山歌，什么哥呀妹呀的，我又不懂，也记不住，就跟着他直着嗓子嚎。一嚎把姆姆嚎来了。她一进门，见我站在她那神圣的圆凳上，气得两眼瞪圆，步子加快。大喊一声：下来！我下不来，就让杨叔叔把我抱下来。姆姆明白了怎么回事，把杨叔叔狠狠训了一顿，说我们破坏了幼稚园的规矩。

“其实姆姆也是个假正经。带我们的那个姆姆，长得有几分姿色，杨叔叔嘛，也能理解啦，对她有意思。我小孩子懂什么，又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眉来眼去，直到后来才晓得。

“那天，姆姆还没来，杨叔叔对我说：都说上海人裙子里不穿裤子，等姆姆来，你掀开她的裙子看看，到底穿没穿。我虽调皮，但让我去掀姆姆的裙子，还是有点犹豫。杨叔叔又说：我晓得你不敢。他这是激将法，小孩子，一说他不勇敢，他就勇敢了，我马上说：我敢。

“那个姆姆走过来了。我窜上去，绕到她背后，一把扯住她的裙角，往上一举，把裙子掀得很高。里边有裤子，不是光屁股。我赶忙跑向杨叔叔，报告说：里边有裤子。杨叔叔听了哈哈大笑。

“姆姆气坏了，噔噔噔，走到我们跟前，我赶忙躲在

杨叔叔身后。她就骂杨叔叔：侬啊不是个好东西。

“气归气，骂归骂，都是假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没几天，那个姆姆就和杨叔叔搞上了。

“杨叔叔和那个姆姆私通，是花钱的啦。旧上海，这种风气特浓，女人都可当摇钱树，杨叔叔口袋里又有钱，是我们的生活费。两厢情愿，双方得利，何乐不为。可杨叔叔口袋里的钱，也不是金山银山啦。钱花光了，姆姆不干了，嫌杨叔叔土气，杨叔叔不罢休，姆姆就报告了警察。

“那天我们一群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游戏，忽然院外有人大喊：警察来抓人啦！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一听，都慌了。两位哥哥懂事，以为身份暴露，警察是来抓他们的，就让几个小朋友帮他俩搭个人梯，翻墙头跑了。我不知道跑，杨叔叔带着我也跑不了。他还很镇静，其实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几个黑狗大摇大摆地走进幼稚园，直奔杨叔叔，走到跟前，当头的黑狗阴阳怪气地说：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吧，免得动手动脚的。我一看他们要带走杨叔叔，哇地哭起来，抱住杨叔叔的腿不放手，边哭边说：他是我爸爸，你们不能抓他呀，他是我爸爸。一个黑狗把我拉开，说了声‘去去去’，就把杨叔叔带走了。

“哥哥们跑了，杨叔叔被抓了，身边没有亲人啦。举目无亲，就哭啊。我坐在大门口，哭着，还骂着：操你妈黑狗抓我爸爸操你妈黑狗。天快黑了，一个姆姆拉我

起来，让我回去睡觉，我不干，她硬拉，我顺嘴把她也骂了，姆妈生气啦。不管我了。我还坐在门口边哭边骂，最后哭累了，骂累了，就在门口睡着了。守门的老人，见我可怜，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我身上。

“第二天一早，杨叔叔又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他见我睡在门口，赶忙把我抱起来，又谢了那位给我盖棉袄的老人。对我说——也是说给那两个警察听的：爸爸没事，你别害怕。其中一个警察听了便说：走吧，别多说话啦。

“我们到了警察局，进门一看，和杨叔叔私通的那个修女也坐在屋里。一个微胖的警察，看上去是个当官的，坐在正中间，见我们进来，便开始问我：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杨永泰。

“胖警察指指杨叔叔，问：他是你什么人呐？

“我背书似的答道：他是我爸爸。

“胖警察又问：你们的家住在哪里？

“我说：我们没有家。

“看样子胖警察对我的回答挺满意，又转过脸去问那个修女：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修女半掩着脸，断断续续地说：他……他强奸我。

“杨叔叔一听，就大喊冤枉：老总啊，你要明察呀。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象个强奸犯吗？是她让我玩的，她是个暗娼啊。我没钱了，就说我强奸她。

“修女一听，说不清了，腾地站起来说：你别听他胡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杨叔叔急了：孩子不是我的还能是你的？你的私生子多啦，找去呀。

“有我这个小孩子在场，也对证过了，杨叔叔老实巴脚的，又不象个坏人。警察就转向我们这一边。那时候，警察只会同情嫖客不会同情妓女，他们也常嫖嘛。亲不亲，一路人。胖警察说：行啦，别吵了。他问修女：你说他强奸你，是怎么个强奸法？

“屋里的警察们一听，乐了，也纷纷挑逗修女：是啦，你说说，他是怎么强奸你的？

“修女哪能说出口，难为情，结结巴巴的，什么也讲不清楚。警察哄堂大笑，还督促她：说啦，说说具体过程。

“修女遮住脸不吱声。杨叔叔趁机说：老总啊，是她说她身上痒了，让我去的呀。你想想，一个人强奸一个人，怎么能强奸成啊。老总啊，你也是有经验的人……

“胖警察一摆手，打断杨叔叔的话：行啦行啦，你们都回去吧。简直没事找事。

杨叔叔抱起我，又朝修女啐了一口：以后有钱擦屁股，也不给你这种人。

“我们回到幼稚园。没过多久——我们总共在幼稚园过了一、二个月，记得那时天气还不热——大同幼稚园就解散了。”

据他所述，大同幼稚园解散的时间大约在 1931 年 5 月左右，为了比较，再引用部分文字。引文与他的叙述的差异之处，请有心人注意。

引用文字中断故事的连续及流畅，容易扰乱读者之视线。引用以下这段文字后，我尽量再不引用，也少插言。听他独语。

引用文字：

不久，毛泽民夫妇亲自把三个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园，……由于环境恶化，1932 年 3 月前后，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岸英兄弟暂寄养在董健吾家。当时，董健吾和夫人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生活期间，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当时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蒲化人等同志，曾多次到董健吾家看望他们。岸英兄弟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住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兄弟有些怨言。1932 年 8、9 月份，毛岸英兄弟被送到凤阳路修德里 541 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告诉黄慧光，说这是他朋友的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和他的子女们，岸英兄弟是毛泽东的孩子。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敌人疯狂地到处抓捕共产党人

和进步群众。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兄弟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时刻提心吊胆。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们出去，也没有让他们上学。在黄家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为了安全他们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斯盛里。

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里生活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在生活上给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当时董以牧师职务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没有了固定经济来源，无法照管黄慧光的生活。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兄弟的生活供给。黄慧光是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生活极其艰难。全家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家里的其他人，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维持生活。岸英兄弟也帮助扎纸花和干些家务活，减轻家中的困难。当时，岸英兄弟过的是饥寒交迫的日子，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由于生活无着落，岸英兄弟便经常流浪街头。

——引自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P22—24

“大同幼稚园被解散后，党组织把我们兄弟三人安排到董家寄养。董家独门独院，有天井有围墙，住处比较

宽敞，有正房、偏房、厨房、书房，我们兄弟三人，还有杨秀生，就住在董家的书房里。

董家的主人叫董健吾，是地下党员，以天主教牧师身份掩护工作。他一家人都跟他信教，脖子上也挂个十字架，但不象他那样一天到晚穿着一身黑教衣。

刚进董家门时，和董家人在一起吃了几顿饭，后来我们就自己开火，有一个煤炉，杨叔叔做饭。他也不精于此道啦，整天煮面条给我们吃，难得吃一次大饼油条，更谈不上白米饭红烧肉。

一天，杨叔叔买回一大把油条，进门就喊：今天吃油条啦！我一见油条，慌忙扑了上去，没留意书柜上的一个花瓶，我撞动书柜，花瓶‘嘭’地一声，摔落地上。我平时很调皮，积怨太多，大哥见我打碎了人家的花瓶，就抓住这个机会，狠揍了我一顿屁股。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他们也不理我，只顾吃油条。等我哭完了，油条也吃完了，我一根也没吃到。

可气的是，杨叔叔身上带着一只光滑滑油亮亮的牛角，可能是他干赤卫队员时用来联络的工具，每当我哭时，他就解下牛角，模仿我的哭声，哇哇乱吹，嘲弄我。那次趁他睡着，我撩开他的衣襟，想把他的牛角偷来扔掉，可是拿不掉，牛角用一支小铁链系在他腰带上，我攥住光滑的牛角，用力一拉，却把他拉醒了。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攥得我好疼好疼，问：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玩玩你的牛角。他不干，把牛角掖进衣服里，一转身，

又呼呼大睡。

那时我们的吃喝，都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供应的，供应不及时，我们就得挨饿。饿得没办法，就出去捡呀讨呀，吃一口是一口，肚子里填点东西总比空着舒服。

后来到了冬天，下起雪，没有吃的，也出不了门去捡去讨了。大哥就带我们打麻雀。我们没吃的，麻雀冬天也没吃的，就弱肉强食吧，这也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在院里雪地上，打下三个小木桩，一前两后，呈三角形，绷上一条小竹竿，用一条绳子拴住竹竿的一头，牵在我们手里，竹竿前，撒上些食物，食物是董家吃饭掉在地上，我们扫来的米饭面条什么的。麻雀一见吃的，哄地从屋顶树上飞下来，密密麻麻落在竹竿前，我们一提绳子，竹竿就弹了出去，一个横扫，准能打到几只麻雀。都是活的，在雪地上扑扑腾腾，我们赶忙扑上去，一个个捉住它们。也不去毛，摔死放在炉上就烤，烤得油光黄亮亮的，吃到嘴里，皮脆肉香，骨头都舍不得吐。老虎吃人不吐骨头，我们是吃麻雀不吐骨头。人饿极了，能放进嘴里的东西，就很难吐出来。

尝到甜头，打麻雀就成了我们每天的主要任务。那次竹竿飞得太远，正好打在路过的董家大姐的腿上，打得她哎哟一声，蹲在地上。董家大姐倒没说什么，她妈妈却把我们骂了一顿，不让我们在院子里打麻雀。

董家的几个孩子，就数这位大姐待我好，常带我玩，还给我起个名字，叫董沛。出门去玩时，她就喊我

那个名字。她可能知道了我们兄弟的身份，怕暴露。

大姐姐也信教，胸前挂个十字架，亮晶晶，很好看，我就想要一个。小孩子嘛，看什么好玩就想要什么。她说：你得洗脸，才能挂这个。我一听这么简单，赶忙跑回去，把脸洗一遍，没擦干就跑去找她，伸出脸让她看：你看，我洗过脸了。谁知她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边笑边说：不是洗脸，是洗礼。她那上海话发音不准，我把洗礼听成了洗脸。便问她：怎么洗礼。她止住笑：走，姐姐带你去。她把我带到一个教堂，对着一个挺可怕的人形，就是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啦。让我祈祷。我哪会祈祷，站在哪儿不知所措。她就做起祈祷的样子，教我。我见她一动不动，就笑嘻嘻地伸出手，去抓她胸前的十字架，可没抢成。大姐姐生气了，我也没带成十字架。

我们在董家就过一个冬天。打麻雀那阵子，一位叔叔来看望我们。不晓得他是谁，那时有很多叔叔来看过我们，记不住。他带来一架相机，要给我们兄弟三人照像。那天是个晴天，雪化着，很冷，一出门我就打个寒颤，杨叔叔怕我冻着，就脱下他的棉袄给我穿上，我象穿个袍子似的，和两位哥哥并排站在窗前的台阶上，合了一张影。

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后，完全断绝了我们的供应。杨秀生走了，董健吾也不见了（董健吾调至武汉工作，后去延安——笔者），董家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嫌我们是

累赘，让我们帮他家干活，却不给我们饭吃。有时，他们一家人在屋里有声有响地吃饭，我们兄弟三人就在另一间屋里挨饿。饿得肠子乱翻，胃又酸又疼。听到董家屋里传出的碗盆声，我总忍不住向那边看一眼。大哥抱着双腿坐在墙边，不让我看，说人要有骨气，不吃饭也要争一口气。大哥比我大五岁，那时懂事了，可我不行呀，哪知什么是骨气，肚子一饿，就想吃。

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啦，也不顾大哥的眼色，董家吃饭时，就凑了上去。倚着门框，眼巴巴地望着桌子上的米饭，还有菜，对那位大姐姐说：大姐姐我饿啊，我好可怜呐，妈妈被土匪杀了，家被土匪抢了，我好饿啊，给我一口饭吃吧。那时经常说这几句话，嘴巴也练溜了，我一口气说了好几遍。董家妈妈不耐烦了：行啦行啦，别说了。一人省一口，养条大肥狗。上帝恩赐你。

董家大姐姐看着妈妈的眼色去给我盛饭。谁知大哥跑过来，大声问董家妈妈：上帝在哪里？要是真有上帝，我们就不会挨饿了。

大哥那时读过书，又受到不少革命前辈的教育，不信上帝，与董家妈妈顶起嘴来。董家妈妈很生气，说我们不识好人心，知恩不报，还骂了我们。大哥朝她呸了一声，拉着我就走。快到嘴的大米饭被大哥呸掉了。

住还是住在董家，吃要到街头去找。大哥带着我和二哥，象个小小讨饭队，走街串巷，沿门乞讨。讨不到，就捡些废纸破鞋底什么的，卖几个铜板换口饭吃。有时

运气好，还能在小饭馆吃到被人咬过的包子、喝口剩汤。那一天，我们没讨到吃的，很晚才回到董家，董家插了门闩，推不开，我们就喊：开门，我们回来了。可是怎么喊，也没人来开门。趴在门缝瞧瞧，董家屋里还亮着灯。这不是成心不开门吗？我们很生气，又拍又打又叫，折腾一会，还是没人来开门。进不了屋，半夜三更的，我们到哪里去睡觉。我们兄弟三人都急了，从地上捡起砖头石子，扔进院里，哥哥们扔大的，我扔小的，一阵‘弹雨’飞过去，只听‘哗啦’一声，窗子玻璃打破了。我们有点害怕啦，也听到董家大哥哥叫骂着跑出来。我们转身就跑，董家大哥哥开门便追。

两个哥哥在前，我跟随在后。我们跑啊跑啊跑啊。跑到一盏路灯下，二哥的一只鞋子跑掉了，他想停下来去捡，回头一看董家大哥哥紧追不放，就顾不上了，又跑开了。我在后边见二哥的鞋子掉了，就停下来，平时连个破鞋底都不易捡到，这能穿的鞋丢了多可惜。就在我捡鞋时，慢了几步，被董家大哥哥捉到了。他拧住我的耳朵，从我手中夺过二哥的那只鞋，朝我屁股，一阵猛打，疼得我嗷嗷直叫，连声说：不是我砸的呀不是我砸的。

两位哥哥听到我叫喊，又跑回来，站在十来米远的地方，大哥朝董家哥哥摆着手说：来呀，玻璃是我砸的，来捉我呀。董家哥哥火了，放开我，把手中的鞋一扔，就去追大哥。我趁机溜掉，想找二哥的那只鞋，但没找到。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进过董家。我们兄弟三人流落在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边。解放上海时，部队从桥上过，我手扶桥栏，很有感慨地看了几眼，变了样啦。现在就更变了。”

第四章 出没或飞翔在阴沉的 苏州河畔的小小星辰

我们兄弟三人流落在外白渡桥、老垃圾桥、张家桥一带，那里靠黄浦江，是苏州河的入江口处。那里的景色，与苏州河这个好听的名字相比，太不相称啦。除了破房子、破棚子、破木船，就是臭水沟、烂水坑、黑乎乎的煤堆。满眼都是破破烂烂的东西。工厂大烟囱冒出的黑烟，轮船喷出的浓烟，把天熏得黑乎乎的。那时的天，好象从没晴过，总是阴沉沉灰乎乎的，象一口倒扣的黑锅。雨还多，雨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雨天对我们流浪儿来说，是最难过的，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再被雨水一浇，容易生病，病了就容易死。那时死一个穷孩子，就象死一只小鸡子、小老鼠。

我们住的地方，与市中心相比，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那里是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小汽车、霓虹灯、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大鼻子洋人，大肚子商人，高级妓女，投机分子，道貌岸然的流氓、强盗、杀人犯，来来

往往，为所欲为，啥事都干得出来。今天在一起兄呀弟呀的举杯畅饮，明天就可能兄杀了弟或弟杀了兄。表面富丽堂皇；内底肮脏透顶。脏，有的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脏，里头暗藏着糜烂、腐败、杀人、放火。这么一说，他们那里是实实在在的地狱。我们穷孩子住的地方却成了“天堂”。都是小孩子嘛，肩头不挑古今愁，心中不想天下事，只要不饿不冷不病，就觉得欢乐。苦中之乐，更难得，也记得清楚。苦难太多，相反就记不住了。

那晚我们兄弟三人从董家逃出来，在一个墙角缩了一夜，第二天便乞讨到苏州河边，那里是贫民窟，好讨，讨得到。大哥带着我们沿河边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捡个破烂。二哥还赤着一只脚，后来捡了一只大人的破鞋，穿上，拖着走，才免受脚皮之苦。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人住的破木棚，是苏州河的船工留下的，也是住不下去才搬走的，能住的棚子是轮不到我们住的。那个木棚顶上透天，四周透风，没有门，风一吹就嘎嘎吱吱乱响。再破，也比睡露天强，大哥就带我们住下了。我们兄弟三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家”。

“家”里一无所有，别说棉絮，就是一把稻草都没有。我们躺在地上睡觉，天还冷，夜里我经常冻醒，冻得直哭。我一哭，大哥二哥就爬过来，一边一个，挤着我，给我挡风取暖，我们三兄弟抱在一起入睡。睡睡醒醒，冻得实在睡不着，大哥就带我们乱蹦，蹦出点热乎来，再

勉强睡下。

一下雨，棚子里满地是水，就睡不成了。我们兄弟三人，蹲在不漏雨的一角，挤在一起，互相取暖。那种夜晚显得真长啊，好象比一年还难熬。盼雨停，盼天明。天明雨停，肚子又饿了，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赶忙四处找吃的，讨饭、捡破烂。

后来，我们捡到一些破布、破棉絮。五颜六色，又脏又臭，那时却是无价之宝，大哥用绳子把它们连起来，我们总算有了一床“被子”。

讨不到饭、捡不到破烂，我们就开始捡煤渣，煤渣能换钱，也能换大饼油条。

没多久，苏州河边又来了一帮穷孩子，他们大都和我们一样，失去亲人，无依无靠，有的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张哥哥，和大哥差不多大，我记得清楚。河边成了我们这帮穷孩子的家园。

人多，煤渣少，就不好捡了。捡不到煤渣，就没吃的，就要挨饿。饿了怎么办？偷吧。河边有的是成堆成堆的煤炭。守煤人一不注意，我们就溜上去，装一蓝子就跑。拎去换馒头。有一次，我正在煤堆边往篮子里扒煤，没扒满，放哨的孩子就喊起来：“来人啦，快跑呀。”

我赶快扒几把，煤就是馒头嘛，扒煤就是抓馒头，都想多抓一些。装满篮子，我提着就跑，篮子重，跑不快，又舍不得扔掉，我就被守煤人捉住了。

那小子抓住我的胳膊，拧住耳朵，几乎把我提了起

来，还骂我瘪三，用脚踢我屁股。我哇哇大叫，骂他、咬他，越骂越咬，耳朵和屁股越疼。

大哥见我被捉住，跑过来，抓一把煤灰，朝那小子脸上扬去，迷住他的眼睛。他抽手揉眼时，大哥拎起篮子，拉着我就跑。那小子大骂着追上来，小伙伴们捡起煤块，朝他猛打，打得他左闪右闪，护头护尾，也不敢追了。

穷孩子都是一棵树上的苦瓜，难兄难弟，同命相怜，不用人教，也知道抱成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环境决定人嘛。现在吃穿不愁，可就难说啦。

穷孩子也有穷乐。有时吃饱没事，就玩游戏，模仿豪侠结拜、好汉称雄，故事当然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我们堆土成坛，插草为香，围成一圈，撅起屁股磕头，喊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生，但愿同死”，这是“桃园结义”；有时玩“梁山好汉”，排上坐次，以长幼次序，分出大哥二哥三哥。我大哥总是个头。我们当小弟弟的，还用只破碗，从河里舀水当酒，跪敬大哥。有一次，几个大鼻子洋人，见我们玩得热闹，还用摄影机给我们拍照。他们是拿回去当新闻片放映，赚钱的。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长子若父”，大哥那时候真象个小父亲，照顾我和二哥。一个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多难。你让我根据穿着回忆时令，不行呀，一年四季，就那么一身衣服，分不出个哪年哪月春夏秋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说得太对

啦，现在十来岁的孩子，还争嘴呢，大哥那时也不过十一、二岁，早成了一家之主。一碗饭，他让我们先吃，自己喝口剩汤，捡双破鞋，给我们穿，自己打赤脚。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哥可是完全做到了，比说这句话的人做得还好。他那时有啥能耐？凭一个十来岁孩子的能力，在那恶劣的环境中，没让我们饿死，简直是个奇迹。

大哥对我照顾最多，我呢，还不争气，常给他找麻烦，调皮就不说了，单说生病。

年纪小，身体弱，饥寒交迫，病就来找你。病就象我要好的小朋友，动不动就找上门来和我玩，那可不好玩，是玩命呐。人们传说我病死了，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

那一次，我是被雨淋病的，也是饿的，肚里没食，雨水一浇，还有不病的？发高烧，又没有体温表，也不知烧到多少度。只觉得浑身火烫火烫的，睡在地上昏迷不醒。哥哥们急坏了，怕我死掉。那时一个穷孩子生病，没钱治没药吃，只能把命交给老天爷，由他看着办。听天由命啦。能撑过去就活，撑不过去就死。

哥哥们一步不离守着我，也不知睡了多久，我迷迷糊糊醒了，大哥一见，忙擦去他脸上的泪。问我：“小龙小龙，你想吃什么？哥哥给你买去。”

我病了，多数是饿的。肚子饿呀，我就喃喃地说：“想吃面条。”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想象力也受到限制，想

不到鸡呀鱼呀的。若是想到了，就糟了，大哥更犯难。

大哥忙说：“行。我去给你买面条。”他吩咐二哥守着我，就跑出木棚。等他端着一碗面条跑回来时，我又昏睡过去。见我不能吃，他就把面条放在蓝子里，用块破布盖上，让二哥守着我，等我醒来喂我。自己又跑出门找活干。

天快黑时，大哥提着一捆破纸烂布回来了，我已经醒来，朦朦胧胧地看到他，便说：“你给我买的面条哪？”

大哥就问二哥：“你没给他吃？”二哥没吱声。

大哥掀开破布，见碗里只剩一点汤，就大声问二哥：“面条哪？”

二哥吱吱唔唔地说：“让小龙吃了。”

我一听急了，明明没吃嘛，又哭又喊：“我没吃呀我没吃呀，我要吃面条。”

大哥知道面条被二哥偷吃了，气坏了，狠狠揍了他一顿。二哥也饿，毕竟没大哥懂事。他哇哇地哭起来，我没吃到面条，也哭起来。大哥见我俩都哭了，也不揍二哥了，干脆也放声哭起来。我们三兄弟哭成一团。

我病好后，杨秀生不知从哪里跑来了，找到我们。一见面，都很高兴。我问：“爸爸你到哪去了？”

大哥立即制止：“别叫他爸爸，叫叔叔。”

杨叔叔没有说明他这段时间的去向。见我们很饿，就上街买回很多大饼油条，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腰都弯不下来，一说话，喉咙里的大饼油条就能带出来。吃个肚

圆肚胀后，杨叔叔又帮我们修理木棚子，用绳子固定棚柱，找些牛毛毡纸盖住棚顶，又捡来个草帘子，挂在出门，当门。四周没法修，漏缝太多。好在那时天已不冷。

我们的“家”焕然一新啦。上面不漏雨，雨天可以放心睡觉，那感觉，比现在住进高级宾馆还舒服。

杨叔叔白天外出打工，挣钱养我们，晚上回来，睡在木棚附近一只倒扣的破木船下。有个大人照顾，我们的生活大有改观。当然也改不到哪儿去，只是不常挨饿。

那天下午，杨叔叔提前回来了，还带来一位新叔叔，新叔叔眉清目秀，象个读书人。他来到木棚前，望着我们兄弟三人的破衣脏脸，又瞄一眼我们狗窝不如的“家”，一把把我们揽在怀里，半晌没说话，很难过的样子。

杨叔叔介绍说：“这是木头桥叔叔。”

我们兄弟三人几乎是一齐喊出：“木头桥叔叔。”

木头桥叔叔放开我们，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五香豆腐干：“叔叔给你们吃干子。”

好味道呀，香气直往鼻孔里钻，我接过豆腐干，飞快塞进嘴里，一嚼，满口生香。三下五除二，装进肚里，转眼手中只剩下最后一块。我想了想，就慢下来，把最后一块豆腐干轻轻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嚼呀嚼呀，从左牙，到右牙，翻过来，调过去，嚼得稀糊糊的，还舍不得咽下去。一咽，香味就没啦。最后没留神，变成稀水的豆腐自动流下肚去。看看两位哥哥，分给他们的豆

腐也早进了他们的肚子，没指望啦。我赶忙问木头桥叔叔：“你明天还来吗？”

木头桥叔叔的脸上不知是哭还是笑，哭笑交加吧，他连声说：“来、来、来、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那个记忆太深刻了。五十年代，我在北京见到胡乔木叔叔时，他笑着问我：“五香豆腐干好吃吗？”我一楞，没转过神来，这句话问得太突兀。他又笑着提醒：“苏州河边的破木棚子前，木头桥叔叔的五香豆腐干好吃吗？”我恍然大悟，木头桥叔叔就是他——胡乔木叔叔，赶忙“啪”地一个立正，向他敬个军礼，百感交集地说：“好吃，一辈也忘不了。”他哈哈大笑。没有酒，我们是“把茶话桑麻”；桑麻也没有，有的是那段往事。

吃过豆腐干的第二天，木头桥叔叔又来了，给我们带来一副担架，放进木棚，两头垫几块砖头，当床用。我们“家”从此有了一张“床”。就是小点，睡不开我们兄弟三人，大哥被“挤”开了。他仍睡在地上，我和二哥睡在“床”上。

自木头桥叔叔来后，我们那群穷孩子的游戏也换样了。从散乱变得正规，结兄拜弟改成识字练兵。木头桥叔叔启蒙教育我们，朝救穷人救中国的革命大路引导我们。他给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在世上独一无二。

从识字开始。穷孩子，大都不认字，一个“两眼黑”接受革命道理就难啦。木头桥叔叔当起幼儿教师，课

本是装在他脑子里，教学用具是随地捡的。一块木板，挂在木棚边，就是黑板，捡块煤泥，可当粉笔。我们十几个流浪儿，坐着，也有的站着，在黑板前，听木头桥叔叔讲革命道理：穷人干活为什么穷？富人不干活为什么富？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富豪劣绅。他写在黑板上的字也都是当时的革命口号：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这课当然是偷偷摸摸上的。我们有岗哨，站岗的孩子一旦发现情况，就跑回来报告。木头桥叔叔便擦掉“黑板”上的字，重新写上：天地人物日月星辰米饭油条什么的，还教我们大声朗读。

我能写的第一个字就是“人”，一撇一捺，简单。可直到现在，我也没把这个“人”弄懂。人，不简单呐！

有一次，我问木头桥叔叔：“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木头桥叔叔哈哈一笑：“叔叔就是一座桥嘛。要把你们驮过一条河。”

我又问：“那条河有苏州河宽吗？”

“宽，很宽很宽。”

“那你可没有外白渡桥长。”

木头桥叔叔被我这孩子话逗笑了，他望着我说：“是，没它长。以后还有别的叔叔来驮你们。一定能把你们驮过去。”他看着灰乎乎的苏州河，又说：“叔叔是座木桥，那些军舰一炮就能打塌。你长大了，要开着咱们自己的军舰，去把列强的军舰打沉。”

我仰着脸说：“我就喜欢开军舰，当船老大。”

木头桥叔叔一把抱起我：“行，有出息。”

“政治军事学院”的第二课程是练“兵”。

木头桥叔叔把我们组成童子团，选团长时，大哥和那位戴眼镜的张哥哥竞争。争来争去，还是大哥当上团长，他懂的革命道理多嘛。为了安慰张哥哥，就让他当团副。我们训练的项目，主要是列队、齐步走、左转右转、卧倒瞄准，每人肩上扛着根棍子、小竹竿，当枪。跟着木头桥叔叔的口令，做着动作。我最小，个矮，扛一根比我还长的小竹竿，排在队伍最后，象个小尾巴似的。他们走快了，我就得跑步，才能跟上。有一回，跑倒了，跌个嘴啃泥，强忍着才没哭出声。当“兵”要勇敢嘛，一哭就不象样啦。

国共相争，都在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国民党的接班人是冠冕堂皇的在高等院校、军事大学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下一代大都象我们这样在荒山野地偷偷摸摸培养出来的。最终，他们却被我们打败了。我们的环境艰苦，磨练了意志；他们养尊处优，倒养出了毛病。我们这个小队伍乱七八糟；他们的大军是乌七八糟。我们为人民解放而战，人心所向；他们是为了继续压迫剥削人民而战，人心大背。这一条是主要的。“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嘛，自古就是这个道理。

玩打仗是小孩子常做的游戏，我们练了“兵”，就更想打啦。过去是打家劫舍杀富济穷的“绿林豪杰”，现在

是打倒列强救中国的“红军战士”。那天木头桥叔叔没来，大哥集合起“队伍”，严肃地说：“有一艘敌舰朝我们开来，炮轰我渔船，杀我百姓，现在，我命令，童子团立即登上战舰，把它击沉。”

大哥全副“武装”，腰间扎一根绳子，别着一个弯树根，样子十分认真，好象真的大敌当前。

我们童子团扛着，或端着“武器”，跑步来到一只停靠在河边的木船跟前，大哥一挥手，命令：“上船”。

我们一个个爬上船，大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舰长”啦，又一一分派任务：“你划船，你开炮，你负责打掉敌人的驾驶员。”划船的几个小朋友挺不乐意，捞不到“打枪”，不高兴啦。大哥又道：“划船也是战斗任务。”

“战舰”有舵，大家都争着去掌。掌舵是船老大的事，我就想当船老大，还能不争？

张哥哥反对：“你是个小战士，掌不住。”

我一听，也不顾“大敌当前”了，“哇”地哭起来，是撒泼，边哭边叫：“不，不，我要掌舵我要掌舵。”

“舰长”也不严肃了，赶忙哄我：“别哭了，你去掌舵，行了吧？”

我马上止住哭，笑嘻嘻爬到船尾，双手抱住舵把。

大哥一声令下：“出发！”划船的小伙伴用力一撑，木船驶离河岸。

大哥把拳头一挥：“射击！”

用嘴巴模仿的枪炮声“突突突”、“咚咚咚”响成一片。“战士”们边打边喊：“冲啊”，“杀呀”。好象前方真有敌人的军舰似的。

前方没有军舰，左边却驶来一只大木船。光顾冲杀，没在意，我们的小木船接近了主航道。划船的“战士”受撕杀声感染，把船划得飞快。

大哥慌忙喊道：“转舵。”

我哪能转动舵，晚了。小木船直往主航道冲去，大木船越来越近。“战士”们一见真正的对手来了，害怕啦，慌忙趴下去。只听“咚”地一声，我们的“战舰”撞到大木船的屁股上。大船没事，我们的小船一颠一转，没翻，大家也没事，就站在船尾的“舵手”，“噗通”一声，栽进苏州河里。

是大哥和张哥哥把我捞上来。张哥哥为捞我，眼镜掉进水里，几个大孩子潜水摸几次，才捞上来。张哥哥“重见光明”。

我被七手八脚抬上岸，吐了不少黄水，心里一阵扑腾，极难受，忍不住“哇”地哭起来，丝毫没考虑“舵手”的形象。

大哥又有歉意又有安慰地说：“行啦行啦，咱们不打仗了。”劝不好，我还哭。他生气了：“真是个小虫子，以后不和你玩了。再玩打仗，不让你参加。”

一听要开除我，我慌了；大哥他们不和我玩，我还跟谁玩去。止住哭声，哽哽咽咽难舍难分地说：“让我参

加吧。”

“你这么爱哭，给我们童子团丢脸，谁愿和你玩。”

“我不哭还不行吗？”我喃喃地表了决心。

大哥毕竟是大哥，怎能不跟我玩。他见我软了，便说：“好吧。看你以后表现。”那样子是“仗”兴未尽，他又集合起队伍，宣布：“我们不开‘军舰’了，攻‘山头’。”

我扫了大家的兴，大家就没尽兴，“仗”没打过瘾，一听说攻‘山头’，集体响应。

“山头”就是附近的一个大煤堆。童子团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张哥哥带领，先爬到煤堆顶，当守军；一部分由大哥指挥，当进攻部队，冲击煤堆。

我作为特殊“士兵”加入进攻部队。为了表明进攻部队的艰难性，大哥把我们的“床”搬出来，让我躺上去，由几个“战士”抬着，向“山头”冲锋。

冲上“山头”，免不了一阵“厮杀”。双方“战士”推推拉拉，拳打脚踢，“冲啊”、“杀呀”，一场“恶战”。抬我的“战士”一拳难抵两脚，站立不稳，倒了下去。我连人带担架，从“山头”一直滚到“山底”，满脸是灰。爬起来揉揉眼，强忍着，没哭出来。

大哥从“山头”一下子溜下来，表扬我：“有进步。这才像个红军战士。”我听了，觉得自己突然长大许多。

有时候，一句适应小孩子心理的话，对小孩子的影响是挺大的。从那以后，我还真的不爱哭了。也长大一

些啦。

我们那群流浪儿的快乐，都在这类似的游戏上。前边我所说的“天堂”，就指这童年乐趣。只是这乐趣太少了。

那一天，很久没来的木头桥叔叔来了，我们以为要上课，可没上，他脸色有点不对头，没有往常的笑容。来到木棚前，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架相机，给我们兄弟三人合张影，又交待大哥几句，就走了。

我们兄弟三人在木棚前的这张合影，文革时曾在阶级教育展览馆展出，我见过。

从那以后，木头桥叔叔再没来看过我们。他一走，童子团认不了字，练不了“兵”，冷清许多，大家都念道他，想他，可就是不见他来。我就问大哥：“木头桥叔叔怎么不来了？”

大哥眼望远处，若有所思地说：“他去找红军去了。”停一会，他又把木头桥叔叔给我们说过的话重复一遍：“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打着红旗，戴着红领章，帽子上有一颗红五星，可威武啦。等红军打过来，我们就有饭吃，有房住，有被子盖，什么都有。”

听大哥这么一说，我更想木头桥叔叔和红军了。

那天，有点阴，大哥带我外出捡破烂，顺着河边走，来到外白渡桥上。我们趴在桥栏上，朝下吐唾沫，看谁吐得远，唾沫落到水面，早散啦，又深，根本看不到落点。也不知什么牵动大哥的话头，他突然问我：“你敢从

这跳下去吗？”

我直摇头：“不敢。我也不想跳。”又问他：“你敢吗？”

大哥也摇起头：“我也不敢。”

我俩相互笑笑，又朝下看去，桥太高啦，水太深啦，深得怕人，没事，谁跳它干嘛。

就在这时，一只轮船呜呜地长叫着，从桥下钻出来，船头插着一面红色的旗子。我们一看，眼睛就亮了：打红旗的不是红军吗？！

大哥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叫喊：“红军来啦红军来啦。”

我也跟着大哥又蹦又喊：“红军来啦红军来啦。”

来往行人，听我们一喊，都停了下来，东张西望的，不一会就聚了一大群人。有的还问：“红军在哪儿？”

大哥指着那条船上的红旗，大声地说：“看！那是红军的旗。红军来啦。”

人们疑惑了，那条船也不理不睬地驶进了苏州河。红军没来，警察倒让我们喊来了。几个黑狗拿着棒子，驱散人群，边挥边叫：“抓住那两个小共产党。”

大哥一见不妙，拉着我就跑，从人缝里七钻八钻，溜得不见影了。

盼红军来，过好日子，好日子没盼到，穷日子也过不成了，在外打短工的杨叔叔被雇主辞退了。他一没工作，我们碗里的饭也就没了。挣几个吃几个，又没积蓄。光靠捡破烂，连破烂的日子也过不上。

饥饿又找上门啦。没吃的那几天，还老下雨，出不了门，破烂也捡不成。我们缩在木棚里，杨叔叔愁眉苦脸，我们兄弟三人一声不吭。挨着吧。过了一天又过一天，度日如年，雨还是下个没完。我饿得撑不住了，就想咧开嘴吧；大哥一瞪眼，我好不容易合上嘴，把哭声咽回肚里。哭声不是饭，咽下去也不管用啦。我就哼哼叽叽的，仿佛哼两声，就能满足肚子的部分要求。

杨叔叔把我揽在怀里，说：“雨一停，叔叔就上街给你买吃的去。说，想吃什么？”

我还是那句老话：“想吃面条。”说完又补充一句：“还有五香豆腐干。”

“行，吃什么都行，叔叔给你买。面条、豆腐干、大饼、油条、馒头、包子，买得多多的，一篮子，我们四个围着篮子吃，吃个够。”

那可是美好未来呀。我听了很激动，就说：“你太好了，叔叔。”

没想到杨叔叔听了我的话，头一转，呜呜地哭起来，边哭边说：“叔叔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爸爸妈妈。”

“叔叔别哭，哭给红军战士丢脸。”我安慰起杨叔叔来。

杨叔叔一听，不哭啦。

天终于晴了。杨叔叔去找工作，大哥带着我们去讨饭。侯门大户，进不去，就是进去，也讨不到，顶多讨到一顿打骂。我们找穷苦人家，只有穷人才同情穷孩子，

穷人怎么叫穷人？还不是缺吃少穿，又能帮我们多少？我们兄弟三人讨了一整天，喊哑嗓子，才有几位好心的婆婆给我们几块零碎的饼子、馒头，黑的。这点东西扔进肚里，象一颗小石子扔到苏州河里，咕咚一声，就没影了，讨不到啦，只好回“家”，等杨叔叔，盼他提个大蓝子回来。

那天杨叔叔很晚很晚才回来。我瞪着他的手，手里没篮子，更不见大饼油条馒头包子。他走进棚子，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吭声。

我凑上去问：“杨叔叔，你买的东西哪？”

杨叔叔还不吭声，停了好长一会才说：“叔叔会给你买的。”

杨叔叔真的给我买油条吃了，那是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他把我抱到街上，在一个油条铺停下，从衣袋里掏出铜板，买了两根油条，也不说话，默默递给我。

我狼吞虎咽，几口就把油条塞进肚里。

杨叔叔又把我抱起，来到一个街口，放下我，从衣袋里掏出一根稻草，插在我头上。然后，蹲在我身边，不吭声。

杨叔叔是想卖我。没吃没穿，又找不到党组织，杨叔叔的心情可以理解。兄弟三个都饿死，不如卖掉一个救活两个。我最小，难养活，卖我最合适。“牺牲”我一个，能救活两哥哥，也划得来。可当时我晓得那是卖我后，死活不干。

在街口等了半天，没人买，杨叔叔急了，象卖萝卜白菜似的，对来往行人大声吆喝起来：“你们把这个孩子领走吧，我养不活啦，求求你们啦。”他边喊边把我抱起来，亮出小鸡鸡，“是个男孩啊，求求你们把他领走吧。价钱好说啊。”

我听明白杨叔叔要卖我后，不干了。想挣脱他，跑掉。可挣不开，他紧紧抓住我。就求他：“叔叔别卖我，我不再喊饿啦，好叔叔，别卖我。”

杨叔叔听不进去，继续吆喝：“是个男孩呀，我养不活啦，求求你们把他领走吧。”

我害怕被人买去，求他又不管用。就又喊又叫又打又闹，骂他“坏人”，咬他胳膊。正挣扎着，两位哥哥找上来了，给我求情。

大哥苦苦地说：“叔叔别把他卖了，他还小呀，记不住家呀。我们少吃一口多干活，能养活他呀”。二哥跟着说：“你把小龙卖了，爸爸知道会骂你的，别卖他，到人家他会挨打的。”

杨叔叔犹豫一下，狠狠心，还是要卖我，他又吆喝起来：“求求你们把他领走吧，我养不活啦；是个男孩，价钱好说啦。”

要卖我，哥哥就干了吗？两位哥哥一边求情：“他还小呀，记不住家呀”，一边对来往的人大喊：“不卖不卖，他是我弟弟，我们不卖。”

那时候，养不活的孩子象荒草一样多，卖孩子的人

比卖粮食的人多。穷人家，自己的儿女都难养活，谁会再买一张嘴，再说，也买不起。富人家，倒有钱，可他们买一只小鸟也不买一个穷孩子。小鸟放在笼子里，挂在院子里，又叫又蹦的，多好玩，一个穷孩子有什么玩相。

吵吵嚷嚷卖了一天，没有买主。杨叔叔只好把我抱回“家”，哥哥们舒了一口气，我也是虚惊一场。一进那个木棚子，真觉得暖和。毕竟是家里温暖嘛。

我说的这个家，是我们兄弟三人的骨肉感情凝成的，无形。流浪漂泊挨饿受冻，都可忍，让谁离开这个家，我们受不了。险些被拆散的家，一点不少地回到木棚里，木棚当然变得非常温暖啦。

这个温暖的木棚子不久又没了。下大雨，一阵大风，把它吹散了。

好在天已不太冷了，我们可以睡街头，乞讨到哪里，就睡在哪里。

好在这时候杨叔叔找到雇主，在一家小饭馆帮工，并把我两位哥哥介绍进去当小跑堂。

天无绝人之路啦。哥哥去当差，我这个弟弟当然可以去沾光啦。

那个小饭馆可能是北方人开的，专卖面食，馒头、包子、稀饭。杨叔叔和面做馒头，哥哥烧火端盘子。我干不了活，老板娘也不会让我干，摔了她的盘子怎么办？我只好在饭馆里转转悠悠。吃口剩饭，喝口剩汤，有时还

能吃到掉在地上不能卖掉的馒头包子。后来就不管了，馒头包子一出笼，也不怕烫，我上去就抓一个，抓住就咬一口，咬一口，就没法卖啦，只好让我吃掉。老板娘很生气，骂我，打我，我一叫，杨叔叔和哥哥们就过来了。一张嘴斗不过四张嘴，一个人也打不过四个人。小饭馆，几乎天天，都充满“火药味”。

我们兄弟三个的肚子解决啦。穷孩子的肚子可没解决，那时也解决不了。一群捡煤渣的流浪儿，见我们兄弟三人在小饭馆有吃有喝，都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大哥一见心就软了，可怜他们。过过那种生活，都是一个路上的朋友嘛。他就故意把馒头包子弄掉在煤渣里，和煤渣一起铲出去，扔给那群流浪儿。那群孩子，捡到煤渣，又拾到吃的，很感激啦，在门口伸出大拇指，说大哥“够朋友”。

大哥是够朋友，老板娘却不够朋友，没多久，大哥“杀富济贫”的义举就被她发现了。气得她又骂又吼，把我们赶了出去，杨叔叔也不例外。

我们又开始流浪，大街小巷，城市城郊，随讨随吃，随地睡觉。饥一顿饱一顿，愁一段也能乐一段。流浪儿自由，只是那自由没几个人想要。

一天晚上，我们流浪到一个小食品店门口，里边的东西是吃不到的，我们就在这好吃东西的附近，马路边，过夜。有“望梅止渴”，也有“望食止饥”嘛。止不住饥，更止不住困，倒头便睡。半夜，我熟睡时，被人抱走了。

第五章 话说长征： 吃千家饭，走万里路

我和哥哥们不止一次失散。1932年“1.28”事变，鬼子飞机轰炸上海火车站，我们兄弟三人正在站前乞讨。飞机一来，人群哄散，混乱不堪，冲散了我们。我坐在地上大哭。可没多久，两位哥哥找到了我。我小，活动范围不大。

这次被人抱走，却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哥哥们。我去长征啦。那时老头子在江西，还没领着红军北上，我这个小孩子却先行一步。

红军长征路上，有大渡河、腊子口、雪山、草地。我长征的路上，没有大渡河，有的是河湖港叉，差点被淹死；没有腊子口有“虎口”，险些被毒死；没有雪山，有雪天，大雪天光着身子被人赶出家门；没有草地有草坡，我在草坡上给人家放牛、割草，几乎被打死。

红军长征，有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一路上受冻挨饿，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我的长征，有汉奸特务追捕

捉拿，一路上，挨饿受冻，雨雨风风，死死生生。

红军长征，是个千军万马的大队伍；我的长征只有两个人：一个大流浪汉带着我这个小流浪汉。

红军长征，有记载，行军路线，大小战事，现在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我的长征，靠回忆，时间、地点、先到张家还是先到李家，有的记不清，线路混乱，可事件全在我脑子里。

一个小流浪儿，和一个大军队相比，有点高攀啦。也不好比；他们集体回忆，互相补充，时间地点事件就清楚了。我不行，经历的事件，涉及的人物，发生的地点，有时难免说错。人小，又过了这么久，哪能都记得清楚。

老头子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我的长征可能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宣言书，宣告保护我的人都是英雄好汉，我活下来是个奇迹；我的长征也有宣传队和播种机，那就是众多引导我、救护我、为我吃苦受累、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他们向我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向我播种，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复仇的种子。

老头子又说我们兄弟：为了革命，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千里路。他说少啦，我吃的是千家饭，走的是万里路。

一 大个子叔叔、奶奶和一位一闪而过的妈妈

那位把我抱走的叔叔，身份不明。是地下党？上海的地下党多着呐，都是单线联系。是哪条线上的地下党？是帮派的义士？上海的帮派比地下党更多，几乎控制整个大上海。是哪个帮派的义士？不晓得。那时干事的人，都神秘，不神秘也活不下去。

那位叔叔是个大个子，很壮；脸，看上去还挺凶，象水泊梁山上的人物，长相让人害怕，却又让人尊敬。

大个叔叔把我抱进他家，我醒了。他家住一座两层楼，我们一进去，楼上就走下一位老奶奶。

大个叔叔对我说：“喊奶奶。”

我喊了一声“奶奶”。奶奶就成了亲奶奶，她亲切地摸着我的头，说：“乖孩子，来，奶奶带你去睡觉。”

奶奶把我领进楼下的一个小房间，照顾我睡下，就走了。开始睡不着，哥哥不在身边，有点怕。可那床太舒服啦。软棉棉、暖乎乎的，长这么大也没睡过。心里害怕，身体想享受。享受把害怕赶走了。不一会，我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大亮。

也没人喊我起床，我自己爬起来，去开天井的门，拉不动，门是锁上的。我被锁在天井里。

环境陌生，不敢哭，不敢叫，只好回到床上，坐着。

想着：干嘛把我锁在房里？干嘛不让我出去？天都亮了，干嘛不开门？

门没开，花格子铁窗却被人打开了。一个女的，只露张脸，把一包大饼油条，从窗子扔进来。我一见，以为是妈妈。那时记不得妈妈的样子，照顾我的妇女我都叫妈妈。我扑到窗前，大声喊：“妈妈，妈妈。”可她一晃就不见了。

她是妈妈，一个好妈妈，没名的妈妈，别人的妈妈。
不是我的。

我抓过大饼油条就往嘴里塞。肚子空，见到这些东西赶快塞进去。正吃着，奶奶打开了门，对我说：“别乱喊，一喊坏人就来了。”

我说：“我不喊了，你们也别锁我。”一个小孩子在一个上锁的房子里和没上锁的房子里，感觉是不一样的。

奶奶答应了我的要求：“好，我不锁门。你千万再别喊了。”

我点了点头。

我没喊。坏人不用喊也能找上门。

大概就在我到大个叔叔家的第三天早上。怎么叫流浪儿？我在哪都住不长。天还没亮，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到楼上有人喊：“小三子，小三子，快过来，快过来。”

我爬下床，拉开门，一见，吓了一跳。大个叔叔被绑了起来。绑在一张长凳上，身上腿上都是绳子，脚跟下是一摞砖头。长大后晓得那叫“老虎凳”，也坐过。

大个叔叔见我出来，急忙说：“快去给我舀碗水来。”

我从厨房拿了一个碗，舀上水，端到他嘴边。他一伸头，一口气把水喝下去。

大个叔叔喘了一口粗气：“去，把我脚下的砖头搬掉。”

那砖头搬不掉，被他的脚死死压住，象楔进去似的。我用力推，推不动；双手抱住拉，拉不下。大个叔叔又让我解绳子。那绳子也是绑得紧紧的，勒出一道道肉沟，每一根都是硬梆梆的，绳头打个死结。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的手还没长大嘛。解了半天，没解开，累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个叔叔着急地说：“牙，小三子，你的牙哪？用牙咬。”

我又爬起来，张嘴去咬绳头。那绳头可不是馒头，死硬死硬的。我咬呀，扯呀，象啃没煮烂的肉似的，一阵好折腾。小孩子的牙比手有劲，劲全在牙上。绳头咬开了，我的牙也开了，一颗牙从我嘴里开路开路的啦。

绳头一开，绳子就好解了，大个叔叔挣出手，几把就扯去身上腿上的绑绳。他见我满嘴是血，疼得直咧嘴，一把抱住我，单腿跪地，说：“好样的小三子，今生今世只要我不死，就一定保护好你。”说完，他跑进角亭子间，没多会，就扶着满身是伤的奶奶走出来。

大个叔叔家来了坏人。可这些坏人又没坏透。没偷没抢没砸，家里的东西一样没动，就把大个叔叔和奶奶

绑了起来。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是流氓是强盗是青红帮？不晓得。为什么绑叔叔和奶奶，是绑票是惩罚是报仇？也不晓得，反正他们不是好东西。

坏人一来，我们这些好人就得走啦。

大个叔叔抱起我，一手搀着奶奶，慌慌张张离开家门。先到一户人家，敲开门，把奶奶安顿下来，又把我带去。

天已朦朦亮，大个叔叔叫住一辆黄包车，我们坐上去。我有点不愿意，谁知他把我带到哪里去？大个叔叔便对我说：“我带你找妈妈去。”

我听了，心里就踏实了，也安静了。小孩子没有不想妈妈的。

二 干妈宋庆龄

妈妈牺牲时，我还小，对死不理解。一要妈妈，大人就说：“妈妈去远方了。”我就相信妈妈没死，还活着，在外边忙，就想找她。有时找到了，她照顾我一段时间，又走了。走了再去找，谁带我去找妈妈我都乐意。

那些妈妈当然都是舅母那样的亲人啦。大个叔叔带我找到的妈妈，也是个干妈。

黄包车把我们拉到一个院子前，停下来。大个叔叔付了车费，抱着我走进院子的大门。

院内有一栋干干净净的，右边是个汽车库，隔壁是灶房，正门口，趴着一只小狗。四周看看，院子挺大，围墙内，有个大草坪，草坪边有个小亭子。一看就知是大户人家。

进了门，找到一位女士，那女士看上去很年轻，穿着打扮，也朴素，不象缀满珠宝的阔太太，她一见我们，就热情地迎上来，把我们带到她的房里。房里有一位先生的照片和灵台，后来晓得那是孙中山先生。大个叔叔放下我，让我在外间玩。他和那女士去了内间，交接我啦。不一会儿，大个叔叔走出来，如释重负地对我说：“行啦，你到家了。”

我认为找到了妈妈，可那女士不象妈妈。妈妈的衣服多是旧的，我不晓得喊她什么。

女士弯下腰，拍拍我的脸说：“叫我干妈。”

让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叫一声干妈。

干妈就是宋庆龄。大个叔叔一走，她就给我买新衣，洗个澡。打扫卫生啦。从头到脚，装扮一新，我从一个流浪儿，摇身一变，成了个小公子。

打扮完了，干妈又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她想了想，“在干妈家，你就叫葛晓白。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葛晓白。”

干妈住的房子分内外间，外间是会客室，摆着钢琴、电话机、打字机。她睡内间，我睡在她脚跟头，那铺上的床单、被盖，都是新的，象刚从商店里拿出来，一尘

不染。

可没几天，就染上啦。晚上睡觉时，我在床上撒了一泡尿。

干妈换床单时，说我“画地图”啦。我不好意思。那地图太难看了。

我的“地图”不好看。那时中国地图也不好看。东北三省，乌黑一片；华北呢，是黄的，撤退大军踏起的尘烟；井冈山有点红。但黑云压城啊。爱国的中国人，奔走相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干妈是个大忙人，家里天天是人来人往。谈话，开会，也做客。有一次，干妈家来了二、三百人，开完会，还在草坪上合影。我没参加会议，却参加了照像。穿着长衫，戴西瓜皮帽子，站在干妈身边。

这张照片能从干妈的史料中查到。

到干妈家来的人，各界人士都有。军人、商人、知识分子，还有大鼻子外国人。有一个外国人，和干妈常来常往，处得很好，他们都用叽哩哇啦的外国语谈话，我听不懂。一次，他们正谈着，我凑上去，问那个外国人：“你会讲中国话吗？”

外国人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挺起胸脯回答：“葛晓白。”这个名字比小三子好听，我答得很响亮。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爱勿斯脱。”

我问：“什么？你叫死不掉！”

外国人没听懂，干妈却笑起来，他一见干妈笑了，也咧开嘴笑起来，傻乎乎的。

在干妈家，我的笑脸也多了。干妈一有空，就弹钢琴，教我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救中国。”救穷人救中国我晓得，“列强”也听木头桥叔叔说过，可“列强”到底是什么东西，搞不明白，便问干妈：“列强是什么呀？”

干妈说：“列强就是外国强盗，跑到我们中国，杀人放火抢东西，坏极了。”

我就问：“为什么不赶走他们。”

干妈说：“我们中国穷，穷就穷在没有飞机大炮军舰坦克。等我们有了飞机大炮军舰坦克，就能把他们赶走。”

我说：“我最爱开军舰。”

干妈听了很高兴，说：“有志气，等你长大，就去开我们自己的军舰，赶走外国强盗。”

干妈启蒙教育我，表扬我，我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长大了什么事都能干，很光彩的。正在得意洋洋时，不光彩的事来了。

杨秀生叔叔来了，不知从哪里来，一身脏乎乎的，头发又乱又长，象堆乱草。可能是过不下去了，找到干妈家。

干妈留下杨叔叔，让他干点家务活，有事跑跑腿。看他比较勤快，干妈挺满意。开会也让他参加，可有时不让。不让他参加的会杨叔叔还硬挤上去，干妈就不满意

啦。

杨叔叔在干妈家，有吃、有喝、有时还拿，从家里拿走一些东西，也可以说是偷了。是拿去接济别人，还是变卖，我不清楚。干妈晓得后，从不满意变成很生气，说：“都讲共产党光明磊落，怎么隔壁的这个不象。”

干妈家也不太平无事啦。

那次，一名东北军官跑到干妈家，见到干妈，双腿一跪，泪就流出来，边流边说：“我来求您啦，您是国母，出来说句话，让我们打回老家去吧。”干妈把他扶起来。东北军官继续说，东北是我们的家呀，鬼子在那里，火烧我们的家园，侮辱我们的姐妹，杀害我们的亲人。可我们几十万东北军，却撤了出来打内战。作为一名军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保不住，没脸见人。

干妈就说，她一定尽力，可这是大事。她没权。需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赶走日本鬼子。干妈又劝东北军官回去。

东北军官很激动，不愿回去，又说，他的亲人全让鬼子杀了，他是代表兄弟们来请战的。东北军官兵誓死抗日。请国母一定代表他们说句话。

干妈答应了他，又劝他回去。可他说什么也不走，不知是没满足要求，还是他上来了牛脾气，死活不走。干妈家里的其他人，也来劝他，劝不动，没法劝，他就是不去。晚上，他吊死在院子里的亭子上。自杀了。

一个军人，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是很痛心的。

那时东北军中有不少官兵，因不能打回老家，觉得没脸见人，绝望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嘛。有一个军官，还跑到南京中山陵，在孙中山墓前剖腹自杀。

请战的东北军官吊死了，干妈很难过，几天不说话。她身为国母，可没权。大权在老蒋手里。干妈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怎么开口发兵。她要是有权，早就下命令了，不用别人请战。

老头子说过：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干妈没有军队，在那个互相残杀的年代，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干妈家出事了。那件事的具体过程我不晓得，睡着了。自我尿床后，干妈每天夜里都喊我起来撒尿。那天夜里我起来撒尿时，家里还没事，到了天亮，才晓得来了坏人。小狗被药死了。干妈被坏人折腾病了。家里的东西都没动。来了哪些坏人，干妈怎么病的，我不清楚。

干妈躺在床上，让我打电话，找那个“死不掉”外国人。“死不掉”带来一个洋医生，也就是和干妈常来往的女老外，给干妈治病。都说外国话，我不懂。

没几天，干妈家来了一位叔叔要接我走。我不干，象那位东北军官似的，不愿走。

干妈说：“送你去开军舰。”

我说：“不，我不走。”

干妈又说：“干妈也要走了，这里没人住了。”

我一听，这里没法住，不走也得走啦。

干妈写了一封信，交给来接我的叔叔。叔叔带走我

时，干妈又说：“别难过，我以后会去看你。”

再次见到干妈，已是五十年代啦。在北京，当时我不敢认她，她就让我到上海莫利爱路住过的那个院子去看看，说看看就一切都知道了。这么一说，我就认出她了。她又开玩笑地说：她有两个干儿子，一个是国民党的坦克团长，一个是共产党的坦克团副，小的是个穷光蛋，却把大的打败了。这小干儿子指我，大的指蒋经国。

三 走虎口，入龙潭

那位叔叔就是王首道叔叔。他带着我，乘车、坐船、走大路、钻山沟。我累了，他背着我走；他累了，我就下来，都歇歇。他告诉我，他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贴身卫士在那时也不能畅通无阻。情况紧张时，他就把证件和干妈的信，藏在我的衣襟里。

一路上，翻山过河，走走停停。王叔叔把我带到浙江溪口，来到一个寺院。寺院里没和尚，卫兵倒不少，荷枪实弹的。门口的两个卫兵，拦住王叔叔，看过证件，才放我们进去，找到蒋经国。

蒋经国穿着便服，夹克马裤，高统皮靴，样子也不吓人。王叔叔给他看了干妈的信，与他交涉，大意是让蒋家出资，送我出国。

也不晓得蒋经国答应没答应，王叔叔和我就在寺院

住下来。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喊我起床，把我带到院内的平地，说教我出操，也就是试看我的天资啦。他说：“你现在是一名军人，听我的口令。”我一听就挺挺胸脯，模仿那些卫兵，站得直直的。

我随着他“立正、稍息、向后转、跑步、卧倒”的口令，做着动作。这些动作，木头桥叔叔教过。但蒋经国喊得挺快，我跟不上。做错了，他就哈哈大笑。

这笑里边有杀机。笑里藏刀嘛。出完操，回来吃早饭，厨师送来一块蛋糕，花花绿绿的，说：“吃吧，专门给你做的生日蛋糕。”我抓过来就塞进嘴里，挺好吃，不一会就吃光了。吃饱就想出去玩玩。还没出门，王叔叔从外边跑过来，对我大叫一声：“别动。”

我楞住了，也站住了，看他脸色，不知出了什么事。他几步跑过来，让我张开嘴，伸进个手指头，用力压我的喉弄口。一压我就吐，象喝醉酒似的。哇哇地吐，直到我吐不出来，王叔叔才住手，他看着我吐出的东西，惊叫一声：“有毒。”

王叔叔唤来一条小狗，把我吐出的蛋糕吃掉，然后又给我灌水，灌了再让我吐，折腾一遍又一遍，看着我吐得差不多了，便让我呆在屋里，别乱动。那一夜，我是晕晕乎乎睡过去的。

第二天早上，那条狗死在草堆里。王叔叔见了，拉着我跑到院子里，高呼：“冤枉啊！你们都来评评理，他们要毒死我们呀。”

听王叔叔一喊，一名军官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身后跟两名随从。王叔叔一见，就说：“少帅，你得说句公道话，蒋家人要毒死我们。”

少帅就是张学良将军，张将军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王叔叔把死狗拖过来，让他看，说明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张将军明白之后，挺生气，就让一名随从去打电话，叫另一名随从去传厨师。

厨师被传来了，张将军问他：“你在蛋糕里放了什么？”

厨师一听慌了，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放什么。”

张将军厉声喝到：“说，是哪个让你放的？”

厨师不吱声。问不出来。问不出来也是明摆着的事，除了蒋家人，还有谁想杀我。

不一会，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身穿黑披风的大官，一个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院内的军人一见那大官，都“啪”地双脚一并，立正敬礼。王叔叔一见那大官，就理直气壮地说：“两国相争，还不杀使者，你们为何要毒杀一个小孩子？他有何罪！”

那黑披风就是老蒋啦。他看了看死狗，好象没说话，示意卫兵把死狗拖走。

王叔叔有理不让人，非让他们说个明白不行。

老蒋就说他不晓得，又装模作样让卫兵认真调查，查出来要严加训斥。

这里搪塞啦。王叔叔不干，他是国父的贴身卫士，论起来不是长辈也是平辈，也不在乎老蒋，他大喊“冤枉”，说老蒋“没人性。”最后骂起来，还动起手。王叔叔当然没打老蒋，一耳光扇过去，把旁边的厨师揍倒在地。

吵骂不休。张将军打起圆场，说：没出人命，这是万幸，你们还是走吧。张将军又让随从拿出一些钱，给我们当路费，意思是让我们赶快逃出虎口，那座寺院可不是个念经讲佛的慈善地方。

王叔叔把我背走了，又是乘车坐船，穿山越岭，走累了歇歇，歇好了再走。他想把我带到哪里，不晓得，但经历一个龙潭，我清楚。

走了那么多路，出汗，身上脏，衣服也脏。那天我们走进一座山，遇到一个水潭。水潭在瀑布下边，瀑布挺高，落下的水很响，哗哗啦啦，很远都能听到。

我们在水潭边停下。水清极了，能看清水底下颤颤悠悠的小石头。王叔叔说：“我们歇歇吧。这是个龙潭，你看它象不象条白龙。”

我说：“不象，象一个大舌头。”我是指那瀑布。

“那是龙吐水。这个瀑就该叫龙瀑。我们在这洗个澡吧。”王叔叔说着就脱衣服，脱得光光的。

我被淹过，有点怕水啦，就不想下去。王叔叔又不

晓得我的恐惧心理，他脱光衣服，又三下五除二，把我扒个精光，说：“来吧。”

王叔叔一头扎进龙潭，在水底象条光滑滑的鱼，游了好远才露出头来，见我还站在岸边，就喊：“下来呀。”

我说：“我不想洗。”

“瞧你脏样，下来洗洗。”

我又说：“我怕水，不会游。”

“怕水还能当舰长。下来，我教你游水。”

我还是不敢下水。王叔叔就走上来，一把抱起我，向水中走进，边走边说：“从小就怕这怕那的，没出息。你不是要当舰长吗？这个熊样，长大怎么当舰长？舰长可是要会游水的，要象鱼一样。”他把我放下，水没到我的脖子，我赶忙仰头跷脚，生怕水灌进嘴里。

“有叔叔在，别怕。来，这样。”王叔叔游起来，边游边教我。还说：“会游水，就不会喝水了，你一定要学。不然，以后掉到水里，会把你淹死。”

我只好学啦。照着他的样子，分水，蹬腿。可浮不起来，老往下沉。一沉下去，就咕咕喝了几口，差点没把我呛死。

王叔叔表扬我：“行，挺勇敢。”

小孩子一听到表扬，就来劲了。我横下心，也是为了当舰长，游呀，喝呀，呛呀，一阵扑腾。王叔叔哈哈大笑，说：“象个蛟龙的样子，有出息。”

有什么出息，我没学会。累得我学不动了。王叔叔

才让我走上岸。我躺在那儿肚子发胀，直喘粗气。王叔叔安慰道：“没事。锻炼锻炼你的意志。”

王叔叔又把我们的脏衣服洗了，凉在石头上，坐在我旁边，给我讲起他小时候。他家是佃农，小时候也是个穷孩子，吃不饱穿不暖，十几岁就给地主种地。地主逼债，还不起，就拉走他妈妈，他气红了眼，当天晚上，溜进地主家，砍死地主，就逃走了，参加了革命。又给我说：“等你长大，就去当舰长，打跑侵略者，杀死天下所有的地主，给穷人报仇。”

我被他的身世打动了，义愤地说：“我长大肯定去当舰长，用大炮把天下的坏蛋统统炸死。”

王叔叔告诉我：“要打倒坏人，从小就得练好身体，身体壮，才有劲，明白吗？”

我说明白，木头桥叔叔教我练过兵。

王叔叔笑了笑，又给我讲起革命道理。谈穷人穷在没有军队，有了穷人的大军，打跑压在穷人头上的坏人，穷人就不会穷了。他给我讲了好多好多，直讲到太阳下山。

天快黑啦，我们的衣服也凉干了。王叔叔背起我，离开龙潭，走出那座山。

笔者附言：据蒋经国自述，1937年3月他从苏联归国，春夏时分到溪口，此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软禁在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石让蒋经国和张学良一道在

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分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蒋经国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等。张学良专攻《明史》。

上面的自述，述者记错时间，或把别人当成蒋经国，为尊重述者，也为行文方便，暂不更改。

四 少林小弟子

我们离开溪口寺院，经过一座山，又来到一座山、一座寺院。

那座山叫嵩山，寺院就是少林寺，王叔叔来找他的师兄弟。

也是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来到少林寺门前，大门紧闭，王叔叔前去打门，死活打不开，好象里边没人似的，正好碰到一个打柴归来的大头和尚，他问明我们的来意，就从小门把我们带进去。

王叔叔找到一个方丈，和他嘀咕几句，方丈点头收下我。王叔叔就走了，临行对我说：“以后有叔叔来接你。”

我留下来，当起小和尚。剃了头发，发我一身衣服，穿在身上拖拖拉拉的。方丈叫来那位打柴的大头和尚，把我交给他。

那大头和尚心眼不坏，叫我小兄弟，天天带我上山打柴，他干重活，我干轻活。烧饭我不怕，烧了先吃，饿

不着。就怕念经，一群和尚坐在那儿，双手合十，低着头，咪咪嘛嘛。可以不念，但不能乱动，我坐不住，总乱动，一动，老和尚就走进来，用眼睛瞪，用戒尺打。打头，头上没毛，打起来当当响，很疼。

寺内的练功场，是很热闹的啦。练什么功的都有，腾翻跳跃，刀枪剑戟，单练，对打，还有坐着不动的，那是练内功。没事，我就跑过去看。那群和尚，见我是个小孩，嘴也甜，喊他们大哥哥，就待我不错，一个个当起师傅，教我练起武来。马步、弓步、压腿、冲掌，翻跟头，拿大顶，还教我些套路。见我练得很认真，一个大和尚，就教我练童子功。

练功苦哇，尤其是压腿，那是拉筋，拉得腿酸疼酸疼的，走路撅屁股。有时他们失了手，打着我，就更疼啦。练功人，手重，打到脸上，准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没少挨打。挨打也是好心人打的，受就受着。最可气的是，有些和尚欺负我。

和尚里头，有好的也就有坏的，坏和尚欺负不了好和尚，就欺负我这个小和尚。练穿身功，也就是练身体的柔软性啦，钻一个石洞，石洞是弯的，有两人长，也细，人要费劲才能钻过去，钻到中间想退都退不回来。和尚们钻洞练功，我跟着练，坏和尚就欺负我啦，有的先钻过去，见我还在洞里，就回头高声怪叫，那声音在洞里如雷贯耳，震得耳朵发麻。这还算好的，有的和尚，还脱下裤子，撅起屁股对着洞口放屁，挺着肚子对洞里撒

尿，弄得我一身臊气哄哄的。你说气人不气人。我打不过他们，只好他妈的不练了。

后来我正式拜师，师傅叫钱钧。钱钧师傅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曾任浙江军区司令员。

师傅给我起个名字：钱贵（音），对我说：“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师傅会画画，功夫比他的画还好。腾身一纵，能在墙壁上画一个人形，这叫空中画人，不好学。他教我打沙袋，插沙子。沙子放在一个很象木桶的缸里的，用手掌往里插，开始手指头很疼。后来手不疼了，细沙又变成粗沙，往里插，手还是疼。少不了偷懒，一偷懒，师傅就揍我。

揍就揍吧，从小就常挨揍，皮也练出来了，结实，不怕揍。可鼻子没练出来，一闻到油漆味，就恶心。

师傅教我练功，也教我画画。他的画都是用油漆画的，气味刺鼻。一闻到，我就把头转过去，大气不喘。师傅真心想让我学到他的绝技，就命令我“必须过了这一关”。他按住我的头，把油漆桶放在我鼻子前，熏得我双眼紧闭，不敢喘气。但总得喘气，一喘气，油漆味就钻进鼻子里，弄得我头昏脑胀，恶心得要吐。我气坏了，一巴掌把油漆桶打翻在地。师傅也气坏了，一巴掌把我打翻在地。

我在寺院过了个秋天，又过了个冬天，中间，有几位前辈来看过我。春节刚过，又来了两位前辈，我刚挨

过师傅的揍，一见他俩，就苦求他们把我带走。怕师傅不干，也没告别。我和两位前辈偷偷地溜了。出了寺院，我脱下那身和尚衣服，狠狠地摔在寺院门前。

五 流浪小艺人

逃出少林寺，两位前辈商量一下，带我去河南新乡，路上对我说：“咱们走亲戚去。”

亲戚名叫韩芳志，住在新乡的乡下，一到他家，我就改名叫韩荻甄。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也知道了两位前辈的名字：一个叫烂桃子，一个叫老管。

亲戚也是个穷亲戚，养不起我们。没过几天，一阵锣声响到亲戚家门口，来了一个卖艺人，他肩上蹲只小猴子，身后牵着一只小狗、一只小山羊。

烂桃子叔叔喊卖艺人老刘，我就喊他刘叔叔；老管叔叔又让我拜他为师，我又改称他刘师傅。

刘师傅很严肃，不爱说话，在亲戚家坐一会，就带着我们三个人和三个小动物，走了。

我们走村串乡，沿途卖艺，靠那三个小动物挣钱，换口饭吃。后来就吃到我头上，我也成了小动物，上场表演。刘师傅说我是练过功的，功夫就是手艺，能挣钱。我不干，说我那功夫上不了场。

刘师傅凶起来：“不干也得干。师傅能教好你。”

他不是教好我，是揍好我。在场上一出笑话，比如跟头没翻好，杠子没上去，训小动物的鞭子就落到我身上。不是当着观众的面打，是散场后打。打了还不许两位叔叔劝，说师傅打徒弟是规矩，不打不成器。两位叔叔是靠他吃饭，嘴巴太硬，肚子就空。好汉不吃眼前亏，就看着我吃亏。

有一次，刘艺人没打我，在山东博山。一阵锣响，老老小小，三三两两地来了，围成一圈，看小动物的把戏。那时天挺冷，我披着张狗皮，在场边哆哆嗦嗦等着，我的把戏在后边。

山羊上架，猴子拉车，小狗跳圈，刘艺人又拉起二胡唱几嗓子，最后大喝一声，把我喝了出来。

那时我也被他打出来练出来了。我摔开身上的狗皮，一串跟头，跃到场上，接着又前滚翻后滚翻，练一套拳脚，在观众的喝彩声中，我腾身跃上杠子。

杠子是个直木棍，架在两棵树中间，杠上表演是最后一个节目。我要在上面做许多危险的动作。又不象现在的体操运动员，受过正规训练，我是现学现卖，卖艺卖命，挣钱糊口。

我跃上杠子，前翻后翻，倒立回环，围观的老老小小，不一会就“哦”了一阵，险呐。我自己当然看不到自己险，“哦”声就等于表扬啦。正带劲，反拉杠子用力过猛，两只胳膊拉折了，噗咚，栽下来，当场昏过去。

醒来时，还有很多关心我生死的观众没有散场，见

我活过来，才唏嘘着散去。往场上扔了不少钱，刘艺人一个个捡起，塞进他怀里，没有打我的意思。

醒了还不如昏过去，一醒，脱节的胳膊骨就疼了，我直哼哼。老管叔叔把我抱在怀里，问我想吃什么。

那时的肚子也经常空的，我说：“想吃红烧肉。”

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红烧肉。烂桃子叔叔把肉一端上来，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疼也减轻了。我挣扎着坐起来，恨不得一口全吞下去。胳膊不能动，手拿不住筷子。老管叔叔就喂我，一块一块地夹进我嘴里。刘艺人边吃还边用眼睛瞪我，可能嫌我吃得多吃得多，我对他真是又恨又怕。

吃过红烧肉，也没休息，叔叔就用小推车推着我，连夜赶路，我盖着那张狗皮，在小车上睡着了。

两天后，我们到了枣庄。住在一个破庙里。也卖不成艺啦。我肩臂肿得象刚出笼的馒头似的，烂桃子叔叔从外边给我买来一捧红枣，见了想吃，可抬不起手，他叹了一口气，出去找来一个江湖郎中。

那个郎中是他妈的骗子，不会治伤，倒会治人。他来到庙里，装模作样问“是怎么折的”。烂桃子叔叔就告诉了他。他说“这好办”。走到我跟前，抓起我的胳膊，又拉又拧，疼得我嗷嗷大叫，又喊又骂。他不管，推推拉拉好一会，才松开手，问我“好了没有”。我骂道：“我操你妈。”他也不生气，说“大伤要大治”。就捆起我的双手，把我吊在梁上，脚不着地。我骂他，他就推我，

推得我荡来荡去，这他妈的哪是接骨头，是拆骨头。烂桃子叔叔看不下去，把我放下来，赶走了郎中。他又出去给我买了几块狗皮膏药，也是从一个郎中那儿买的，一贴，还贴好了。

卖艺不是个活法。两位叔叔另想主意。我们离开枣庄，乘火车到达南京。路上，我又改了名字，叫殷民，这是一个死孩子的名字；死孩子的爸爸和我们同行，不知他是什么人。

六 桃园办事处，保安队哨卡， 河中险滩，山中寺院

到了南京，找到地下党桃园办事处。我又被转交啦。离开烂桃子和老管叔叔，我不太难过，那个可恨的刘艺人也走了。

我被交给钱正英，她把我领到她的住处，开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太多，我想了想，就说：“我叫钱贵。”这个名字叫了一秋一冬，用的时间长，记得清楚。

我发音不准，钱姐姐没听清楚。她笑笑说：“我们同姓，你那个贵是哪个字？”说完，她还在纸上写出“贵、柜、桂、魁”。让我认。

我说：“我也不晓得。”

钱姐姐就说：“钱都放在柜子里，你叫钱柜吧。”

叫就叫吧，我没钱，也没柜子，叫这个名字，倒充满希望的。

钱姐姐有钱，她从柜子里拿出钱，上街给我买身新衣服。破狗皮扔掉了，我从脏乎乎的小动物，变成一个干净的小朋友。

钱姐姐可能是以报务员身份做掩护的地下党员，她那儿有电台。我挺调皮啦，有一次用手指头去敲那发报键，钱姐姐拉开我，说：“这不好玩。”她就带我出去玩。南京当然好玩啦，可好玩的地方，我都住不长。

不知出了什么事，钱姐姐带我离开了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叔叔，我们三个坐船，来到一个小镇。一路上，不让我乱动，也不让我说话，更不许我向他们提问。万一从我嘴里说出红军什么的，就坏啦。

我不问他们，有人问他们。来到小镇，镇口有个保安队的哨卡。几个保安队员，端着枪，盘问进镇的行人。我们刚到哨卡，保安队的小队长就问起来：“干什么的。”

同行的叔叔说：“进镇买东西。”

保安队长不是个东西，扔下叔叔，问起钱姐姐来：“是卖东西的吧？”还动手动脚的，摸钱姐姐的脸，气得钱姐姐一巴掌打开他的手。

保安队长火了，挥拳便打钱姐姐，叔叔赶忙上去，护着钱姐姐，说好话，边说边把保安队长拉到一边，塞给他几块大洋：“老总，行行好吧。我有个兄弟和你一样，

也是扛枪吃饭的。”

保安队长一听，眨巴眨巴眼，手一挥：“走吧走吧。”放我们进镇。

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钱姐姐把我交给一位五大三粗的叔叔，就走了。

这位五大三粗的叔叔叫什么，不晓得。在他家过了一夜，他就把我背走了。路上对我说，以前他给地主当长工，现在又为革命当长工，让我喊他“长工”叔叔。

“长工”叔叔带我走的路最长。我们坐船到了汉阳，没有停留，又换上大木船，继续赶路，出湖北，进湖南，一路颠簸，还是没有落脚地。我就忍不住问他啦：“‘长工’叔叔，我们去哪里？”

他说，带我回家，找我的红军爸爸去。

我们又下了大木船，换乘小木船，没到家，差点回到“老家”。小木船驶过一座江心小岛时，水流急，船工一篙没撑过来，呼地冲上浅水滩，船身倾斜，满船人东倒西歪，大惊小呼，死死抓住船帮，还好，没人掉下去，掉下去会被水冲下去。走不动了，船身被冲得一晃一晃的，“长工”叔叔一手抱着我，一手抓住船帮，对船工大喊：“快撑开。”

船工也急，又慌又急，想把船撑开，他一篙又一篙，使足劲，就是撑不动。小木船一晃一晃地搁在浅滩上。

“长工”叔叔放好我，跨过去，从船工手里接过长篙，用力一撑，船动了，再用力一撑，就把小木船撑离浅滩。

船身平稳了，全船人虚惊一场，长舒一口气。纷纷夸“长工”叔叔是大力士、英雄好汉。那位船工用手抹去头上的汗，对“长工”叔叔伸出大拇指，说：“还是你行。”

小木船继续朝前走，太阳偏西，在一个码头停下。“长工”叔叔把我抱上岸，来到一个象土地庙似的房子前，放下我，说：“你在这等我，千万别乱跑，跑丢了就找不到了。”

把我一个人留下，心里没谱，我就说：“你可快点回来。”

“我找到人就回来，别乱跑，啊。”“长工”叔叔说完急忙走了。

我只好等啦，坐在房前的石板上，等呀等呀，就是不见“长工”叔叔的影子。他不来，瞌睡来了，我在石板上睡着了。

太阳快落山时，“长工”叔叔把我喊醒，睁眼一见，他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叔叔，一个奶奶。

“长工”叔叔给我介绍：“这是你外婆，这是你舅舅，快喊呀。”

那时我已记不清外婆和舅舅了。勉强地喊了一声“外婆舅舅”。外婆走上前抱起我，理了理我的头发。

“长工”叔叔说：“我的长工结束了，你跟外婆走吧。”

我一听不干啦，不是要带我去找红军爸爸吗？怎么找到外婆了。我挣脱外婆，跑过去抱住“长工”叔叔的腿，说什么也不愿留下，非让他带我去找红军爸爸。

那时为什么不愿留下，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是觉得“长工”叔叔有劲，能保护我，还是因为长沙是妈妈牺牲的地方，幼时就有一种无形的恐惧留在心里。说不清，当时我死活要跟“长工”叔叔去找红军爸爸。“长工”叔叔只好又把我背走。

一路上，又是乘船，连天加夜，我们来到四川，在一个较大的码头，上了岸。“长工”叔叔背上我，朝山上走去，一气来到一座寺院门前。

山是峨眉山，寺院的名字忘了。

“长工”叔叔把我放下，又告诉我不许乱跑，便走进寺院，找人。

那座寺院门前有个石象，我一见，很好看，便跑过去，摸摸象鼻子，抱抱象腿，最后钻到石象肚子下，摸它的肚皮。“长工”叔叔出门一看，我不见了，便大喊一声，才把我从石象肚子下喊出来。

“长工”叔叔脸上有气，他身边的那个和尚却笑咪咪的。我跑过去，“长工”叔叔便说：“你就留在这里了。这位叔叔带你。”他指了指那个笑咪咪的和尚。

我一听，又不干啦。寺院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我对寺院有反感。就叫着：“你不是要带我去找红军爸爸吗，怎么把我带到这里了？”

“长工”叔叔厉声喝道：“小点声！以后不准你再提红军爸爸，让坏人听到了，把你抓去杀掉。”停了一会又说：“这位叔叔以后会带你去找红军爸爸，先在这里住

下。”

我不吱声，那位和尚说话了，“你看，这是什么？”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小石猴，样子小巧，好看极了，我一见，就扑过去，抢在手里。

一只小石猴，把我留在寺院。可寺院也不是久留之地，山上，缺吃少穿的，那位笑咪咪的和尚叔叔待我不错，从不打我，还给我讲故事，说笑话，可这不能填肚子。我一喊饿，就把他脸上的笑容喊没了。我喊久了，他就喊来一位矮胖的叔叔，把我领走。

七 打青梅，骑竹马；撞香头，一个疤

矮胖叔叔把我带下山，走走停停；过了几天，到了成都，来到一个大院门口，见那户人家正在办丧事，出出进进的女人戴着白花，男人戴着麻帽子。都是悲痛的神色。矮胖叔叔犹豫一下，对我说：“这是周家。你在这等着，我进去找人。”

解放后，才晓得周家就是周扬叔叔家。

不一会，矮胖叔叔就出来了，身后跟一位戴孝的叔叔。我知道要和矮胖叔叔告别啦。

戴孝的叔叔把我领进院子，担心我见了棺木害怕，就把我带进东厢房，告诉我别出去，带上门走了。

戴孝的叔叔就是周扬叔叔，忙完丧事，才顾得上和

我说话。那话我已听过许多次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有很多名字，你问的是哪一个。”

他说：“最早的一个。”

我想了想，最早的名字是妈妈让我记住的名字，就答道：“王英林。”

他对这个名字不满意，摇摇头说：“你这个名字象个绿林好汉的名字，我给你起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吧。”他略加思考，“叫王庆祥怎么样。”我无所谓，满口答应：“行，叫什么都行。”

他又说：“以后你喊我寄爹，记住了吧。”

我说记住了，就在周家住下了。

周家院子，有正房，东厢房，西厢房，大门口有门房，院内天井里，有棵梅树。我住在东厢房，从窗子能看到整个梅树，梅枝挂满果子。

周家有位老奶奶，住在正房里，可能是寄爹的妈妈，去世的是寄爹的爸爸。

对面西厢房里，住着一位戴眼镜的叔叔，那位叔叔不爱出门，一天到晚关在房子里写书。经常出门的是一个小姑娘，和他住在一起，梳着两只牛角辫子，同我年龄差不多大，一个人在天井里玩。

寄爹也忙，有时写书，有时出门，很少有时间带我玩。我就自己玩啦，屋里玩不开，也到天井里去玩。一出门，竟当成了“小女婿”。

一个小孩子寂寞，两个小孩子在一起就热闹了。没几天，我就和那个小姑娘玩熟了。可那时树上的梅子没熟，是青的。我没见过那果子，很想吃，就向小姑娘提议吃梅子。

小姑娘当然也想吃啦。我们每人举一根小竹竿，朝树上一阵乱打，打掉了捡了就吃，吃到嘴里，酸得合不拢口，太酸了，现在一说嘴里都有酸水。不好吃！不好吃也就不打了。

不打青梅，手里的竹竿没有扔掉，我跨上，当马骑，在天井里跑开了。小姑娘也学起我的样子，骑上竹竿，牛角辫一颤一颤的，跟着我跑。嘴里还不住地喊着“驾驾”。

我们在天井里跑了一圈又一圈，觉得挺有意思，这个游戏没玩过嘛。大人更觉得有意思，寄爹和那位戴眼镜的叔叔，都从房里走出来，乐哈哈看着我们，说：“这可真是青梅竹马。”

一听大人说话，我们不玩了。大人却玩起来。寄爹笑着对那位戴眼镜的叔叔说：“你看看，多好的一对，你认不认这个小女婿。”

戴眼镜的叔叔也笑着，说：“认，凭这青梅和竹马，我不认也得认了。”

寄爹对我说：“快喊岳父。”

小孩子又不知道羞啦，我仰起脸对着那位戴眼镜的叔叔，大声喊道：“岳父。”

“岳父”和寄爹哈哈大笑起来，正房里的老奶奶，也跟着笑起来。

后来才知道，“岳父”就是寄爹的好朋友李柿柑叔叔，大作家巴金。

大人一高兴，玩得更带劲了，拿出相机，让我和小姑娘骑着竹马站在梅树下，照了张像。说：“等你们长大了，再给你们看这照片。”可以后我没见到那照片，也再没见到那个小姑娘，她是李叔叔的女儿，还是养女，就不清楚了。

安定的日子总是很短的，寄爹要搬家了，说要把我送到上海，临行时还给我讲个故事，就是岳母刺字。他说，哪朝哪代都有忠臣和奸臣，宋朝有个大奸臣秦桧，就有个大忠臣岳飞，岳飞是民族英雄，为了让他成为英雄，她妈妈在他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讲完就问我：“你想不想当一个大英雄。”

我当然想啦，胸脯一挺，说：“想，我长大去开军舰打列强，肯定能当大英雄。”

寄爹又说：“你敢不敢让我在你背上刺字？”

我犹豫了一下，说：“敢。”崇拜岳飞嘛。

寄爹又问：“你不怕疼？”

我勇敢地说：“不怕，岳飞不怕我就不怕。”

寄爹说刺就刺，他让我趴在床上，脱去我的上衣，拿起针，就在我背上刺起来。第一针，我一皱眉头，挺过去了，第二针，我一咬牙，又挺过去了，第三针第四针，

谁知他还要刺多少针。皱眉咬牙也止不住疼，我不干了，爬起来就跑。

我不干了，寄爹更不干了。第二天，他找到一位很壮的叔叔，捉住我，把我脱得光光的，按在床上，那位很壮的叔叔太有劲了，按得我一动也不能动。这回就不是刺啦，寄爹用丝线，在我左腿肛门边扎起一团肉，点燃檀木香，把红红的香头伸进去。我一见，就开始叫了，香头一接触那团肉，就开始骂了。

那块肉嫩，捏一下都疼，别说用火烫了。很壮的叔叔死死按住我，寄爹用香头在那团肉上擦来擦去，火不旺，还用嘴吹吹。烫得我直着嗓门叫喊，用尽力气大骂。不管用，寄爹象他写书时那么认真，烫的时间也好像有他写一本书那么长。直到那块肉烧糊，他才停手。是停了一只手，另一只手又上来了，手指头沾着图章用的印泥，在那块烧糊的肉上，涂来涂去。那也疼啊，疼得我没有力气叫骂，以后再也不理他。

寄爹是怕我丢了，在我身上做个记号，这个记号党组织知道。现在红颜色没了，只有一个凸起的伤疤。

我不理寄爹，想理他也理不成。他把我交给那位很壮的叔叔，全家就搬走了。很壮的叔叔带着我去上海。

八 卖人买出

上海没去成，很壮的叔叔把我带到浙江嵊县。没找到落脚的人家，也许他要找的人逃了、死了、被抓了。找不到人没关系，问题是我们的钱也花光了，只好流浪、讨饭，讨不到就挨饿。

人不吃饭不行，吃饭没钱不行，为了钱，也就是为了吃啦，很壮的叔叔把我卖给“的笃班。”

谁晓得那时他是真卖还是假卖。我看到“的笃班”老板把一摞大洋交给很壮的叔叔，就问：“你不是带我去上海吗，怎么把我卖了？”

叔叔说：“以后有叔叔来赎你，带你去上海，你放心好了。”说完就带着大洋走了。

“的笃班”就是越剧团。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二十多口人。老板给我改个名字：居（钜）涛，我就成了其中的一口人。

“的笃班”有个小姑娘，当然比我大几岁啦，记不得叫什么，即使记住她的名字也是假的。我一进“的笃班”，她就带着我，好象很壮的叔叔把我卖给她似的，领着我练功，吊嗓子，敲大锣，帮工打杂，处处关心我照顾我，象个大姐姐。我就喊她姐姐。她是个圆脸，挺漂亮，南方姑娘都挺漂亮，“越中生女尽如花”嘛。

“的笃班”巡回演出，走到哪里，挣到哪里，吃到哪里。我随他们到过萧山、绍兴等地，最后到了乌镇。

在乌镇，“的笃班”住在一个大庙里，剧场就是庙前的空地。那天上午，演出结束，卸了妆，圆脸姐姐把我喊过去，出了庙门，对我说：“我带你去见一位叔叔。”

她把我带到一个野地里，野地里长满白芝花，雪白雪白的，风一吹，象一块抖动的白床单，起起伏伏，香气扑鼻。圆脸姐姐采了一大束，说：“行了，我们走吧。”

我就问她：“去见叔叔你采花干嘛，叔叔都是喜欢抽烟喝酒的。”

她没回答我，也不让我乱问，把我带到一座拱字大石桥上，吆喝起来：“卖白芝花喽。”

她一手把花抱在胸前，一手牵着我，在桥上来回走动，吆喝，还让我随她喊：“卖白芝花喽。”

不一会，桥上走来一位叔叔，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色礼帽，他走到我们跟前，问：“这花怎么卖？”

圆脸姐姐要价高得吓人，出口“二十块大洋。”

没想到那叔叔说：“我全要了。”

后来知道那是接头暗号。暗号对上，叔叔报了家名，说他叫圆周率，让我喊他圆周率叔叔，我喊得拗口，就叫他圆叔叔。

圆脸姐姐把圆叔叔带到那个大庙，见到“的笃班”老板，圆叔叔付给老板二十块大洋。老板挺客气，照顾不周啦，多多包涵啦，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圆叔叔又同

“的笃班”全体人马合了一张影，才把我带去。是赎出来啦。说带我去上海。

九 沈寄爹，张伯伯，大陆叔叔，红军小分队

圆叔叔说要去上海找他的先生，他先生是个大好人，找到他先生，我就有地方住了。可以识字，念书，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小书包上学堂。

看圆叔叔的打扮，就晓得他有钱，饿不着，我很高兴地跟他走了。走了半天，却来到乌镇附近的乡下。

圆叔叔把我领进一户人家，那户人家住着普通的房子。白墙、小窗、鱼鳞黑瓦，主人姓沈，也是个写书人，一见面，圆叔叔就让我喊他寄爹。

我喊了“寄爹”，圆叔叔的任务就完成了，第二天他就走了。我在沈寄爹家住下，可是没住几天，我也走了。

临行那天，沈寄爹找到一架相机，同我在他家堂屋前照张像。一照像，我就晓得要分别，都习惯啦。

沈寄爹就是沈雁冰叔叔，大作家，笔名叫茅盾。这是后来别的叔叔告诉我的，当时不晓得。

沈寄爹把我带到上海闸北区，交给一位张伯伯。

张伯伯也是个写书的，我一到他家，他就给我起个名字：朱嘉琛。

张家人，除了阿姨，还有一个小弟弟，一个大哥哥，

一个大姐姐。大姐姐是烧饭的，我和大哥哥住一屋。

张伯伯平常很忙，顾不上我们。写书写累了，才叼着烟来到我们屋，教我和大哥认字，写描红字，还说：字的用处很大。要我们认真学习，每天完成指定任务，不许偷懒。也不让我出门。

我在张伯伯家过得挺舒服，那位烧饭的大姐姐却不幸，她死了。

那天，张伯伯一家人出门去了，没带我，让我在家里写字。正写着，听到隔壁的大姐姐喊我，跑过去，一看，大姐姐躺在床上，样子非常痛苦，脸都变了形。她连声说：“给我点水喝，给我点水喝。”

我赶忙给她舀来一碗水，她一气喝下去。我一连舀了三碗，她全喝光了。喝完水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死了。

听大人说，大姐姐上街买菜时，被坏人凌辱了，回家就喝了毒药。

大姐姐的尸体被抬出屋时，脚在前，头在后，双脚先出门。我不晓得这为什么，在天井里放声大哭起来。

大姐姐死后不久，张伯伯传来照像馆的人，在天井里照像。张伯伯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我站在他右边，阿姨抱着小弟弟站在左边。大哥哥站在阿姨身边。摄影师一按快门，说：“好了。”我晓得我又要走了。

第二天，张伯伯家来了一个叔叔，要带我走。我已经走怕了，不愿意。他就说，他是红军，要带我去找红

军，找我的红军爸爸。我勉强同意，告别张伯伯全家。临行时，张伯伯还塞给我一把铜板，一出门，红军叔叔就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张伯伯是谁吗？他是周树人，鲁迅先生。”他说完，却又不让我乱说。

红军叔叔没有带我去找红军。我们是周游列国，去无锡，到常州，搞得我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织布厂的大门口，红军叔叔想带我进去找人，被守门人拦住，说了许多好话，也不让进。我们只好坐在门口的路边，等工人下班。好不容易等到下班时间。一大群女工，乱哄哄出来。我一看，这么多人，怎么找哇。没想到红军叔叔大声一喊，一个阿姨就走过来，见了我们，挺高兴。

阿姨把我们带到她家，又见到一个叔叔，红军叔叔让我喊他寄爹，那位叔叔拍拍我的头，说：“叫我大陆叔叔就行了。”

红军叔叔完成了任务，走了，我在大陆叔叔家住下，他家的房子很多，房子之间，还有带柱子的走廊。一看就晓得不是穷人家。

红军叔叔一走，阿姨就对我说：“有人问你叫啥，你就说叫陆阿狗。”

我说：“记住了。”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改名，都习惯啦。我对这习惯已习惯了。

阿姨说我懂事，转身拿出花生糖，我一见那东西，就扑了过去。

花生糖好吃，大陆叔叔家的日子好过，就是过不长。没住多少日子，那位红军叔叔又来了，把我带走，说：“这次，我们真的找红军去。”

我想红军盼红军，就跟他走了。到了一个乡下，真的见到了红军，是个小分队。红军叔叔说：“这就是红军。”我不信：红军是红旗红星红领章，这群人穿得破破烂烂的，住在老百姓家里，要是手里没有刀、枪、长矛，纯粹是老百姓。

后来我相信啦，那群叔叔待我很热情，晚上还打掉一个警察局。不是红军，谁敢打黑狗？

红军敢打不敢停，打了就跑。那天晚上，打掉警察局后，小分队连夜行军，紧急转移。我趴在红军叔叔的背上，问他：“我们去哪里？”红军叔叔说：“找你的爸爸妈妈去。”

我一听，放心了，一会儿就趴在他背上睡过去。

十 一个爸爸；两个娘娘

找爸爸妈妈的路太远了。红军叔叔带着我，坐船乘车，乘车坐船，真可谓一路尘土，两眼风云。到了浙江宁波郊区，坐上一只小木船，顺着弯弯曲曲的小河道，来到一个乡村小码头。

上了码头，走进村子，七转八拐，到了一户人家。那

户人家只住一间半草房，一看就晓得是穷人。在门口做活的男主人，见我们来了，丢下手中的活，和红军叔叔打招呼。屋里闻声走出一位阿姨，阿姨抱着一位吃奶的小女孩。

红军叔叔和男主人嘀咕一阵，男主人挺干脆地说：“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了。”一句话，把我留下。

红军叔叔放心，我不放心，这家穷，怕饿。第二天，红军叔叔走时，我朝他的背影望了好长时间。

男主人见我恋恋不舍，就同我说起老话：“你叫什么名字？”

我有点烦，这话问的太多了。干脆让你听个够，我一口气把妈妈让我记住的话全说出来：“我叫王英林，爸爸叫王金连，是教书先生，妈妈叫霞姑，是托儿所阿姨。”

他忙说：“我就叫王金连，和你爸爸同姓同名。”

我没听清他下半句话，以为他就是爸爸，可越看越不象，爸爸是红军，他是种田的，也没枪。

他果然不是爸爸，他说了：“以后你喊我爷叔。”

他要是爸爸，就令我太失望了，听他一说，我赶忙“嗯”了一声。

阿姨接着说：“你叫我娘娘。”

我又“嗯”了一声。后来知道，娘娘给大胡子爷爷周恩来当过保姆，叫王阿兰。

爷叔是个石匠，一家三口，全凭他打石头糊口，我一到，又添一张嘴，添嘴还好，又添病，我和小妹妹动

不动就病了，病了就要吃药打针，药贵如金呐！爷叔有再大的能耐，挑起这个家也要弯腰。

有时吃不上饭，一家四口，挤在草屋里，默不作声。不能总饿着，饿长了，能饿死的，爷叔就硬着头皮去借高利贷。身上一有债，那副担子就更重了。

河东有位姓杨的娘娘，和爷叔家常来常往，有时王家一断顿，她就把我背过河去，到她家，吃个饱。住上几天。她见我穿得很破，还给我做身新衣服。

那一次，王家又断顿了，借也借不到，债主又逼上门来对债。爷叔没办法，就跑掉了。

杨娘娘闻讯赶来，把我背过河，在她家住下。一天上午，刚吃过早饭，杨娘娘突然对我说：“你的肚子有病。”

我说：“没有啊，一点也不疼。”

她神色紧张地说：“我看你拉下一条虫子。”

一听我就慌了，肚子里有虫子可不是好玩的，咬人。

杨娘娘说：“你在家别乱跑，我去找医生。”说着，就急忙走出家门。

没等多大会，杨娘娘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叔叔，叔叔没拎药箱，一进门，就说给我治病。他脱去我的衣服，把一个小锡纸包塞进我的肛门。

那太不舒服啦，我挣扎着，不让他治，不让他治他也治了，纸包塞了进去。

杨娘娘哄我，说：“好啦好啦，不让他治，娘娘带你去城里找医生。”

杨娘娘背起我，去了余姚县城。来到县城，没进医院，却去了一所监狱。

卫兵把枪一横，问：“干什么的？”

杨娘娘说：“孩子想他爸爸，我不进去，让孩子进去看看他爸爸总可以吧？”

卫兵搜查我，没查出东西，还不放心，就扒去我的衣服，让我光着屁股进去。也是个卫兵，把我领进一座牢房，打开房门，里边有四五个人，他们趁卫兵不在意，从我的肛门掏出锡纸包，还让我别叫。我没叫，拿出来也舒服啦，看过锡纸包里的纸条，他们却差点叫起来，激动地说：“我们有救了。”

革命工作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这算不算革命工作？算也不算。说算，可我那时啥也不懂；说不算，我又真的参加了营救革命同志的活动。有人说我5岁是国民党，14岁才是共产党，还说我虚报党龄，我很生气的，回敬他们说：我还没实报实销呐！

从余姚回到宁波东郊王家，爷叔王金连因还不起债，已被宁波市大老阔虞洽卿拉去当苦工，没过两天，大老阔又派人押走王阿兰去当奶妈。杨娘娘这时也不见了。王阿兰临走时把我托付给村前河中的一对船工夫妇。

十一 对水的又一次体验：栽了一头泥

那船工也姓王，到了船上，他对我说：“天下姓王的都是一家人。住下吧孩子，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

船工的家就是渔船，一只乌篷船，象没根的浮萍，随水漂流。我是小流浪儿，船工是大流浪汉，住在一起，倒也合适。

我们顺着河道，走走停停。白天，船工叔叔撒网打鱼，鱼打上来，我也上去帮忙，把乱蹦乱跳的鱼抓起来扔进船舱。天一黑，就抛锚，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三个人挤在船篷内，想翻翻身都难。沿途遇到集镇，船工叔叔和阿姨就上岸卖鱼，没有集镇，就把鱼拎到乡村，和农民换米，做两不见钱的买卖。

在船上没饿着，却淹着了，差点淹死。

那天船工叔叔和阿姨上岸卖鱼，我一个人留在船上。小孩子，爱玩，闲不住，就走到船头舱，舱里留着自己吃的活鱼，较小。我抓活鱼玩。一失手，小鱼掉到船边，蹦蹦跳跳，眼看就要蹦到水里，我脑里只有鱼，没有水，就扑过去抓它。这下好了，“噗咚”，我一头扎进水里，一头栽到底，栽了一头泥。身体是倒着下去的，鼻孔里，嘴巴里，咕咕灌水，呛得我什么事都不晓得。是谁把我救上来，也不晓得。奄奄一息啦。

我醒来时，是躺在船舱里，船工夫妇已回来。阿姨还流泪，说：“淹死你让我们怎么交待。”

从那以后，我的腰间就拴上一根绳子，另一头系在船杆上。限制了活动面，就掉不下去啦。

在船上过了十几天，爷叔王金连找来了。他解下我腰间的绳子，谢了那对船工夫妇，把我背走。

十二 笼子里的小松鼠

爷叔是从大老阔家逃出来的，他身无分文，带着我沿路乞讨，帮工打短，来到上海市郊南汇县，找到一个雇主，才停下。

雇主叫朱人俊，是个日本留学生，有几十亩水田，一头牛，算个小地主啦。家里人手不够，就雇爷叔帮工种田，让我放牛。

我成牧童啦，看那画上的牧童多自在，骑着牛背，吹着笛子，脚丫子还一动一动的。不是那回事，牧童不好当。

村边有片坟地坡，我天天去那儿放牛，牛在坟坡上吃草，我在坟坡上割草。天晚了，就赶着牛，背着一筐草回来，回到牛棚。我和爷叔住在牛圈里。回来也闲不了，要铡草。爷叔铡，我垫草，天天累得倒头就睡。

坟坡有个柏树林，林中有松鼠。我在林中割草时见

它们在树上窜来窜去，想吃就吃，想跳就跳，就觉得我这个小孩子，还不如一个小松鼠快活。

松鼠快活，也让我快活一阵子。那天，我在树下割草，一只小松鼠从树上掉下来，正掉在我眼前，我扔下镰刀扑过去，一把抓住它。它挺小，毛绒绒的，攥在手里软乎乎的，那小东西两眼珠滴溜溜地转，很害怕啦。

我也很怕，怕雇主见了不让我玩，我偷偷地把小松鼠带回牛圈，爷叔一看，给小松鼠做只竹笼子，说：“没事，你玩吧。”

果然没事，朱人俊见我拎个松鼠笼子，挎个草筐，赶着牛，没闲着，就不生气。我玩，不误干活。

可雇主最后生气了，没收了我的小松鼠。

那天，我把牛赶到山坡，割满一筐，就跟小松鼠玩啦。那小东西也和我玩熟了，不怕我，我们象一对小朋友。我把它从笼子里掏出来，放在衣袋里，满山抓蛐蛐给它吃，玩得高兴，就忘了牛。牛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回去就死了。

朱人俊生气啦，讲我没照顾好他的牛，就没收了我的小松鼠，辞退了我和爷叔。

朱人俊这个人不算坏，嘴巴好，说话很和气，也是个大孝子，特孝敬他母亲，只是胆子小，参加过国军，但起义了。要说坏的是他弟弟朱人元，那小子，尖钻刁滑，偷鸡摸狗，无恶不做，我们都叫他乌龟精。不得人心，解放后，每次运动都要斗斗他，他又成了运动员，吃了不

少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

十三 小鸟小鸟，我给你洗澡

爷叔领着我，又来到一个地主家，那个地主住很多房子，有个老父亲，也就是老地主啦。老地主留着山羊胡子，爱养鸟，门前挂着一排鸟笼。

这个地主姓什么，记不住了。他家有个人大姐，可能是他的女儿，爷叔带我走进她家，大姐还拿出一块月饼给我吃。那时是中秋节，我不晓得，吃到月饼才晓得。

地主住了很多房子，还要盖房子，爷叔给他们搬石头，和泥垒墙，盖新房。我干不动重活，也不能闲着白吃饭。老地主就让我捉虫子喂小鸟。

家里没虫子，捉虫子要到野地去，在野地里扑来扑去捉着蚂蚱，蝈蝈。攥在手里跑回来，喂小鸟。虫子攥死了，老地主说：“要喂活虫。”让我提着鸟笼，到外边去，捉活虫喂小鸟。

那天，我拎着鸟笼来到水塘边，捉住一只大蚂蚱放进笼子，大蚂蚱与小鸟斗起来，不让它吃，两只小东西一来一去，斗得挺激烈，叫人快活。不快活的是蚂蚱，它斗不过小鸟，小鸟最终把它吃了。

喂饱小鸟，小鸟叫起来，扑楞着翅膀，一副洋洋得

意的样子。就是有点脏，刚吃过东西，又战斗一场嘛。看看那塘清水，我想，干脆给它洗个澡。

我打开笼门，把小鸟掏出来，走到塘边，撩起清水，洗它的嘴和羽毛，它更快活了，吱吱喳喳叫个没完。我就把它放在水面，想让它象小鸭子似的洗个痛快。谁知我一松手，它不下水，却上了天，转眼不见了。

我很生气，它不理解我，想让它洗个痛快，它却痛快地跑了。跑了，它就更痛快啦。我可不痛快，望着空空的鸟笼，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茫然之后，是害怕，怎么回家向老地主交待。

我一屁股坐在塘边，盼着小鸟还能飞回来。等到天黑，还没等到。它不回来，我不能不回去，天黑了，我硬着头皮，拎着空鸟笼回去了。老地主见我这么晚才回去，以为我爱干活，在外边喂了小鸟又捉回虫子，还夸我一句。再一看，鸟笼子是空的，变了脸，问我：“小鸟哪里去了？”

我只好说它飞了。老地主一听，气得山羊胡子一抖一抖的，举起手杖就要打我，爷叔一见，赶快过来护住我。他打不成，就气狠狠地把我们赶走了。

十四 先放鹅，后放火

被地主赶出来，还得再找地主，穷人不雇工，也养

不起我们，只能找地主。可我们穷人和地主又总搞不到一块去。

爷叔又把我带到小地主刘云奎家，他当长工，我放鹅。

刘云奎很坏，给我们住破棚子，破棚子靠鹅圈，我们晚上也闲不住，给他看鹅。

那时天已下霜，冷起来。破棚子四面透风，又没棉衣，夜里冻得睡不着。爷叔就许愿，等拿到工钱，给我买棉衣，让我穿得暖暖和和的。

拿到工钱得等到年底，我一边放鹅，一边掰着指头算日子，天越来越冷，日子过得越来越慢，好不容易盼到年底，也下雪了。

天很冷，我们没有过冬棉衣，想早点领到工钱，可地主不算帐，非要等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是大年三十。天上飘着雪花，爷叔带着我，冻得哆哆嗦嗦，去找刘云奎要工钱。刘云奎喊来帐房先生算帐。帐房先生拔起算盘，噼噼叭叭算了一会儿，说：“你们还欠八块大洋。”

爷叔一听就生气，问：“我们给你干活，怎么反欠你们的钱？”

刘云奎说：“你们在我家，吃的喝的，都是工钱，你们吃得多，不就欠我了？这孩子吃的鹅蛋还没算钱呐。”

爷叔急了，和刘云奎吵起来，最后动了手，打了刘云奎一巴掌。刘云奎也气了，喊来几个家丁，把爷叔和

我揍一顿，还不解气，又扒下我们的衣服，把我们赶出门外。

天正下雪，光着身子多冷，我们倚在篱笆墙边，向院内大喊大骂，要衣服，要工钱。

工钱没要到，衣服要到了。我们骂一阵，骂得他家不得安宁，我们的衣服就从墙上扔出来了，是湿的，被他们用水浸透了，你说多他妈的坏呀！

好！他不仁也别怪老子不义。爷叔带着我，抱来稻草、柴禾，堆在刘云奎家的房后，点起火，拿着衣服就跑。

那场火烧得怎么样就不晓得啦。我和爷叔一气跑到一座破庙里，又点起一把火，烤身子，烤衣服。

我跑累了，走不动，爷叔说破庙不是久留之地，烤干了衣服，穿上，就背起我，顶风冒雪，走了。

十五 两个党员

穷人靠不了，地主靠不住，我们就想找党组织。党组织在哪里，不晓得。

我们沿路乞讨。冰天雪地的，冻得手都接不住讨来的馒头，走了一天一夜，来到泥城镇东塘角嘴小镇鞠妙龙家。鞠妙龙原是个小地主，吸毒破了产，就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泥城暴动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

人。一天，几个警察来抓他，他枪法好，一枪打掉了一个黑狗的帽子，把警察吓跑了，也把他吓坏了，他到底是怕死，就在报纸上登了反党启示，退了党，回家种田。党组织找不到，只好找他这个旧党员。敲开门，鞠妙龙见是我们，就怕起来，怕共产党找他，也怕我们连累他，敌人杀他。他表面很热情，招待我们吃了午饭，饭后就说：“我种田吃饭，一双手养着一大家人，吃一顿没一顿的。孩子放在我家，会受累的，你们还是找个有钱人家住下吧。”

爷叔明白他的意思，就说：“孩子先放你家过几天，我去找组织，找到组织，就把他接走。”

鞠妙龙勉强答应，第二天爷叔就找组织去了，我在鞠妙龙家住了。

鞠妙龙有一群孩子，他们见我争吃争喝的，就欺负我，一对一打架，我不怕，可他们是一家子，一起上来打我，我就吃亏了，脸上少不了青一块紫一块的。

又怕又打，过不下去啦。两三天后，鞠妙龙把我送到另一户人家，户主姓奚，是一位法师，也是个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就当起法师，隐蔽下来。好在他没变成“行云流水一孤僧”，还在等待革命。鞠妙龙告诉他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二话没说，留下我。

奚法师靠作法糊弄几个钱度日，谁家孩子生病，死了人，就来请他去念经、作法，用法术驱邪避灾，他的法术当然是骗人的啦。

可这骗人的机会也不多。刚过年，吃得好，身体壮，生病的少。没病的，没死的，我们就没吃的。

我盼富贵人家生病啦，一病一死，奚法师被人请去，回来总给我带吃的东西，有时还能吃到鸡鱼大肉。人以食为天，我怕挨饿，就盼着富人生病！

那天奚法师被人请去作法，第二天才回来，我正饿得难受，前肚皮贴上后肚皮，一见他回来，赶忙迎上去，准备吃。可他没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只带一句话：“我给你找到好人家啦。”

十六 一进鞠家

那户好人家姓鞠，男主人叫鞠如涛，是鞠妙龙的弟弟，女主人姓蔡，吃斋念佛，相信鬼神。

鞠家是个开明地主，有不少田产，共生五个儿子，小儿子刚死，奚法师是被鞠家请去念经超度那孩子亡灵的。

奚法师把我领到鞠家，鞠家人还在悲痛之中，女主人蔡氏，眼泪没干。见了奚法师和我，就问：“你说的就是这个孩子？”

奚法师答道：“是他，你看这个孩子的长相，天庭饱满，地庭方圆，耳大臂长，蛾眉虎眼，以后必成大器。”又说什么“家里去一个，来一个，这叫鬼去神来。”

蔡氏迷信，听奚法师这么一说，一把搂住我，大哭

起来。

我被弄糊涂了，以为来吃东西的，却被地主婆搂住，滴我一脸泪珠子。

奚法师又说：“老夫人节哀，你这不是又有儿子了吗？这都是命呐，不是你的儿子，你养都养不住；是你儿子，你赶都赶不走。”

蔡氏赶忙擦去眼泪，点了点头，唤人给我拿来吃的，还用一身新衣服换去我一身破衣服，给我起名蔡干。

我在鞠家住下，吃得好，穿的暖，过一段舒服的日子，可不长。爷叔王金连和阿姨王阿兰来了。蔡氏一见他们，就问我的生日。一问才知比她家小儿子小五岁。蔡氏又嫌我小一点，想找个和她小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爷叔和阿姨说尽好话，让我留下，蔡氏才回心转意。她怕有什么不吉利，又请来一个瞎先生，给我算命。瞎先生装神弄鬼，嘴里念念有辞，算了一通，突然瞎眼一翻，说：“四月四鬼出门，这孩子留不得。”

蔡氏一听，害怕啦，不敢留下我这个鬼，就说：“是神入庙，是鬼入坟，你们快把这个孩子带走。”

十七 山回路转，二进鞠家

坟，是鬼的家，我不是鬼，入不了坟，就无家可归。王金连和王阿兰领着我，到处流浪，最后来到长沟乡李

寄洲家。

李寄洲是个乡间知识分子，戴礼帽，穿长衫，家境清贫，但有饭吃。富不了，也饿不死，历代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我改名李正德，在李家住下，王阿兰为了照顾我，也在李家当起了女佣。

知识分子的朋友也是知识分子。长沟乡私塾学校教师林有章，是李寄洲好朋友，常到李家谈天论地，两人甚是投机，痛快时，要喝酒。“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啦，酒后的话，就从家事扯到国事，从国事扯到天下事，从天下事扯到心事。忧国忧民，忧天忧地，说中国的希望在红军身上。算是有识之士啦，也有报国之心。林有章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改名林达，曾任浙东纵队三支队队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那次他们忧起我啦。见我在家无所事事，林叔叔就说小孩子要识文学字，要送我去读书。李寄洲满口答应，把我交给林叔叔。

林叔叔给我起个学名：毛曼增，把我带到长沟乡私塾学校，那时我没到学龄，听不懂，又没坐过学堂，一坐就是半天，受不了。有时教师正讲课，我做小动作；教师批评我，我就跑掉，不上他的课，很不听话啦。

没上几天学，我就被王阿兰领回李寄洲家。李家毕竟清贫。添上我这张嘴，王阿兰照顾我，又要添上她那张嘴，还有王金连，时不时来吃一顿。日子就有些紧张啦。大人只得另想办法。

一天，爷叔王金连领来两位卖老鼠药的人，其中一个秃顶，后脑勺亮亮的，没有一根毛，爷叔叫他国夫，我听成“寡妇”，在他们说话时，我用手拍“寡妇”的后脑勺，当皮球打，边打边说“寡妇寡妇寡妇”，“寡妇”不在意，爷叔却把我拉开了，让我到一边玩去。

玩什么，趁他们不注意，我打开他们带来的褡裢，里边是一包包东西，撕开一个，象糖豆子似的，放进嘴里，一咬还咯咯地响，有甜味，就吃起来，一包没吃完，肚子难受啦。“寡妇”手忙脚乱，给我吃了解药，才好。

奚法师也来了。他们决定再把我送到鞠家寄养。鞠家是大户，能养活我。他们给我穿上一双虎头鞋，脖子上挂个银项圈，打扮一番，又把我的生日提到1923年，比鞠老四小四岁，带我来到鞠家，见到蔡氏，奚法师告诉她上次弄错了我的生日，又装神弄鬼地算命，说他梦见一条白龙，降到鞠宅，又说“五子登科”，少一子不行。不要听瞎先生的，要相信他奚法师。自然把蔡氏说服了，说得她心花怒放，奚法师才住嘴。蔡氏答应收下我，认她为养母，认鞠如涛为养父。王金连临走时，又交给蔡氏一副金锁片，一对金镯子，嘱她让我上学，那些东西做为学费。

鞠家有五个儿子：富卿、贵卿、林卿、金卿、友卿。友卿夭亡，大儿子鞠富卿就把我的名字改为鞠幼钦（友庆），顶替鞠家老五。

十八 一泡大尿闹学堂

鞠富卿就是鞠耐秋，是个教书先生，娶了吴建功的姐姐，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在皖南教书，在皖南事变中被捕。

吴建功这个人也做革命工作，以后我还要提到他。

鞠家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老三鞠贵卿就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他上了军校，当上飞行员。解放战争期间，想开飞机往延安，暴露了，被国民党杀害。鞠如涛去收尸，国民党告诉他：是飞机起落架撞死的，可他的脑袋没有伤。他这个国民党，也可以说是共产党，至少他向着共产党，比共产党中的叛徒要好。

鞠富卿把我送到泥城小学，让我安心读书，可是学校不安定，书没法读。

泥城小学校长姓龚，是国民党党员，脸上有几个麻点，大家都叫他龚麻子；副校长姜文源，是我党地下党员，后来抗日期间曾任淞沪支队副政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一个屋里办公，没有不斗争的。老办法，发动群众，姜文源发动学生，掀起反对龚麻子的学潮。

学潮一开始，龚麻子答应不了学生提出的条件，跑了。学生们就跑到他的家里去闹。谁知他家里上了锁，从窗口瞧瞧，没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很生气，喊

着：跑了也饶不了他。

我个小，几个大同学便给我一个光荣任务，从窗口钻进去，到龚麻子床上撒尿。我正愁着肚子胀，没地方去撒，听他们一说，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把我抱起来，从窗口塞进去，扑咚，摔了一跤，但没有喊疼，重任在身嘛。我爬到麻子的床上，脱下裤子，象机枪轮回扫射似的，哗哗啦啦，撒了一大泡，枕头、被子、床单，都让它沾些臊味。撒完我就冲着窗外喊：“我撒完了。”

谁知外边又来了命令：拉屎，在他床上拉泡屎。

一呼百应，窗外响起一阵“拉屎”的呼声。我把没提上的裤子又脱下来，蹲在床上，用力完成任务。可是不行，不是拉屎的时候，拉不出来，拉不出来硬拉的滋味太难受。我不干了，提起裤子对外边喊：“我拉不出来，换一个人吧。”

外边还是命令我用劲拉，我没听，爬出窗口，几个大同学把我抱下地，骂着：便宜这个麻子了。

龚麻子讨了便宜，我也讨了便宜，学校停课了，我只好在家里玩了。

十九 一条鞭子一条命

鞠家三儿子鞠贵卿，有个同学，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儿子，两人非常要好，据说浦东中学时，他俩在球队

里，一个是中锋，一个是前锋，友谊就是球场打出来的。

那位官员的儿子叫蒋公子，常来鞠家附近打鸟，打不到鸟，就“叉麻雀”，也就是玩麻将啦。他每次来鞠家，都是耀武扬威的。身穿夹克裤皮靴，骑着高头大马，摇着马鞭子，身后跟一个挎短枪的护兵。

别的没看上，我看上了他的马鞭子，那马鞭子很精致，把上镶着五颗钻石，亮光光的，看上去很好玩。那次，养父鞠如涛设家宴请客，也请了蒋公子，他象往常那样骑着大马，摇着马鞭，带着护兵，来到鞠家。饭后打麻将时，他就把马鞭子挂在身后的椅子上。

我看上的东西就想伸手摸一摸玩一玩啦。趁他抓牌，我凑上去，去摸马鞭子，那小子一见，叫起来：“别动。”

我没动，也不甘心，趁他不在意，又伸出手去，还是被他发现了，他说：“干什么？你想偷我的马鞭子是不是？”

我一听，生气啦，我只是想玩玩，干嘛说我偷。好，你说我偷，我就偷，不偷还落个偷的名声。你不让我玩，我也不让你玩不成。趁他和牌，高兴得忘乎所以时，我把马鞭子悄悄拿走，塞进地板下，跑了出去。

打完麻将，找不到马鞭子，鞠贵卿把我喊过来，问：“你把马鞭子拿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没见马鞭子呀。不信，你们搜。”

大官的儿子看我一眼，毫不在乎地说：“没拿就算了，我们走吧。”他和护兵一起出门，出门时，扔给我一包糖

果，说：“给你一包糖吃。”

吃就吃，我撕开糖包，拿出一块放进嘴里。

鞠贵卿送走同学，又转回来问我：“马鞭子是不是你拿的？”我老实告诉他：“是的，在地板下。”他找出马鞭子，很生气，说：“你胆子不小，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抽我一下，又把那包糖果夺走，不给我吃。

不给我吃我也吃了一块，吃下之后，我全身发烫，嘴巴焦干，就把头伸进水缸，没命地喝水，肚子涨得鼓鼓的，喝不下去了，便睡倒在床上，不省人事。

我睡了三天三夜，鞠家人都以为我死了，准备把我偷偷埋掉，那晚吃罢晚饭，他们要把我抬出去时，我醒了，一翻身下了床，说肚子太饿，要吃饭。满屋子人吓得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蔡氏迷信，不知这事是凶是吉，她找来了一个瞎子占卦。瞎子说我命奇，又说他梦见太白金星化一道白光落进鞠家，是大吉。既然是大吉，瞎子又让我暂时离开鞠家。怕相克，也不知相克什么。

二十 铭记深仇大恨

鞠家把我送到大团镇的亲戚家，沈秋生家。沈秋生是镇上的一个小业主，做木器生意，他会干木匠活，做出的扁担，两头高跷，弹性十足，别人爱买，生意比较

红火。他有三儿两女，妻子有病，我认他们为寄爹寄妈。

大团镇小学有位张先生，我一到沈家，他就把我安排到他的学校去读书。他是地下党啦，晓得我的身份。

一天放学回来，在路上遇到两个人。他们见到我，很高兴，很热情，让我跟他们走，说带我去上海读书。我不认识他们，不干，抱着一棵树死活不走，他们没办法，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来寻找我的，一个是吴仲超，一个是我的亲叔叔毛泽民。

我不走，沈家也不是久留之地，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张先生来沈家喝酒，带着一个叫张阿六的大汉。酒后，张先生把我喊进屋，关上门，说：“过来，给你认个干爹。”

看张阿六满脸凶相，我不干。

张先生又说：“认他干爹，他能保护你。”

我还是不干，转身想跑。张先生生气了，一把抓住我，按倒在地，说：“让你认你就得认，给你干爹磕头。”

我又撕又打，死活反抗，张先生操起门旁的扁担，打我的屁股，我躺在地上大叫大骂起来。张阿六见了，就说：“算了算了，双腿沾地，也算拜过了。”

拜个干爹，也保护不了我，几天之后，一群警察闯进沈家，进门就喊：小土匪在哪里。小长毛在哪里。

警察怎么得知消息的？出了叛徒，叛徒是谁，我就不晓得了。

沈家大女儿沈士英姐姐把我藏到水缸里，警察没搜到，就带走了沈士英的弟弟沈志绍。抓回去一个交差啦。

后来托了人情，花钱作保才把志绍保释出来。

沈家呆不下去了。第二天，王金连和张先生把我急急忙忙带走，一路上连跑带跳，有点慌不择路啦。出了镇子，跑过田地，钻进了小树林。

我们在小树林停下来，我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王金连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摊开在地上，报纸上有照片，照片上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张先生厉声对我说：“跪下。”

我望着他的脸色，慢慢跪下了，他们也面对报纸跪下来，看着照片，泣不成声。

张先生抹了一把泪，说：“我教你背四句话，你一定要记住。”说着，他就教我背起来：我的妈妈姓木易，湖南板仓名开慧，何键杀死在长沙，血海深仇长大报。

我跟着张先生，一句句地背诵，背错了，张先生就揍我。边揍边流着泪给我解释那四句话的意思。我明白啦，妈妈被土匪杀了，我长大要报仇。一明白我就感到这四句话很亲切。连背几遍，张先生听了又说：“千万不准给别人背诵这四句话。”

我点点头。那种环境，逼着小孩子早懂事啦。

二十一 重操旧业

出了小树林，张先生走了，王金连带着我离开大团

镇，连夜赶路。我走不动，喊累，王金连就背起我，说给我找个好人家。我在他背上睡着了，醒来一看，面前是我又恨又怕的刘艺人。

我重操旧业啦。刘艺人带我离开上海，到苏州、常州一带，卖艺谋生。老一套，猴子拉车，山羊上架，小狗钻圈。我翻跟斗，上杠子。大约过了三个月，天冷起来了，刘艺人又把我带回上海浦东南汇县。

那天我们来到南汇县万祥镇卖艺，我正演着压台戏，忽然听到有人喊：“鞠幼钦。”

我一听，翻个跟斗下了杠子，一看是鞠富卿的内弟吴建功。

吴建功问我：“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是谁把你卖给这个艺人的？”那时的艺童大都是艺人买的，吴建功以为我被人卖掉了。

我摇头说：“不晓得。”

吴建功要把我领回鞠家，刘艺人不干啦。就问吴建功：“你是他什么人？”

吴建功说：“他是鞠家的老五，我是鞠家的亲戚。我们兄弟。”

刘艺人趁机要钱：“他是我买来的，我要指望他挣钱吃饭。”

吴建功问多少钱。刘艺人就说 18 块大洋，吴建功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当场卖了羊皮袄，凑够 18 块大洋，交给刘艺人。

刘艺人把我交给吴建功，吴建功把我带回鞠家。

二十二 三进鞠家

来到鞠家，养母蔡氏见我回来，很高兴的，说：“外边兵荒马乱，你能平安回家，是佛的保佑。”又说她天天在家为我念经祷告，现在要去庙里烧香还愿。

鞠家人待我不错。后来还分给我四十亩田地，我参加了革命，没种成。新四军撤到浙东进行灰色隐蔽时，怕连累鞠家，我还登报声明与鞠家脱离养子关系。

这次在鞠家，我又有了一次疼痛的记忆。那次，两位前辈来看我，一见满院子都是小孩子，怕我与他们搞混了，也可能是怕我丢了，又在我身上做起记号。

一位前辈把我抱进屋里，另一位前辈拿起挺大的缝衣针，要朝我脸上刺。我一见，吓坏了，连声求他们：“叔叔饶了我吧，叔叔饶了我吧。”

叔叔听不进去，抱紧我，用针在我的左鬓角太阳穴刺了三个小洞，很深，象桃瓜星座；又在右脸上刺出牛郎织女星座。疼得我又喊又骂。他们也不理睬，继续工作，在针刺处，涂上药水，效果还挺好。后来发了炎，脸上留下紫红色斑疤。

那时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一条线上的人给我做记号，另一条线上的人不一定晓得，还要做；一条线上

的人安置我，另一条线上的人也不一定晓得，还要找我。在鞠家没住多少日子，刘艺人又找上门啦。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外边响起一阵锣声，就和一群小孩子“哄”地跑出去，想看热闹。谁知一看，是刘艺人，想跑已晚了，他看见了我，叫一声：“站住。”最可气的是那小猴子，它“噌”地窜过来，骑到我的脖子上，两只爪子扭住我的两只耳朵，我头也转不过来。只好站住了。他走上前一把抓住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糖，也可能是朱沙什么的，塞进我嘴里，还问我好吃不好吃。

那东西有点甜味，可能放了什么迷糊药，我吃过之后满脸通红，不能说话，象中了邪似的，老老实实跟他走了。走到村边，田里干活的人见我被一个艺人领走了，就告诉了鞠家，鞠家人追上来，把我夺回去。

刘艺人见鞠家人多势众，没办法，只好走了。后来，我又来鞠家时，刘艺人还来找我一次，要带我走。那一次，我没走，他也走不了啦。

那时鞠家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了自己的卫队，卫队成员大都是雇工，雇工又多是和鞠家沾亲带故的左亲右邻。他们一边种田，一边扛枪护家，充当雇工和家丁的双重角色。后来鞠家又来了一些政治犯，他们是受李立三错误路线影响在上海举行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抓去关了不少年又放出来的罢工工人，没工作，只好投奔鞠家，充当双重角色，种田，扛枪。卫队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鞠家军。鞠家军人多势众，又团结一致，土匪恶霸见了，

也要相让三分。

那次刘艺人来找我，正好被鞠家老四撞到了。鞠老四才十几岁，是个大孩子，血气旺盛，见刘艺人要带走我，不干了，我是他弟弟嘛。几句话没说，上火了，两人吵起来。

鞠老四腰间有枪，他拔出枪，吓唬刘艺人：“再不滚蛋，我枪毙你。”

刘艺人仗着有点功夫，有恃无恐地说：“就怕你这枪打不响。”

鞠老四听了此话，受到挑衅似的，一扣板机，“当”地一枪，把刘艺人打伤了。

打伤刘艺人后，鞠老四从他口袋里找到一个药瓶，拆开药瓶的硬纸盖一看，是一封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这下，鞠家人都慌啦。怎么办吧，这人放不能放，留不能留。打伤一个共产党，可不是小事。只好灭口。鞠家人把刘艺人伪装成上吊死的，偷偷地埋了，也不知埋在哪里。

后来，有人来找刘艺人，鞠家人都说不晓得，晓得也不能说啊。刘艺人的身份很神秘，到1962年，组织上才告诉我，刘艺人是中央社会部的交通员。

二十三 反动口号换馒头

鞠家老大鞠富卿去上海市闵维北桥塘湾小学教书，也把我带了去，到学校插班学习，我离开泥城镇，来到了上海市郊区。

那可能是34年暑假，放假前班级小学生赛球，我上了场，刚上去，就下来啦，被踢伤了，肠内出血。放假后也回不了浦东，留在学校养伤。鞠富卿让一个女校工照顾我，说过几天再来接我回去。

那几天不好过。用些中药治好伤，照顾我的女校工有事，把我交给一个男校工，那小子是个国民党分子，他把我锁在屋里，有时不给我送饭，故意饿我。那天我饿得没办法，见他过来，就求他给我口饭吃。他趴在窗口，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只要你喊一句口号，我就给你馒头。”他让我喊一句反动口号，当时肚子饿，也不管打倒谁啦，我喊了一句“打倒”也不一定能打得倒。就喊了一句反动口号。那小子很得意，给我送来两个馒头。

就在那几天，有两位前辈来学校找我，要是他们知道我喊过“打倒”他们，心里肯定难受，只好请他们原谅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两位前辈来到校门外，在围墙边摆下场子，卖艺。一位前辈武功高强，舞枪弄棍，另一位前辈能说会道，会拉手风琴，不时亮起嗓子唱一段。

我想出去看热闹，那个看管我的校工不让我出校门。我爬在墙头看一会，他又把我拉开来，去喊了警察，要赶走那两位前辈。

校工一走，我赶忙向墙外丢砖头，喊着：快跑，警察来了。

两位前辈不跑，还在那里表演，不一会，就来了几个警察，抓走了他们。估计没有事，不然他们早就跑了。

二十四 短暂的重逢

鞠富卿带着他儿子从浦东回来，把我接走了，不是回浦东，他带着我，逛进上海城。我们坐着黄包车路过白渡桥时，两位哥哥正在帮人推平板车上桥。

我没看到他们，大哥认出我啦，他一见我坐在黄包车上，追了上来，喊：“小三，小龙。”边追边扔掉手里的铜板。他跑到车前，拦住车夫。二哥也跟着追上黄包车，拉住斗蓬，问：“小龙，是谁卖掉你的？”

黄包车停下来。鞠富卿不认识哥哥们，就问：“你们喊什么？”

大哥指着我说：“他是我弟弟，你不能带他走。”又问：“小三，是谁把你卖掉的。”

我说不清。哥哥们已经长大了，长高了，我一时不认识他们了。鞠富卿也搞不明白，他不明白就不会把我

交给两个穷孩子啦。一个要，一个不给，双方吵了起来。一吵，把巡视马路的警察吵来了。警察就问：“你们吵什么？”两边都说“这是我弟弟”。警察也糊涂了，又问鞠富卿的儿子：“他是谁？”“是我叔叔。”于是警察就把我判给鞠富卿。两位哥哥不让，警察就赶他们，赶不动，就用棍子打，大哥反应快，跑了，二哥被捉住了。警察用棍子打了二哥的头，把他打倒在地，又用皮鞋踢他的脑袋。二哥大叫着：“阿丕叔叔快来救我。”听到二哥的喊叫，跑来了两位叔叔，一个就是阿丕叔叔，另一个是杨秀生。阿丕叔叔问明了情况，又扒开我的衣服，看了我身上的记号，便和鞠富卿低声说起话来。二哥躺在地上，一口咬定我是杨秀生卖的，把杨秀生气坏了，他走过去，又把二哥揍了一顿。

第六章 小少爷和小交通

鞠富卿和阿丕叔叔把我带到顾家，见到主人顾小汀。阿丕叔叔和顾小汀低话几句，顾小汀就和鞠富卿谈起交易，他交给鞠富卿 29 块大洋，又写了一份契约，双方签字划押，象做买卖似的，转交我。我不晓得这是为什么，见到他们交钱，总以为是卖我买我。

我在顾家住下，改名顾义同，认顾小汀为义父。后来他晓得我的真实身份，非要和我兄弟相称，我又改叫他孟兄。

顾小汀是鞠家的亲戚，也是葭莩之亲啦，做生意，发了财，就在上海滩立住脚。他这个人，重义气，豪爽，交了五花八门的朋友，他是青帮头目，与青帮称兄道弟，也与地下党来来往往，是个可歌可泣的人物。瑕瑜互见啦，其实人，谁不是瑕瑜互见？有长必有短，有短也有长嘛。

顾家住一幢小楼，有两个仆人，李妈和曹阿姨，还有一辆小汽车和一辆黄包车。我一到顾家，顾小汀就给我买了新衣新裤新皮鞋，从头到脚，焕然一新，送我去

天水小学念书，来回都是车子接送。看上去，我成了小少爷。

不去学校时，顾小汀常带我走亲串友，看望他三教九流的朋友。他的朋友，在上海滩，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青帮头子，商界大亨，政界要员，军界大官，也有游蜂浪蝶，妖魔鬼怪，不三不四的小人物。一面生，两面熟，我也认识了他们。有一次，送杜老板，就是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去香港。顾小汀让我向杜老板要生活费，他不愿给，我不高兴啦。临上飞机时，我拎起他的小皮箱就跑，他也没追，追一个小孩子失他的身份，飞机飞走了，我打开皮箱一看，里边全是金条。这金条我也没捞到要，顾小汀全交给地下党了。

那时我还认识一位特殊人物，说她特殊，是因为太巧了，巧得令人想象不到。无巧不成书嘛，人这一辈子，总能遇到不少巧事。

这个人叫蓝苹，也就是现在的江青。那时她在上海演戏，也参加地下工作。尽管她打过我骂过我，我还是不愿把她说得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嘛。

在群魔乱舞的旧上海，一个女演员要想站住脚，出名走红，靠什么？靠人捧，靠后台，后台越硬，出名越快。没有后台，别说出名，你一上台，就有小流氓吹口哨起哄，让你下不了台更上不了台。顾小汀在帮派里边有些威望，又帮地下党做事，蓝苹就靠上他，与他同居。

蓝苹在顾家常来常往，也不避人眼，象个妻子似的。

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她 20 岁刚出头，让我喊她孟姐，孟姐就是指仅次于亲姐的姐姐，又说“顾义同”这名字江湖气太重，给我起个秀气的名字：李淑珍。这个名字倒秀气，象个女孩子。

那时蓝苹在上海已小有名气，演过不少戏，有时我不上学，她就带我去摄影棚，见她的朋友。她的朋友都是上海的电影明星、皇后。女人嘛，对我这个小孩子当然很亲切啦。阮玲玉见到我，还让我喊她寄妈。喊就喊吧，寄妈那么多，再多一个也没关系。喊过寄妈后，阮玲玉还真有个寄妈样，把我带到她家住几天，给我买衣服，买玩具。用小汽车接送我上学。

那一次，拍《三毛流浪记》，阮玲玉和蓝苹把我带到摄影棚，摄影棚里有几个小朋友，是唱“报童之歌”的。一听他们唱，我跟着唱起来，无拘无束地唱一段，阮玲玉说我嗓子不错，就让我当起客串小演员，把那个领唱的小朋友换下来，由女钢琴师伴奏，带头唱起“报童之歌”。我也是个小艺人嘛。在“的笃班”圆脸姐姐教我吊过嗓子。

在摄影棚，我当过客串，也当过“梁上君子”。大约是 1935 年初，上海十多位电影明星拍过片后在一起合影，影星皇后胡蝶站在中间，阮玲玉和蓝苹站在她左边，我站在她俩身前。拍照前，胡蝶让我把她的手提包拿开，放到一边去，我就去拿了。合过影，她可能忘了这回事，我也没给她，就把手提包拿回家。也算是偷的吧。

人活着，都有各自的难处，电影大明星也不例外。别看她们穿得光彩照人，住豪华居室，出入有汽车，笑容不离脸，背地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书。那经书比普通人的经书更难念，高处不胜寒嘛。实在念不下去，只好自寻短见，寄妈阮玲玉就是一个例子。

1935年3月，阮玲玉服毒身亡。寄妈死了，我要去参加葬礼，蓝苹带着我，穿着打扮，也换一套衣服。蓝苹身着灰色反皮大衣。我头戴工人呢子帽，上身穿酱色呢子学生服，下身穿人字呢灯笼裤，脚上是黑皮鞋，白袜子。衣服颜色不能太刺眼。

阮玲玉的葬礼很隆重，一代明星陨落，不能说举国震动，也满城风雨。各界人士，当然是有头有脸、有官有位的。有的是一脸悲痛之色，有的是一脸惋惜之情，前来参加葬礼，人来人往，拖拖不断。向遗体告别进行了一个上午才结束。出丧时，围观的人就更多了，象赶庙会似的，拥挤不堪。送葬队伍在哀乐中慢腾腾走着，艰难移动。

阮玲玉是我寄妈，她没儿没女，我只好充当孝子角色，脱帽走在她灵棺前头，两侧还有很多送葬的小朋友。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前头交通堵塞，来了警察，才疏通道路。折腾了一天，才把阮玲玉埋了。

我上报纸啦。当时很多记者来拍照，我走在灵棺前，很清楚。《中国时报特刊》、《上海时报·阮玲玉专号》、《时代画报》、《电影明星》、《申报》，都刊登了葬礼的照

片。

从那以后蓝苹也不常住顾家了，有一阵子，没见到她，不知去了哪里。

我一个人去上学，不上学时，只好在顾家玩啦。顾家门口，有座木棚子，棚子里住一位皮匠，他对我挺好，同我玩，还给我做个皮带子，穿钥匙。一次，他说我的皮鞋坏了，要修一修。修就修吧，他取下鞋跟，换上一个空心的，里面藏着东西，给我穿上，然后唤一辆黄包车，拉着我，满城逛。不一会儿，我就在车上睡着了。醒来时，光着两只脚丫子，我就问车夫：“我的鞋子哪？”那位叔叔笑眯眯地说：“你的鞋样好看，我拿去让人照着样子给我家小孩做一双，一会儿就给你送回来。”其实那是拿去取情报的。

这时我认识一个自称是“大米生的儿子”的人，那就是康生，他也在上海搞情报工作，还对我说过：很多难友是从我皮鞋跟的空隙走出监狱的。

我成了小交通员，顾小汀也帮助地下党做起革命工作。这段安定而充实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又合作了，共同抗日，上海的地下党比以前明显多起来。顾家门口的人也多了，修钢笔的，擦皮鞋的，拉黄包车的，在顾家门口摆摊、立脚，象个小市场。他们对我很热情，一来二往，就熟悉了，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都是外号。挑担子的铜匠，叫

“大耳朵”，擦皮鞋的叔叔，叫“小耳朵”，拉黄包车的，有大老广、小老广和大鹏鸟。他们常在我的书包里、衣服里、帽子里、皮鞋跟里，藏点东西，是情报啦，让大老广、小老广或大鹏鸟拉着我，东跑西奔，从这家到那家，从那家到这家，把上海城跑遍了。

年底的一天，顾小汀兴冲冲地从外边跑回来，进门就招呼佣人准备酒菜，说是招待一位大客人，大客人和老蒋签完字，刚从庐山回来。那天蓝苹也在顾家，她还对我说：“在客人面前不许调皮。”

大客人就是大胡子爷爷，他不认识我了，大人介绍完了，把我忘了，他们边吃边谈，从神态看，谈的话很重要。我听到胡子爷爷要借钱，别的就听不懂了。后来又听蓝苹说“要送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去延安。”除此之外，那场会客的谈话内容我就不晓得了。

这段时间见到的人就多了。烂桃子叔叔，李克农叔叔，林伯渠伯伯，还有越南朋友黄文欢，延安来的乔晓光，大团镇的张先生。李克农叔叔带我执行任务，给我起个名字李志民。完成任务后，还带我去外滩看鬼子的军舰。林伯渠伯伯带我住了几天新亚旅馆，给我起了两名字：林猛，林怀部。后来，我掩护地下党打死汉奸张小林时，就用“林猛”这个化名。

新四军成立时，叶挺将军从香港回国，去就任军长，周恩来委托顾小汀为他设宴送行，我也参加了。吃酒时，我趁叶将军不在意，“嗖”地抽出他的指挥刀，高高举起，

说：“我也要当将军，打鬼子。”

叶将军见了，哈哈大笑，放下酒杯，站起来，纠正我握刀的姿势，说：“指挥刀可不是这样拿的，向前挥，千军万马才能冲上去。”又说：“行，人小志气大，咱中国不会亡，有我这铁军，还有你这钢军嘛。你一定能超过我，当个大将军。”后来我住在叶将军家时，他就给我起名叶超。

这些日子人来人往，很热闹啦，可好景不长，到1937年夏天，出事了。

那时上海赌风甚浓，顾小汀的财产，相当一部分，都是赌来的。人不能常走运，总有背运的时候，那次他去扬子饭店打台球、赌钱，遇到高手，倒了霉啦。赌徒心理，是赢了想走，输了想捞，越想捞越输，他几天几夜没回家，输掉底了。我们又不晓得他输了，见他几天不回来，蓝苹就带我去找他。一进赌场，赌徒们正吵吵嚷嚷，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顾小汀输掉家底，拿不出钱，装撒尿跑了。几个赌徒一见蓝苹，就把她扣住了，说没有钱就用老婆还吧，推推拉拉，把蓝苹拉进屋里，关上门。屋里发生什么事，也很清楚啦。

蓝苹受了凌辱，一肚子火，回到家，想骂顾小汀，可顾小汀不知去向，家都不回了。我就倒霉啦。一不顺心，蓝苹的火就发到我身上，骂我，打我。那天，顾家来了一位姓寿的男人，蓝苹和他胡搞起来。我一不小心，摔了一个茶杯，惊动了他俩。他俩就合伙打我，扒下我的

衣服，打背。开始我还不在于，说：“你们打吧，老子还有点小气功呢。”这话是火上浇油，蓝苹就用扫把，又打又搓，气功不怕打，一搓就架不住了。他们俩，一个打累了，另一个接着打，打了我八十多条把。我的背被打得血糊糊的，皮开肉绽，躺在床上不能翻身。

蓝苹打过我，就和姓寿的男人一起走了。以后就没见过她。我让顾家佣人曹阿姨给大团镇的张先生写信，告诉他我的处境。曹阿姨又请来医生，给我治伤。那几天真难过。总躺在床上，不是个滋味。

几天后，张先生来了，带了一个医生，给我上药治伤，伤处已结痂，张先生就决定把我带走。先带我到照像馆，照了一张彩照，然后就把我送到浦东鞠家，说养好伤，有人来接我。

鞠家是老根据地啦。我在鞠家住了一周，背上的伤全好了，一位姓马的叔叔来了，把我带走。

那位姓马的叔叔是谁，我不晓得，以后也再没见过他。我们去码头乘船时，他说要送我去上海读书，又问我还记得那四句话吗？我背给他听了，他就说：“要牢记住，长大给你妈妈报仇。”他又教我几句哑语，路上不让我和别人说话，坐在船上装哑巴。

我们坐船到了上海，马叔叔把我交给张先生，就不知去向。张先生把我带到安福里，住进大胡子爷爷家。那是个两层楼，大胡子爷爷住楼上，我和张先生住楼下，我改名鞠凤飞，同一名叫“小冬瓜”的女孩，去育才中学

读书，来回都坐黄包车。很舒服，可也不长久。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鬼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形势就紧张啦；抗日的中国人，拼命抵抗；不抗日的中国人，只好逃难；汉奸、败类到处捣乱，破坏。那天晚上，大胡子爷爷家来了警察，说是查户口，其实是查人，门敲得咚咚响。我和张叔叔，还有一位王叔叔，从小门出去，顶头碰到一个警察。张叔叔上去抱住他，我抓住他的手就咬，王叔叔缴了他的枪，把他打昏，就跑了。我们想引开敌人，掩护大胡子爷爷，警察一叫，把别的警察喊来了，追我们。我们三个就分散跑开了。逃掉了，我也与他们失散了，跑到法租界复兴路一带。因不晓得情况，熟悉的人家也不敢去，只好当起流浪儿。

讨饭讨到一位妇女家，她见我已是个大孩子，就留我住下。给她带孩子，背着小孩洗尿布，干家务活。说是收养我，其实是让我养着她们。那次，做了一条鱼，她只让我吃一半，我没留住嘴，全吃了，她打我一耳光。我气了，抓住她的手，狠狠咬一口，跑了。在她家，吃苦受累，挨打挨骂，还不如当流浪儿快活。

8月13日，鬼子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打得很激烈。上海就有点乱了，枪声、炮声，人来人往，支援抗日将士。我没法找组织，继续流浪，擦皮鞋，卖报纸，睡马路。一家豆腐店老板，见我能干活了，就把我领到他的店里，学炸油条，烤烧饼。白天帮他卖油条，晚上帮他赶毛驴磨豆腐，很累的啦。好在这种苦日子没过

多久，我在卖油条时，碰到了张先生，他花钱把我从豆腐店赎出来，告诉我，我们完成了掩护任务，大胡子爷爷已去了南京，可我们没钱去南京，他又把我送到育才中学读书。

上海会战，越打越激烈，双方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鬼子扬言十天进驻上海，结果打了三个月。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士兵也是很多的，士兵大都是爱祖国的嘛。尽管武器装备不如鬼子，但民族自尊心支撑着他们，流血奋战，坚守阵地。蒋介石下令撤退后，还有很多士兵誓死不愿撤下来。有一个团副，叫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在四行仓库，英勇战斗，打得鬼子寸步难行。英国使馆出面调停，让国军撤到曹家浜，直到那天早上出操，有雾，谢晋元被特务刺杀，群龙无首，部队才开始撤下来。

那些日子，上海人也是群情激愤，纷纷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慰问团，支持驻军抗日。苏州河边，天天聚满老老少少，观看打仗，给对岸的中国士兵鼓劲、喝彩，声音压倒对岸的枪炮声。我也受感动啦，一下课，就跑去观看打仗，给抗战将士鼓掌，喊口号，嗓子都哑了。

谢晋元被杀后，部队要撤了，要带走升在四行仓库的国旗，可降旗的绳子被子弹打断了，降不下来。死几个人没关系，国旗可不能留给鬼子，怎么说，它是一种象征。指挥员不惜代价，命令士兵爬上旗杆，降旗。子弹在旗杆边乱飞，士兵一个个爬上去，又一个个被打下

来。我在苏州河这边，一见，急了，都是中国人嘛，心是往一处想的。我一头扎进苏州河，那时已会游水啦，游到对岸，一位大哥哥把我拉上岸，问我想干什么。我没理他，浑身湿漉漉跑到旗杆边，噌噌爬上去。子弹就在耳边嗖嗖地飞着。当时不怕，一心想降国旗。忘了害怕。我爬上去，抓住绳头，顺着旗杆滑下来，把国旗也拉下来，没伤一根汗毛。

那些士兵感谢我啦，有的还向我敬礼，我没在意，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又扎进苏州河，对岸划来一只小船，是接我的。上了岸，我才感到有点冷。冷也得装着不冷，好多人都伸出手，迎接凯旋勇士似的，拉着我，扶着我，有的当场脱下衣服，披在我身上，还有新闻记者，给我拍照，让我谈感想。我有什么感想，看国旗降不下来，心想着急。可我没说。有人给我奖金，也没要，可他硬塞进我口袋里，我只好拿着了。我挤出人群，又碰到两个帮派人物，一高一矮，他们跟着我来到学校附近，才用行话问我在哪个码头吃饭，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奇怪，就先问他们叫什么名字。高个说：“我叫四支灯光。”矮个说：“我叫地头龙。”稀奇古怪的。我说我叫何有宗，是个学生。他听起来很生，又问起我的外号，我想了想，就说：“我叫孙大圣，又叫铁拐李。”他听了一拱手，连声说“久仰久仰”。说不定，那时上海帮派里还真有孙大圣铁拐李。

鬼子进驻上海后，学也上不成了。鞠家的帐房先生

柴成文把我送到大团镇，住寄爹沈秋生家，跟他学木匠。斧、锯、刨、凿，一样没学会，又来到吴建功家，当小交通员。

那时天已冷了，在吴建功家，我没衣服穿，出门送信时就穿着他儿子的棉衣，信藏在大棉袄里。送完回来，再脱下来，给他儿子，我躺进被窝里取暖。没有任务就出不了门。

鬼子占领上海，不怕死的中国人就在市郊拉队伍，打鬼子。1937年12月，青浦县西岑镇上的倪镇德同志，把盘居在淀山湖的陈阿友一伙组织起来，在镇南的万圩寺，成立青浦县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江南抗日义勇军。张先生又让罗星元、倪镇德等人带着我，参加这支部队，化名刘世忠，当小交通员。

队伍拉起来时，只有30多人，这太少了，要同强大的日本鬼子作战，就得发展壮大，招兵买马；动员广大群众一齐起来抗日。我们就宣传啦，到处贴标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拿起枪来保卫家乡。

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快来参加游击队。

这样，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人多了。进步青年，被鬼子杀了亲人的群众，都来了，没几天，队伍就发展到60多人，编了3个中队。

这个队伍，也乱，没个军队的样子。队员很多是夏云飞的徒子徒孙和陈阿友的把兄弟。

夏云飞是陈阿友的师父，章练塘有名的青帮头子，卖狗皮膏药的伤科郎中。他手下的人，流氓习气严重，打人骂人，吃饭不给钱，开小差，偷偷抢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倪镇德是党员，一管他们，就树敌，结仇。后来队伍分化出去一部分人，跟着夏云飞鬼混，倪镇德和女友约会时，被夏云飞带人打死了。这是后来的事。

队伍成立后，给养很困难，没吃的，枪也不多，只好打敌人的主意。农历年底，侦察员探到消息：敌人的运输船要从安庄附近经过，船上有大批食用物资，只有两名鬼子，四名伪军押送。指挥员一听，就要打。可他们不让我参加战斗，我非要去。争了一阵，他们没办法，只好带上我。

敌人的运输船队共有五条船，第一条船上，插着一面太阳旗，一个鬼子横端三八大盖枪，站在船头。旁边还有一个伪军。船队刚进入伏击圈，有人沉不住气，开了枪，打起来，船头上的鬼子打倒了，伪军跳水就跑，后边的三条船，也掉头逃走。我们只缴获两条运输船。

当地群众，帮助队伍把船上的物资卸下来，有步枪，弹药、大米、食油、香烟。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藏起来，部队马上转移。打了就跑嘛。

陈阿友这个人，毕竟是个土匪，积习难改，他把缴获的物资变卖了，携带款项，又跑回淀山湖，当起独霸一方的草头王。

队伍剩下的队员，都是骨干了。鬼子挨了打，就对

我们扫荡、合围。为保存实力，党组织决定化整为零，队伍分散活动。我被送到浙江温州，后来去了江西南昌。

第七章 小小新四军

1937 年底，新四军军部宣布成立，38 年初，军部移到江西南昌市郊的一所小学校里，4 月份，成立了新四军教导队。上海党利用慈联会遣送难民去内地开垦的名义，送去一批人前去学习。7 月份，我跟随许多同志，从上海经温州到了南昌。

教导队分几个部，成年人都编到各部学习，我被编在青年学生队，也就是小鬼队。队员大都是 15 岁以下的孩子，鞠耐秋，就是鞠富卿，任小鬼队队长，让我当一班班长。

我们小鬼队，主要任务是学习，接受党的教育。内容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到了七月底，我们又迁到皖南云岭，小鬼队改成青年训练队，让我当名誉区队长兼班长。

在云岭，我们又上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课，讲课的是薛暮桥老师，他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革命理论》、《基础教育》等课程，也教我们唱抗日歌曲。

那次，我们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叶挺将军还站在椅子上，用他的相机给我们合了张影。

青训队的生活比小鬼队紧张，也累，上军事课，训练项目有列队，射击，野外演习，样样齐全，完全按一个合格战士的要求训练我们。我们住大通铺，生活一致，天天到点起床、到点就餐、到点睡觉，很严格。我以前逍遥惯了，有点吃不消，病了。

青训队快结束的一天早上，别人都起床出操去了，我下了几次决心也没爬起来，身体不舒服。想想，干脆睡个好觉算了。就在这时，曾在叶挺将军“铁军”中当过连长的李一氓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对着正睡觉的我大喝一声：“立正！”

我慌慌张张爬起来，揉揉眼，看清是我们的教练李一氓叔叔，努力在铺上站直身子。

李叔叔“嚓”地抽出指挥刀，把刀背架在我的脖子上，正要说话，我竟晃晃悠悠倒下去。

李一氓哈哈大笑，说：“瞧你这个浓包样，连我的指挥刀都吃不消，还当什么钢军。”

他见我不说话，收了指挥刀，摸摸我的头，烫手，才知我发高烧，病了。同学们闻讯都围了上来，李叔叔赶忙去找医生，给我治病。

青训队结束后，成年人编成“江抗服务团”，分赴各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我们小队员成立新安旅行团，去江浙一带执行任务，都是奔赴抗日战场打鬼子啦。我还

吃药打针，没去成，留在叶挺将军家里。

叶将军住在一座独立楼里，是个两层楼，他们夫妇住楼上，我和他的儿女们住楼下。叶军长把我们编成一个班，让我当班长，说要象管理战士那样管理弟弟妹妹们。可我这个班长有时连自己都管不住，哪能管好这个孩子班。没几天，就捅了个漏子。在叶军长的小楼前有块草地，草地边有棵大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钟，钟旁吊着一只锤子。那钟是报警用的。一般情况就敲一下，紧急情况就多敲几下。那天我带弟弟妹妹们在树下玩，做一个很开心的游戏。游戏做完后，扬眉小妹让我敲钟给她听，我也不太清楚钟声的严肃性啦，就摘下锤子，当当地敲起来。小妹乐得直拍手，又蹦又跳的。没容我再逗她，就见战士们从各个房子里跑出来，炊事员也提着枪跑来了。叶军长快步跑出门，一看钟是我们几个孩子敲的，很生气。他把战士们打发回去就开始惩罚我们。罚我们围着草地跑步。我们排着队，围绕草地跑呀跑呀，跑了一圈又一圈，叶军长还不让停下。他站在草地中间，瞪着眼，看着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扬眉妹妹还小，跑着跑着跑倒了，“哇”地一声哭起来。阿姨赶忙把她抱进房里。我们继续跑。弟弟们一个个倒下去，最后就剩我一个，又跑了几圈，才噗通一声，跌倒在地上。叶军长对我们这些孩子的管教是很严厉。叶将军的长子叶正明，和我差不多大，个头比我高，我们在青训队一起上过课，住在他家，当然是好朋友啦。

那次因为照相，好朋友差点闹翻了。

叶将军喜欢照相，他有一架相机，那天他不知遇到什么喜事，回家就要照一张全家福。大家挺高兴啦，虽说没什么好衣服，还是拉拉衣角，梳梳头发。我的衣服不算太破，就是鞋子，露一个脚趾头。我本来有一双新皮鞋，穿着太大，就给叶正明了，他穿着正合适。照相时我想换回来。叶正明一见我脚上的布鞋，那就愿意换了吗？他不干，我生气了，不理他了。

不理他也得去照相，一家人来到楼前的平地上，叶将军支起相机，让孩子们排成队，一个扒一个的肩膀。阿姨抱着最小的孩子，站在左边，右边给叶将军空一个位置。

叶将军对着镜头，见我侧着脸，低着头，很不高兴的样子，就说：“小超，把脸转过来，高兴点。”

我转过脸，看他一眼，他说：“好，就这样。”按动自拍快门，他跑了过来，站在留给他的位置上。

我闹情绪，没心思，又把脸侧过去，“嚓”地一声，照上了。我照了半张脸，头也没抬起来。这张照片我没有，1988年4月4日的《摄影报》，为纪念叶将军刊出了这张照片。

照完相，叶将军见我还不高兴，又牵来他的大白马，把我抱上去，骑了一圈，我才笑起来。骑马有意思，一骑上马，将军的味道就出来了。那匹马也是将军骑的嘛。

秋天过完了，冬天来了，天冷，衣服少，又没有多

少吃的，日子就不好过啦。叶将军一有空，就提着枪，去山里打猎，打到个兔子什么的，一家人就能高高兴兴地改善一次生活。

那次，我见叶将军提着枪出去，便跟了上去，他发现我，让我回去，我不干。他走我就跟上，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没办法，他只好把我带上。

南方的山林，冬天也是很美的。路上是五颜六色的叶子，树上也有叶子，黄的、绿的、红的，真是满山红遍；松树、枫树、竹子，生机昂然。不象北方的山，一到冬天，光秃秃的，象个和尚头似的。

我们走在林子里，走着走着，叶将军一摆手，让我别动。他猫着腰走几步，端着枪，瞄准。我什么也没发现，枪响之后，才看到一只兔子从前边的树丛中蹦出来，没打死，打伤了。我一见，“蹭”地跑上去就追。叶将军喊：“别动，回来。”我不听，眼看到手的猎物又跑了多可惜。我追呀追呀，兔子七钻八钻不见了。

我这一追，反而误了事，叶将军开不了枪啦。怕打着我。他很生气，说我不听话，以后再不带我打猎。

不让我去我就不去。谁知出事了，叶将军的跳弹打中了一位正割草的老百姓的孩子。好在距离远，没打死，打伤了。

这在当时影响挺不好啦。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军人一枪打中了老百姓，影响军民关系。叶将军派人把那孩子送到上海治伤，不时去看望，还开个大会，作了检

讨。在会上，让同志们出谋划策，解决面临的困难。还痛斥韩德勤，扣发新四军装备和军饷。

部队有困难，叶家也有困难。我本身就是个困难。为了培养我，让我有点出息，叶将军决定把我送回上海，再从上海送我出国读书。后来他把夫人和孩子也送到上海，再送到香港，听说是住在蔡廷锴将军的住宅里。

第八章 钢军的由来：伴随枪弹走过

叶将军把我交给陈慕华大姐，让她护送我去上海。临行前，慕华大姐给我做身新衣服，换双新鞋子。换衣服时，我还不愿意脱掉那身刚穿上不久的新军装。她又给我改了名字，叫陈为东，与安羽、南起、苏岗、钟姐等八人一起上路。是坐船，坐一条小木船，上船时我们还说我们是八仙过海，要到敌人的心脏去各显神通，个个都是斗志昂扬的样子。奔赴敌占区时的心情确实很兴奋，就象当今的年轻人出国一样。我们顺着青弋江到长江，小木船又拖在一条大轮船的后边，拖到上海。为了避人耳目，天黑后我们才进入市区。

到上海后，慕华大姐才告诉我，要送我去香港。我一听，满不高兴。我也有一身血嘛，受到革命教育，晓得祖国就是家，家被鬼子占了，我却跑了，不象话。再说，从小背会的四句话中，“血海深仇长大报”，已象种子一样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啦，我觉得已经长大，想报仇。别的孩子都去了战场，却要把我送到国外，我当然

不乐意。

天公作美，上海轮船工人罢工，没去成。这一下，又惹出一场闹剧。

一 东洋刀，逼着出西洋

上海轮船工人罢工结束后，慕华大姐又找我谈话，说送我去香港是组织的决定，必须执行。我不听，组织决定也得考虑考虑我个人的意见嘛。大敌当前，不让我抗日，让我去镀金，这个决定也不一定正确。再说，我也不会洋话，出去怎么办？慕华大姐苦口婆心，想说服我，我不听，转身就跑。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硬，组织也硬，他们雇了几个人，追我，要把我捉回来，强行送到香港。

那几个人也是坯子，一个小手还拿着一把东洋刀。他们捉我，我跑得更远啦。最后跑到一条船上，想藏身，可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一发现，我就后悔，在船上没法跑了。手拿东洋刀的小子带人围上来，把我逼到船头。我见情况不妙，就急了，说：“你们别过来，再走一步，老子就跳江。”

我真敢跳，他们也看得出，就停了下来，让我跟他们回去。

我说：“我又没犯罪，你们捉我干什么？捉不到活的，

捞上个死的，你们等着倒霉吧。”

那几个小子一听，也犹豫了。要是真把我逼到江里去，他们也交不了差。东洋刀只是吓唬我，他们不敢动真的。

我喊道：“闪开，让我自己回去。”

那几个小子老老实实让了道。这场闹剧就完了。

二 四个鬼子打死仨

去不了香港，组织就把我送到上海西郊青浦县的抗日部队。

青浦第一支抗日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在倪镇德被夏云飞打死后，就由顾复生领导。为了有个合法地位，顾复生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淞沪抗日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顾复生是支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是冯庸钦，二大队队长叫余辉华，三大队队长叫王师龙。这三个大队，除第一大队完全受我党领导外，二、三两个大队都是国民党地方团队改编的，成份很复杂，大队之间为了争地盘抢利益，常常发生摩擦，你打我一枪，我揍你一炮。

三支队队部和一大队的活动地点以青浦的观音堂为中心。1939年春天我被送到一大队一中队当小交通员，中队长叫王正芳。

部队都在农村活动，利用港湾湖叉隐蔽自己，打击敌人，每天都要变换宿营地，派人了解敌人的动向。我是小交通员，一到中队，王正芳就带我去黄渡侦察。

黄渡是鬼子的据点，我们去了四个人，来回都是我走在前边，小孩子走在前边探路，不会引人注意。侦察回来，走到华漕庙附近，要通过一条铁路，我发现了鬼子的巡逻队，赶快跑回去向中队长报告：“前边有鬼子的巡逻队。”

王正芳问我有几个鬼子，我说四个。他下了命令：干掉他们。

我们跑步前进，王正芳边跑边和队员商量：我打第一个，你打第二个，他打第三个。我没枪，第四个鬼子没人打。

跑到路边，我们在树丛里埋伏下来。四个鬼子，排着队，打着太阳旗，扛着三八大盖，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走得很近，大约有二、三十米，中队长才开枪。分了工，一个瞄准一个，打得很准，四个鬼子倒下三个，剩下的一个掉头就跑，中队长又放了几枪，没打着。

我们冲上去，收拾战利品。我抽出指挥刀，朝那个鬼子逃跑的方向一挥，大喊一声：“杀你妈的。”杀不着的，骂一句解解恨。

三 出生入死，命大命奇

部队的宿营地，经常更换，有时一个晚上要换两三个地方。住老乡家，也住地主家。地主的房子多，住得下。深更半夜的，不能叫门，要先翻过墙头，拉开门闩，悄悄进去。遇到养狗的地主家，还要对付狗，用绳子拴住一个挂满鱼钩的猪蹄子，扔过去，狗一吃，鱼钩挂住嘴，绳子一拉，它就叫不出来了。进了门，杀狗吃，反正地主不敢吭声。

翻墙头拉门闩的任务，大都是我干的。那次，中队来到一个地主家，翻墙头时，我的脚被墙头上的玻璃扎伤了，疼得哎哎哟哟的，没有卫生员，扯块破布，随便包一下。第二天就被送到了浦东鞠家。不能行军啦，只好养伤。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浦东各地，和青浦一样，也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各村还有自卫队。鞠家自卫队，打着抗日保家乡的旗号，也参加了抗日活动。我在鞠家养好伤后，没去青浦，留在浦东抗日部队。

浦东抗日部队，也叫抗日义勇军，鞠家帐房先生柴成文，真名陈福民，是义勇军的秘书长，组织让我给他当通信员。我们是老熟人啦，一到柴成文的驻地，他就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说我长高了长胖了，还让人给我们

照像。在他的办公室，一间草屋前，我和柴成文、还有他的女儿、卫士合了张影。

就在这段时间，常州市工委的一位同志来看过我。他化装成医生，来到我们的驻地，扒下我的衣服，看了我身上留下的记号。看完之后，怕记号长没了，又用针管，在我背上注射一些黑墨水，留下一块黑斑疤。

义勇军平时是分散活动，打仗时才拉到一起，我是通信员，跟着柴成文，一次没跟着他，他被抓住了。

那次他化装成一个卖白菜的，出去执行侦察任务。路上遇到乡公所的几个伪军，一搜身，搜出枪来，伪军就把他抓起来，五花大绑，关进乡公所。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发动群众，让群众去乡公所说情作保，保他出来。可乡公所不干，说他是共产党，非要枪毙他不可。主力不在，打又打不过他们，我们只好想办法救他。

到了傍晚，一个队员化装成保长家的佣人，挑着一筐酒菜，去慰问伪军。伪军一见酒肉，就大吃大喝起来，看守柴成文的那个伪军，见同伙花天酒地，忍不住把门一锁，也上去吃喝。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时机到了，我拿着一把剃头刀，从关押柴成文房子的窗口跳进去，割绳子。伪军就在隔墙，说话声都能听见，割绳子时，我心慌手乱，割断了绳子，也割破了柴成文的手腕。他忍着疼和我一齐跳窗跑了。

我救柴成文一次，柴成文也救我一次。那次，他让我给兄弟部队送信，准备合歼一股骚扰群众破坏抗日的

杂牌军队。回来时，我走近路，游过一条小河，爬上岸没在意，一脚踩在一条毒蛇上，我没踩死它它却咬我一口。那时也不懂得处理伤口，捡起石头砸死毒蛇就跑走了，越跑越心慌，越跑越没劲，越跑越晕乎。咬着牙，跑到驻地，就昏迷过去。后来听说柴成文卖了衣服，请来医生救活我。那位医生也没治利索，现在我右腿下还有两个小凹点。

这次没死，算我命大，那次没死，我的命就有点奇了。

在浦东，有抗日的队伍，也有不抗日的队伍，抗日队伍在暗地活动，不抗日的队伍，还招摇过市、大摇大摆，到处破坏抗日活动。环境很险恶啦，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对付汉奸和鬼子，我们就想方设法多搞些枪支弹药。那次我运送一批枪支之后，因走漏风声，在大团镇，被大团镇商团部团长顾立峰的部下捉住了。这一捉住，用句文雅的话讲可就是“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了。

我被押进一座破庙，那座破庙已改成刑场，刑具齐全，鞭子、老虎凳、炉子、铁条，应有尽有。审问我的家伙叫胡二官，尖嘴猴腮的，瘦得没肉，站着象个杆子似的。可这个杆子，打起人来，厉害。

先是审问，胡二官问我：“说吧，别让我们动家伙啦，你这么小，不禁打。说出来枪藏在什么地方，就放了你。”

我肯定不会说出来啦。闭口不言，任他怎么哄、拉、蒙、骗，我就是不说话。

胡二官生气了，一拍桌子：“我就不信你不开口。”用不着他下命令，见他一拍桌子，旁边的几个大汉就把我放在老虎凳上。绑起来，加砖头。加一块，问一句“说不说？”我不说。我的腿是练过功的，在少林寺拉过筋，柔软。砖头加完了，虽然很疼，我咬咬牙，还是没说话。沉默就是战斗嘛。

胡二官上火了，说：“你这个小孩子，还挺硬，换家伙。”

换上来的家伙就是烧红的铁条。铁条从炉子里拿出来，放到我身上。那他妈多疼。我受不了，就开了口，不是说，是骂，先骂他们“汉奸卖国贼”，后要“操他妈”，越骂越烫，我昏了过去。

一桶冷水把我浇醒，花样又变了，胡二官把我吊起来，用鞭子打，边打边问：“说不说。”我不说，也没劲骂了，他们也打累了，就把我吊在梁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继续拷打。他们打，我开骂，就一句话：“我操你妈。”最后把胡二官操急了，他掏出手枪，打了我三枪。

我被抓住后，大团镇的亲友纷纷找商团部保释我。胡二官见我死了，就把我交给亲友们。寄爹沈秋生把我抱到他的家里。

那三枪未中要害。这就奇啦，胡二官就是在我面前开的枪，当时问不出话，他也想打死我，可偏偏没打死，我又活过来了。沈士英姐姐护理我，养好了伤。

“这一箭之仇，后来也报了。顾立峰罪大恶极，趁他去上海一家酒店寻欢作乐时，我掩护几位同志，干掉了他。胡二官后来也被我们的锄奸队打死了。”

四 轻巧活：去做小女婿

在沈家养好伤后，已到了夏天，我在浦东呆不下去了，组织就把我送到青浦县三支队，三支队的领导们，派给我一个轻巧活。

三支队活动区附近，有很多杂牌部队，杂牌部队不抗日，只顾着拉队伍，抢地盘，当草头王。较大的一支部队，就是许雷声的部队。许雷声是个流氓头子，控制着吴淞江，到处设卡收税，钱多。凭着钱财和江湖义气，队伍越拉越大，发展到四、五百人。我们搞统一战线，就想改造许雷声部队，把他拉过来，共同抗日。为了拉关系，青浦工作委员会书记顾德欢，便把我送到许雷声部队，认他为干爸。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比我大十来岁的女同志，也做了许雷声的干女儿。

许雷声这个人，长得挺奇怪，上边有毛，下边没毛，童山濯濯，这是我后来和他在一起洗澡发现的。他是个狡猾的家伙。我们来到他的驻地，他拱手相迎，表面很客气，设宴招待我们，还说了一通“抗日救国”的话，暗地里，却派人严密监视，主要是监视那位女同志。我是

个小孩子，他觉着我干不了什么事，对我较放心，还拉拢我。说要把他的干女儿嫁给我，让我做他的小女婿。他的干女儿就是和我同去的那位女同志，比我年长十岁，我见她人高马大的，不愿意，说打不过她，吃亏。

许雷声是说着玩的，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我挺认真，一见那位女同志，总觉得她是我老婆，有点拘束，可她对我很好，给我洗衣服，教我识字，慢慢地就觉着，这个老婆还不错。可没多久，我这个老婆被人凌辱了。

我们是来搞统战工作的。好多事情都是那位女同志去做，接头，送情报，领任务，都是她一个人去，我负责缠住许雷声。有时她晚上出去，很迟才回来，监视她的人，总被她甩开。许雷声就怀疑啦，说她不守规矩。那一次，她晚上出去，第二天才回来，一进门，许雷声就火了，问她：“干什么去了？”

女同志说去看一位朋友。

许雷声就骂她：“你是去当野鸡了吧？”骂过又喊来几个卫兵，说：“你们过来，送给你们一个野鸡，让兄弟们都玩玩。”

几个卫兵把女同志拉走了。她被凌辱后，组织就把她送回上海。我仍留下工作。

许雷声是看不上共产党的几条破枪，不愿同我们合作。共产党内部，又出了个叛徒，叫戴迪仁，他跑到许雷声部队，积极拉拢这支杂牌部队。能把许雷声拉到鬼子那边，戴迪仁也有功劳，可以升官发财。一来二往，许

雷声和日伪勾搭上了，对我们的态度也恶化了，时常破坏抗日工作，多次向三支队挑衅。三支队没有把握吃掉它，只好向“江抗”主力部队求援。

“江抗”是正规的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遵照党中央“兵分三路进入苏州、镇江、吴淞江三角区”，“在大江以南，创建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江南抗日部队在5月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游击根据地。39年春，新四军第六团团长叶飞率领六百余人东进，在无锡与梅光迪、何克希领导的游击根据地的部队汇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简称“江抗”。总指挥是梅光迪，副指挥是叶飞、何克希，乔信民任总参谋长，刘飞任政治部主任。浦西地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归“江抗”统一指挥。我们三支队也不例外。

为了扫清杂牌军队。更好地开展青浦的抗日工作，“江抗”指挥部决定东进。东进部队分两个梯队进驻青浦。39年7月，何克希、吴昆率领第一梯队抵达青浦，与三支队会师。许雷声听到这个消息，晓得情况不妙，便把部队拉到黄渡日伪据点附近，准备公开投敌。“江抗”决定立即吃掉它，不能等了，就在黄渡南边的北张角，围住了许雷声。结果没打干净，让许雷声这个土匪头子逃掉了，他带着一小股残兵败将，投到鬼子的怀里。

我也被“解放”出来了，组织把我编入主力部队——“江抗”三路五支队，当通信班长。

五 操你妈的日本鬼子

通讯班里大都是 12 岁至 15 岁的小孩子，有上海来的，也有农村来的，七八个人。我带着他们送信、放哨、打听消息，跟随主力部队转战在青浦、嘉定一带。

39 年 8 月初，我们在嘉定打了一个大仗。

嘉定活动着许多杂牌部队，较大的两支是邓敬业部和吕炳奎部，这两个人，一个是奸臣，一个是忠臣。邓敬业勾结鬼子，卖国求荣；吕炳奎，揭竿而起，率部抗日。两个部队经常打打闹闹。我们当然支持抗日的军队啦。“江抗”主力一到嘉定，便联合吕炳奎，打掉了邓敬业的主力，消灭他近千人，光机枪就缴获 40 多挺，步枪缴获 600 余枝。这对鬼子的震动很大，他们集结重兵，对“江抗”围击。鬼子不晓得“江抗”的实力，以为是我们是小部队，在嘉定八字桥一带，我们迎头反击，狠狠地把鬼子揍一顿。

连打两仗，“江抗”主力便撤回青浦观音堂以北地带，休整，扩充兵员。五支队队长刘金林带着一个新兵连和我们通信班的几名小战士，住进草鞋浜，队部设在李泰昌家。打了胜仗又招了新兵，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啦。可乐极生悲。我们的驻地被汉奸发现了，报告了鬼子，12 日中午，驻扎白鹤镇的 30 多名鬼子，在几个汉奸的带领下

下，向我们扑来。等哨兵发现，鬼子已逼近村庄。

那个哨兵也笨，没开枪报警，他要是开枪报警，部队也许能撤出去，少受损失。可他没开枪，跑回来报告。也许他考虑了老百姓的利益，鬼子抓不到我们，会火烧村庄，杀害老百姓。可这种考虑也是糊涂，老百姓也可以跑嘛。

得到哨兵的报告，部队想撤出来已经晚了。鬼子已把村庄包围起来。只好硬着头皮打啦，可新兵连，好多人没枪，我们通信班，也没枪。就队部的几个人，用几条枪抵抗。抗不住，鬼子的火力太猛，我们的人一个个倒下去。支队教导员华应哲晓得我的身份，眼看支持不住，要全军覆灭，就命令一位体壮腰圆的大个子战士，带我从小河突围，一定要把我送出去，他和几个人拼命掩护。

子弹在身边乱飞，象小飞虫似的，咬一口就不得了。大个战士拉着我的手，猫着腰，向村后跑去，跳进河里，带我游过去。在河中，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教导员华应哲拉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支队长刘金林，指导员孟浩也牺牲了。这一仗，我们死了33个。

游过河，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大个战士就背起我，没走两步，一颗子弹钻进他的小腿，我一见他腿上流血，赶忙溜下来，那个气呀，没法表达。手中没枪，不能还击。我跳起来，对着河那边的鬼子大骂一声：“操你妈的日本鬼子！”又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

鬼子能看到，用枪声回答我的叫骂。一听枪响，我马上卧倒。骂是生气，卧倒是本能。

大个战士一拐一拐地带着我跑了，没跑多远，就遇到前来接应我们的部队。战斗打响后，“江抗”司令部得到消息，命令包厚昌率部前来增援。鬼子也怕反包围，不敢恋战，打了个把小时，就溜回白鹤镇。

我是死里逃生。没有人掩护我，是逃不出来的，我这条命，也是许多前辈用命换来的。

六 “沙家浜”中的角色

打仗要死人，更伤人。伤员太多，老百姓家里住不了，部队就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到阳澄湖养伤，编成阳澄湖小分队。

“江抗”首长可能考虑到我是毛泽东的儿子，怕子弹找上我，就不让我上前线，把我编进阳澄湖小分队。我不干。仗是打过，可没亲手打死一个鬼子，这算什么报仇。坚决要求去火线。“江抗”首长就说：伤员都是我们优秀的战士，护理他们养好伤，返回部队，比你上前线的贡献更大，哪里不是火线？你们去，要带上一船食物和药品，要通过鬼子的封锁线，同样是战斗。在芦荡里，说不定条件更艰苦。

我只好同意组织决定，去参加这次艰苦的战斗。

阳澄湖靠近苏州，水面较大，湖中多岛多滩多芦苇。河湖港叉，七拧八弯，便于隐蔽，鬼子不敢进，进去也找不到。伤员们都住在船上，一有情况，马上转移。

带我去阳澄湖的叔叔，是“江抗”一名秘书长，后来晓得他就是夏征农叔叔。我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找到我们的同志，他们交给我们一条小木船，船上地下党从城市搞到的药品和食物。秘书长摇橹，我划船，走小河道，绕过鬼子的一道道封锁线，都是晚上赶路，白天就隐蔽起来。怕汉奸发现，通风报信。

走了一、两天，我们来到阳澄湖，一到湖中，就放心了，鬼子追上来也不怕，能跑掉，河湖港叉好战场嘛。

我们边走边聊天，话题还是老的，从名字开始。

秘书长说：“记住了，在船上，你的名字就叫福根，我喊你阿福、阿根。”

“那你叫什么？”

“我嘛，叫夏天征收农业税。”

“夏天太热啦，我叫你热叔叔吧。”

“好嘛。为了革命工作，我们都要隐名埋姓，等革命胜利了，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热叔叔又说起我们俩在芦荡里的具体工作，当“双员”，炊事员和卫生员。我说我没干过。热叔叔就说，为了革命，什么事都要学着干，并且要学会，干好。

在一个湖叉，我们找到了小分队，共有十多只木船，

伤员们躺在船上，身边放着枪，好象随时准备战斗。一见到我们，高兴劲就来了，说我们是“救星”，雪中送炭。小分队的队长就是“江抗”的政治部主任刘飞同志，他胸部负伤，一喘大气，伤口就呼呼作响，象个排气孔。别的战士，伤势或轻或重，有的化了浓，我们一到，赶忙给他们上药，做饭。当起“双员”。

全国解放后，上海文艺界以此为题材编写了沪剧《芦荡火种》，后来又改编成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我们的伤员战士，真是样板。没有亲身经历，现在不好想象那时的艰苦条件，《沙家浜》里，也没把那种恶劣环境表现好。单说衣服，我们的衣服又脏又破，不象军装，几乎每一块布上，都有血有浓。演员的衣服多干净。《沙家浜》里还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战士拿着芦根和鸡头米，很激动地向指导员郭建光报告：找到食物啦。郭建光就唱起来：大江南自有天然粮仓。找到吃的，伤员很激动，是这样的；“粮仓”之说，就有点夸张啦。芦根鸡头米可不是放在仓库里，拿个口袋就能装满扛回来。要四处去找，还有季节性，季节一过，鸡头米就没了。再说，整天吃那些东西，也不舒服，现在人都能把肉吃腻了，何况芦根鸡头米？

更糟的是，在芦荡里，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我们做饭的火种没啦。没火、只好吃生东西，生东西吃多了，又拉又吐，很多伤员闹肚子，最后连我这个卫生员，也成了伤病员。

到了深秋，天冷下来，在湖中过夜，就冷啦，我们的衣服是夏天的，也没盖的，运输船也不来，我们没接到命令，又走不了。病下去也不是回事。刘飞同志就让夏征农叔叔送我回上海，读书去，又说读书也是革命需要。

我只好服从革命需要，离开阳澄湖小分队。

七 刺刀捅进肚子，象捅冬瓜

夏叔叔带着我，下了小木船，走上铁路，没车，我们只好沿着铁轨，一直向前走。他手拎一串螃蟹，走在前边，我空手走在后边。铁轨太长啦，看不见头，走到太阳偏西，还没到。我走不动了，夏叔叔就背起我。我轻松啦，一轻松竟趴在他背上睡着了。傍晚时，到了上海，我才醒。

进了闹市区，来到一条马路边的一座楼前，我们走上二楼，敲开贾家的门。进了门，有地毯，还有沙发，一看就晓得，贾家不是普通人家。

夏叔叔把我安置好，临走时说过几天就来看我。我改名贾来珠，准备和贾家的孩子们一起去学校读书，可没去成。我的衣服太破啦，穿出去，怕人怀疑是游击队的小侦察员。我就是个侦察员嘛。我呢，又给贾家孩子讲起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他们听得入迷。大人可不迷，

听到后，贾家女佣赶紧把我锁进厨房里，不让我出门。

过几天，夏叔叔来了，他又带来一位叔叔，来看我，可叫不开门。夏叔叔在楼下喊我，我打开窗子，告诉我被锁住了。他也晓得贾家呆不下去了。就让我丢下一根绳子，顺着绳子爬下来。好在二楼不高，我找出一根绳子，拴在窗柱上，丢下去，钻出窗子，朝下溜，快到底了，马路上有人突然喊起来：“抓小偷啊。”

我那样子也太象小偷啦。一听，心就慌，赶忙跳下去，没站稳，翻个跟斗，滚到马路边。马路上的行人围上来，要抓我这个小偷。夏叔叔带来的那位叔叔便说：“去去去，他是我大侄子，被人家锁住了，才从窗子溜下来。”给我解了围。

夏叔叔介绍说：“这是徐丕（音）叔叔。”

我喊了他徐丕叔叔。他说：“跟我走吧，我们三个做生意去。你是我侄子，叫徐嘉良。”

我说：“明白啦。”肚子又咕喽说了一句。

徐叔叔把我和夏叔叔带到附近的一个小摊前，买了两碗面条，他自己吃了一碗，我和夏叔叔合吃一碗。没觉着饱，可他也不买了。吃罢之后，就带我们离开上海，去苏州，常州等地，一路无事，可在常州的一个镇上，办完事离开镇子时，出事了。

镇口有座岗楼，住一班伪军，出镇时，搜查我们。我通过了，夏叔叔也通过了，搜到徐叔叔时，伪军头目打量着他，问：“干什么的？”

徐叔叔说是做生意的。

伪军头目又问：“做生意的，钱哪？”

徐叔叔说生意亏本，全赔进去了。

“你也进去吧。”伪军头目把徐叔叔扣住，押进岗楼。

徐叔叔走不了，我们也不能走啦。夏叔叔带我找伪军头目，说情，我装哭，边哭边说：“他是我叔叔，你们不能抓他呀，他是我叔叔。”

伪军头目听不进去。夏叔叔又回镇子活动，通过关系找来一群男男女女，说情作保。也不行，伪军头目非让我们拿出钱来，想敲我们竹杠。

徐叔叔晓得我们拿不出钱来，就想办法。说好话，答应明天让人送钱，又让伪军头目允许他在岗楼前散步。伪军头目就答应了。徐叔叔从岗楼里走出来，在门口来回走动。

岗楼前有两个伪军站岗，夏叔叔和我就商量，干掉他们，逃跑。我们拟定个计划，给徐叔叔打手势，示意动手。徐叔叔一看当然就明白了。

夏叔叔带我走过去，边走边给站岗的两名伪军打招呼，走到眼前，出其不意，从身后抱住他，徐叔叔扑上去抱住另一个伪军。我飞快地下掉伪军枪上的刺刀，“噗”地捅进伪军肚子，象捅冬瓜似的，没费劲。又赶忙拔出刺刀，扑向徐叔叔抱住的伪军，用力过猛，刺刀捅进肚子没拔出来。两个伪军眨眼的功夫就干掉了，我想带走刺刀，还在拔着，徐叔叔喊“快跑。”就顾不上了，

跑开了。岗楼里的伪军，听到外边的喊声，下了楼，跑出来，可我们已跑远了，打了几枪，没打着。

跑出常州，徐叔叔把我们带到乡下，找到了部队。战士们一见徐叔叔，很高兴，纷纷打招呼。有的叫他谭老阔，有的称他老首长，有的喊他司令员。我晓得徐叔叔是个大首长啦，但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不清楚。五十年代在北京，见到谭震林叔叔，才晓得他就是徐丕叔叔。当时我已是军官，谭叔叔见到我，还说：“好嘛，自古英雄出少年，当小鬼时，你就很勇敢，一连杀了两个敌人。”

八 抱鸡腿，炸飞机

39年8月下旬，“江抗”副总指挥叶飞大哥率领新四军东进主力第二梯队到达青浦观音堂。年底，我被送到他的部队。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山坡的草地上。带我去的叔叔找到一位年轻的首长，介绍说：“这是良团的老首长，叫大哥。”我一看“老首长”这么年轻，就有点佩服他。

大哥没顾得和我说话，对带我的叔叔说：“他交给我了，你放心吧。”叔叔走了，大哥拉着我也走了。去开会。会场就在一块草地，十几位指挥员围坐在一起，中间还放了一只清蒸鸡。大哥披着鬼子大衣，里穿夹克，站到中间，讲话：良团是抗日队伍，在艰难环境中壮大成长，

同志们要继续发扬我军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承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我肚子很饿，鸡香扑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落音，我以为大哥讲完了，冲到会场中间，抱只鸡腿就跑，边跑边啃，没啃几口，我被站岗的哨兵拦住了，他问我“干什么的，”趁我不在意，从我手里抢过鸡腿，塞进他嘴里，我又叫又骂，想抢回来，可抢不过他，只好眼泪汪汪地跑回来，打另一只鸡腿的主意。跑回会场，一看，指挥员们面对一只少腿的鸡，互相谦让着“你吃呀”，“你先来”，就是没人动手。我一下子感动了，不好意思，对另一只鸡腿，也下不了手啦。

大哥见我眼泪汪汪的，就走过来，安慰我说：等打败鬼子，我们会餐，每人发一只鸡，吃得饱饱的。又说，抗战胜利，送我上学读书，当个吃得饱穿得暖的学生。

我心情好了，就问他：“我叫你什么大哥？你总有名字吧。”

他笑了笑：“有名字，我的名字很多：树上的叶子被风一吹，就飞了。”

我说：“鸡毛被风一吹，比树叶飞得还高。”

他风趣起来：“你是鸡毛飞上天，超过树叶，”又故意问我：“你就是叶超吧？”

“是。叶军长给我起的名字。”

“这个名字好。我也给你起个名字。”

我问：“叫什么？”

他有点神秘地说：“叶超。”

一听，我们都乐了。

吃了鸡，部队去打机场。战前组织“敢死队。”并宣了誓。我吃了半个鸡腿，不能白吃，也要参加“敢死队。”叶飞大哥同意了，因为有一个特殊任务，需要我去完成。

天刚黑，队伍悄悄地向鬼子的虹桥机场摸去，半夜，来到机场附近，部队散开，等待进攻信号。

机场内有个电工，是内线，要与他取得联系，约定停电的时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我挎起准备好的篮子，装成电工的表兄弟，去给他送夜饭。到了机场门口，鬼子伪军盘问我几句，就放我进去。我找到那位电工，他把停电的时间告诉我，我就挎着篮子，回去了，报告给叶飞大哥。叶飞大哥说我任务完成了，就让我趴在地上别动。

时间一到，机场突然一片漆黑，爆破组就冲上去了，我一见，也跟着冲了上去，叶飞大哥没办法，只好让一个大个队员跟上我。

行动速度是很快的，慢了要付出代价，时间就是生命。爆破组剪开铁丝网，我先钻进去，从一个队员手里抢过一包炸药，就朝黑乎乎飞机跑去。跑到跟前，把炸药包放在机头下边，一条麻绳拉过来，等别的队员也放好炸药包，拉过来绳子，就开始引爆啦。用力一拉，只见蓝光一闪，“轰隆隆”几声巨响，身边的大个队员扑过

来，把我护在身下。我没事，他却被飞机碎片打伤了。

飞机炸飞了，鬼子巡逻队也炸来了。他们带着军犬，边射击边冲过来，火力组打响了，一阵扫射，把冲过来的鬼子和军犬打死，我们连滚带爬，撤出机场。

爆破组撤下来，燃烧组又冲上去，在火力组的掩护上，向飞机泼汽油，泼完后，扔个手榴弹，手榴弹爆炸，炸燃汽油，机场一片火海，冲天燃烧。炸了两架，烧了两架。等鬼子集合起大队冲过去，我们开始撤退，抬着伤员，边打边走，天黑，鬼子不知底细，也不敢猛追。

撤退路上，遇到两座小炮楼，在河边，部队一不做，二不休，顺手把这两座炮楼端了。枪战之中，我正拍手叫好，一颗流弹飞过来，把我擦伤了。

我挂彩啦。部队又要休整，准备迎接鬼子的报复、打恶仗。一位姓潘的叔叔就把我送到泥城镇北鞠家，对我说：养好伤有人来接你去上学。

九 来抓共产党啦

在鞠家养好伤，我被组织送到上海，住在吴仲超的妹妹吴蕴芝家，她丈夫宋保善是徐家汇邮政局局长，好掩护。

吴蕴芝把我送到光实中学，后又转到开明中学读书，学名鞠友庆。我一心想打鬼子，不太想上学，组织上就

说：读书打鬼子要两不误。我在学校仍参加组织活动。

一天，青浦县工作委员会委员顾德熙通知我，准备参加一个青年训练班，又派一位姓白的同志，把我带到朱家角，住在农村钟家的一座瓦房里。参加青训班的人都是年青人啦，男男女女，十几个，在一起开会、学习。

青训班的一个负责人，姓王。这小子不正经，自己有老婆，还和女青年乱搞。那些女的也是贱货，见姓王的是个领导，都自觉自愿，还争风吃醋。我看不惯啦。

那天中午，我路过姓王的住房。一个女的正在打门，打不开，她就气恨恨地，吃醋啦。让我从窗口看看里边到底在干什么。我踩上砖头，朝窗里一看。床前有四只鞋，帐子里肯定搞上啦。妈的，我肚子里也来了气，冲着窗子大吼一声。

这一吼，对他们影响不大，对我影响大了。不让我参加会议，另派工作，负责给他们烧饭，兼管放哨。

服从组织命令听指挥吧。我就去烧火做饭。人服心不服，边烧边想，我是能当将军的，现在却给这帮胡搞的家伙当上了灶头军。看他们那个熊样，哪象堂堂正正的共产党。越想越气，灶里的火越烧越小，肚里的火越烧越大。饭没煮熟，他们很不高兴，批评我。我更气啦，放哨的时候，见个卖鸡的，我去报告，汉奸来了；见个卖白菜的，我又去报告，来了密探。就想与他们对着干。说我没烧熟饭，好！我改正，加大火，又把饭烧糊了。这一下，他们围攻我啦。

姓王的训斥我：“烧饭也是革命工作。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烧饭吗？这是组织考验你，看你合不合格。”

有人帮腔：“是啦，都是革命工作吗。你要把饭烧好啦。”

这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嘛。我没有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本事，一张嘴斗不过众嘴，只好鸣锣收兵。可就是咽不下那口气。

他们继续开会，我继续烧饭、站岗放哨，肚子气鼓鼓的，没处发泄。正在气头上，薛葭浜小学的一位教书先生，从会场出来撒尿，我和他挺熟，打过交道。就招呼他一声。他也回一句，说：“别走神，出了事你要负责。”

我一听就不舒服，这不是讲我不负责任吗？见他撒着尿还东张西望，战战兢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我就想开个玩笑，吓唬吓唬他。冲他喊一声：“快跑，来抓共产党啦。”

他一听，还真相信，尿也不撒了，提着裤子就窜。看他那狼狈的样子，我乐了，肚子里的气也好像被什么东西放了出来，又冲着他跑去的方向大喊：“来抓共产党啦！来抓共产党啦！”

这下可好看啦。屋子里开会的共产党听到了，跑哇！有的破门而出，有的跳窗而逃，姓王的带几个人跳进河里，他跑过三条河才停下，跑得最远，妈的，他也怕死。

没人来抓共产党，他们这些共产党就跑回来，把我抓住了。

姓王的气坏了：“你小子乱喊什么？”

我说：“你说组织考验我，我也代表组织考验你，我怕烧火做饭，你他妈的怕死。”

姓王的听了，火啦。对众人说：“这小子是个叛徒，干掉他。”

那时干掉一个人，又不用公审，领导一句话，一勾扳机，就解决了。可我命大，薛葭浜小学的教导主任，闻声赶来，他晓得我的底细，就让姓王的放掉我。姓王的不干。教导主任掏出烟盒手枪，把他吓跑了。

我也回上海读书去了。

十 敌人搞治安，我们就要捣乱、破坏

开明中学在法租界里。鬼子占了上海，英美法等国在上海有大片租界，租界在占领区，是国中之国，成了孤岛天堂。我们就利用这座恶浪中的孤岛，开展抗日活动。

到年底，鬼子攻占了我国大部分重要城市，抗日战争到了吃紧阶段。鬼子一方面疯狂攻占战略要地，一方面在占领区，大搞治安，想以安定局面来表现他们的统治“深得人心”，这是政治目的啦。我们共产党人，就要破坏、捣乱。在统治区大搞反治安活动，象孙大圣钻进老妖精的肚子里，让敌人一刻也不得安宁。

在开明中学，我上学时，书包里有时也带一包化学药剂，顺手扔进鬼子的冷却塔，让他们喝不上水。扔了就跑，跑到学校里听课。晚上跟同志们出去，在市里，市郊，大搞破坏活动。剪电线，用头水牛拉倒电线杆，破坏敌人的通讯；在有轨电车道上，插根铁棍，让它翻身，搔乱城市的稳定。让电车翻身是个技术活，角度插对了，一根筷子插在轨道上，都能把电车搞翻。这是科学原理，我们也有专家指导啦。

敌人哪里软，我们就用刀子戳哪里，把他们戳疼了，就四处搜捕我们。许多同志被捕、牺牲。一杀人，敌人就宣布铲除了共产党，吓唬老百姓。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他们一宣布，我们立即搞一次破坏活动，证明我们的存在。鼓舞人民士气。针锋相对嘛。

39年年底，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搞了一次大活动，炸了杨树浦发电厂。行动前，是要搞个周密计划的啦，谁干掉哨兵、谁负责爆破，谁掩护撤退，象现在的责任制，分工到人。我的任务是放炸药包。我们搞到一辆汽车，开到杨树浦发电厂大门口，几个同志装成上班工人，上去干掉哨兵。我们爆破组，就冲进去了。我跑得快，把炸药包按指定位置，放在一个变压器下边，拉上火就跑，跑回汽车上，就跷腿睡起来，任务完成了，心里舒服，悠悠然然。刚躺下。我的炸药包就惊天动地地炸了，司机一听，开车就跑，几个人动作慢，没爬上车。这就是配合失调啦，动作慢的人，怕死，进了电厂

战战兢兢，找不到放炸药的位置，赶不上车也活该。不过他们都没死，趁着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敌人混乱。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逃掉了。

秘密活动，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对自己人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怕出叛徒啦。我那时的化名很多，有时叫王肇和，有时叫李公仆，有时叫王公德，有时叫张玉和。有的名字用一次就不用了，也记不住。

41年1月6日，震惊天下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大批新四军将士，倒在老蒋的枪口下。叶将军被捕，鞠家大儿子鞠耐秋同志也被捕了，许多同志死里逃生，新四军损失惨重。鬼子没打跑，蒋介石又向中国人开刀，太不是个东西啦。杀了人，还说新四军是叛军，理应铲除。糊弄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我们明白真相，就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上海地下党，还有各界进步人士，印了传单、告全国人民书、宣传、呼吁，揭露国民党的暴行，痛斥蒋介石的残暴。我们的破坏活动也改成了宣传活动，我到处撒传单。有一次，背一书包传单，爬到大世界的楼顶，大把大把撒向市民，边撒边喊，还骂。传单从天而落，象下雪似的，市民抢着传阅，很激动。警察不干了，跑上来追我。他追不上，我路熟，几转弯就把他们甩掉了。老游击队员啦。

十一 举起右拳，庄严面对。黑色小轿车

受到的革命教育多了，参加的对敌斗争多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就有了信仰。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就吸收了我。

那时入党，也是偷偷摸摸的啦。皖南事变后，就是撒传单那段时间，我接到通知，让我到精神义路和贾西义路二十几号执行任务。我偷偷摸摸到了那里，一看，屋里有傅浩、施义之，熊向辉、李正保、张静波、王美英，好多人，以为是开会，讲起话，才晓得我要入党。

傅浩和施义之作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人嘛，就要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啦。我住的人家太多，对自己的身份也不清楚，就把表明我身世的四句话，当众背了出来。他们听了，又问我别的情况，反反复复地问，我老老实实把我经历的事，比如住在鞠家，拜过张阿六为干爹，参加过“江抗”，一一说出来。

其实他们对我的身世比我自己都清楚，问我，是看我这个人是否老实。我回答之后。傅浩就对我说：杨家是你的亲生家，王家（王金连）是你的救生家，鞠家是你的养生家。现在你长大了，表明你身世的第四句话应改为“血海深仇我来报。”他又告诉我，我的爸爸是毛泽东，在延安。

我不晓得爸爸到底是谁，听说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不太相信。但那不是开玩笑的场合，见他们一个个严肃认真，我就觉得是真的啦。我是毛泽东的儿子。

入党志愿书是当场填的。为了纪念生养我的三个家庭。志愿书上填了两个名字：鞠涛，王向东。鞠指鞠家，王指王家，东就是老头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在社会关系栏，填上表明我身份的四句话：我的妈妈姓木易，湖南板仓名开慧，何键杀死在长沙，血海深仇我来报。

我那时的字写得不好看，是熊向辉帮我填的表。本说考验我三个月，结果没到一个月，在2月18日，我就举起拳头，做了入党宣誓，成了正式的党员。宣誓一完，就交了两块大洋，做党费。

那时两个哥哥已去了苏联。组织为了培养我，也决定让我去莫斯科学习。41年春，杨国夫，我喊过他寡妇，来上海找我，劝我去苏联上学，说上学也是革命需要。我同意了，决定出国留学。在学校收拾收拾，等人来接我。没几天，开明中学的体育老师王湘，也是地下党啦，通知我，去精神义路广慈医院门口，那里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在等我，并告诉我接头暗号。

我如约赶到广慈医院，门口真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走近一看，里边坐着一个外国佬，嘴里咬一根大雪茄。我停住了，不敢过去。那时我对外国人没好感，总认为外国人是敌人，来中国抢东西的强盗，想不到他们中间也

有我们的朋友。我怕上当，转身就跑。这一跑，错过了一个机会。

第九章 延安：十八吹火棍及其它

没去成莫斯科，组织决定送我去延安。41年春，廖梦醒把我带到重庆我党办事处，本想把叶挺军长的两个儿子也带到延安，可叶正达上街卖兔子去了，情况又紧急，只带上叶正明。护送我们的，是一位张叔叔，他武艺高强，给周恩来当过警卫员。

41年的延安，正是困难时期。鬼子进攻，国民党也断送八路军的给养，还到处制造磨擦。军队和老百姓，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到那里一看，延安和上海相比，就象擦腩棉袄和西装革履。人土气，住窑洞，吃的也粗糙。

蓝萍改名江青，与老头子结了婚，见到我，有点不自然啦。她带过我一段时间，怎么说，也不会把我当敌人看待，我又是客人，她得热情点，面子上才过得去。最难办的是称呼，不能叫她孟姐，更不愿喊她妈妈。她让我叫她阿姨，我也不干。用统一称呼，喊她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派人，带我走访杨家岭，参观，熟悉环境，转了一圈山山岭岭，有点收获，晓得边区军民热情，在

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我和张叔叔住进一个窑洞。一位叔叔还在窑洞前，给我拍了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

老头子是很忙的啦，见他的面，要经组织安排。时间定在下午，到杨家岭的第三天下午，我见到他。我被带到他的窑洞时，他好象刚起床，衣冠不整，满脸倦色，象个流浪汉似的，但是很高兴，脸色很和蔼，可他一说话，我心里就别扭起来：怎么是这个味的。

老头子一口湖南土话，我只能听清几个音，成句的，就听不懂了；我是一口上海方言，他听起来，也皱眉头。这场会面，就因语言问题，与我原先想象的激动场面有点出入。

老头子让我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饭，菜的味道也不是很好。他吃得很开心，父子相见，天伦之乐，这是语言阻碍不了的人之常情啦。

可是没几天，老头子就不高兴了。

延安的生活很艰辛，吃小米、粗面、泥团子，我在上海吃惯了大米，对那东西没胃口，吃几顿就咽不下去了。首长们吃小灶，大米饭，白花花的，我不是首长，吃不到，吃不到也想凑上去吃。有时大米饭一出笼，我也不管首长不首长了，上去就吃。厨师不高兴啦，打小报告给老头子，老头子听了，就皱起眉头。

开始时，我和四个小鬼一起在抗大学习，孙毅主讲战术课，讲得好，只是我还小，好多东西听不懂，也贪玩，下了课就跑走了。那时枣子已熟，红红地挂在枝头，

我心里老想着打枣子吃。

那一天，抗大领导交给我一封信，让我送给主席。我就去老头子的窑洞，路上，在一棵枣树上摘了两衣兜红枣，边走边吃。到了窑洞前，我对警卫员说：我是给主席送信的。警卫员进去通报一声，老头子就走出来，招呼我在门前的石凳上坐下。要和我谈谈啦。

我递过那封信，说：是抗大领导给你的。老头子接过去，没看，说：目前我们的生活很苦，同志们都能坚持，你不能因为是我的孩子就去抢大米饭吃，要改掉上海带来的坏习气。又说：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就是为了战胜困难才出生的。

我边吃小枣边听他的管教，也不说话。没法说，老头子管教儿子，又不是首长管教士兵，还可以顶两句。

老头子又说：延安比不了上海，但也有上海比不了的嘛。就说这小枣吧，在上海你能吃到吗？

我说：吃不到。上海卖的小枣又干又硬，这里的红枣，又脆又甜。你也吃一个。我掏出一把红枣递给老头子，他伸出大手接过，扔进嘴里一颗，边吃边看起信来。

也不晓得是什么让老头子想起群众纪律，他突然把嘴里的枣核一吐，严厉地问我：这枣子哪里来的？

我说：树上摘的。

老头子一听，火啦，一拍石板，说我破坏了群众纪律。

我说：枣树满山遍野都是，摘几个吃吃算什么。

老头子说：枣树都是人民群众的，共产党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是个士兵，不晓得吗？偷摘群众的枣子，比拿了一针一线更严重。

我要辩解的啦，就说：你说我违反了群众纪律，你刚才不也吃枣子啦。你也违反了。比我还严重，我是士兵，你是主席。

老头子一听，气坏了，说不赢，就揍吧。他满地找东西，最后从屋子里拿出烧火用的吹火棍。

我不怕。什么揍没挨过，铁条，皮鞭，老虎凳，还怕这个吹火棍？我说：揍吧，揍我就不叫你爸爸。

老头子已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一把揪住我，朝我屁股，揍起来，边揍边数：一、二、三、四、五……

前几下不疼，他没用劲。警卫员来劝，周围的人听到吵声，也围了上去，劝他别打我，就是没人敢夺下他手中的棍子。不劝还好，一劝，假打就变成真打，棍子落在屁股上，也疼了。老头子揍了十来下，见我昂着头，毫不畏惧，就说：我非把你揍哭不可，看你硬还是棍子硬。

我气呼呼地说：我不会哭！我早就哭过了。

别看老头子很疲倦，最后几棍子还真带劲，我吃不消啦，哇地哭起来。哭也是因为心里难受，坏人打我，自己的爸爸也打我，想想心酸啦。

老头子打了十八下，说是十八下杀威棒，他是个讲典故的人，打人也要打出一个典故中的数。

他松开我，我把衣袋里的枣子掏出来，向他头上扬去，边扬边哭着说：我不喊你爸爸，我不喊你爸爸。

我没法报复他，以为不叫他爸爸就是对他的惩罚。

围观的人拉开我、劝我。老头子手一指，大声命令手下人：去，让王英林上山打柴烧炭。我就不信改造不了他。这样子，长大就反了天啦。

我去接受劳动改造啦。

北方的天冷得早，当时中央首长的窑洞里都生了火、烧木炭。木炭也是烧出来的，是个技术活，木材放进窑里，烧到一定程度，用水浇灭。过早过晚都不行，讲究火候，张思德就是专门烧炭的，我跟着他打柴。

北方的山，树木较多，野生的，也有老百姓种的，摘枣是违反群众纪律，打柴不是，打柴是革命需要。到了山坡树林，张思德砍粗枝，我砍细枝；他背大捆，我背小捆；他烧炭，我负责把烧好的炭，用布袋背到首长的窑洞，分给他们。江青不是首长，窑洞里也生火，她不会生，我给她分炭，还要给她照料火盆，干不好，她就骂我。

我和张思德，也不是打柴樵夫钟子期遇到伯牙啦，搞不到一块去。打柴打累了，我就想休息一下；我一休息，他就说我偷懒，革命性不坚决。我们就争论革命是什么，谁说谁有理，争不出个结果，就吵起来。

那天，我们穿着脏得分不清里外的衣服上山打柴，路上，我给张思德讲起我的战斗经历，话中难免表扬自己

几句，他听了很不在意，说革命有流血的，也有流汗的，流血流汗，同样是革命者。

到了山坡树林，张思德把绳子拴在一根粗树枝上，没砍几斧子，就让我去拉断它，说：来呀，你不是很有能耐的吗？来把这根树枝拉下来。

这是一种挑衅，我一听就不舒服，赌气地说：来就来，我就不信拉不断它。

我接过绳子，拉起来，那树枝较软，张思德又没砍几斧子，拉得一颤一颤的，就是不断。我急了，攥足劲，用力一拉，结果那树枝一个回弹，把我拉过去，摔个嘴啃泥。

看到我的狼狈相，张思德象报了什么仇、消了什么怨似的，哈哈大笑。

我爬起来，埋怨他为什么不多砍几斧子，他就讲我没能耐。三句话没说，又吵起来了。正吵着，中央保卫处的一个科长带着一名战士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他们怕我出事，是暗中保护我的。老头子对我不怎么样，下边的人对我还挺关心。

保卫科长走过来，责问张思德：你这不是欺负他吗？

张思德说：我怎么欺负他了？我干活，他也要干活。

保卫科长生气了，说：他拉不断，你还硬让他拉，这不是欺负吗？你个大人欺负个孩子，不象话吧？

张思德也来气了，望着严肃的保卫科长说：我看你这是欺负我。

这是导火线，一下子把两个人的火点起来。大声吵，吵个不休，保卫科长要揍张思德，但被那名战士劝住了。不论谁是谁非，打架总不是好事。

我给江青生火时，她见我不高兴，问我怎么了，我就说张思德欺负我，没法干工作。江青就给老头子打了小报告，保卫科长也给老头子回报了我被欺负的事。老头子可能觉得我“劳动改造”改造得差不多了，就答应我回抗大学习。

我又上学啦。在抗大，除了我们五个小鬼，也叫少先队员，是小学生，别的都是军官，还有一些大军官。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从这些军官开始的。军官里边，有的只会打仗，马列水平不高，常犯错误，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得整顿，我们强大的军队就是整顿出来的。整风的内容是三句话：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抗大里都是高中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带了个头。我在抗大，不是高干，也参加了运动。开会，学习。军官们自我评价，检讨不足；同志们互帮互助，提出意见，纠正错误。开会时也有声音大的，不服气，就吵。

有个年轻军官，长得很漂亮，打仗异常勇敢，各方面都不错，就有一条，爱搞男女关系，经常和那些女文工团员，胡搞。别人给他提意见，他也接受，表示改过

自新。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批评和自我批评搞了一次又一次，当时管用，过后不顶事，他那老毛病一见到女文工团员就犯。这位军官革命觉悟很高，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干不革命的事，也急上火了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那天开完会，年轻军官又吃了一通批评，恨铁不成钢似的，跑回窑洞。我住在他附近，开完会也回去。走到他的窑洞前，听到里边“爹呀娘呀”地叫喊，跑进去一看，年轻军官手里拿着一把剪子，肚子下边流出了血。我问怎么啦，他不说话。我赶忙去喊卫生员，一个女卫生员跟我跑来，进了窑洞扭头就走，又换个男卫生员。男卫生员给年轻军官处理了伤口。年轻军官为了脱胎换骨，把自己的阴茎剪了，是想剪掉，但不晓得剪掉没有。当时男卫生员不让我看，把我赶出窑洞。

那时也有错案啦。有一个上海来的知识分子，革命性也挺强，就是脾气古怪，性格孤独，与人搞不到一块去，平时的行为也有点神秘，又经常犯上，就被抓了起来。拷问时他拒不认罪。没罪嘛，怎么认？要说是错误，那谁没有？办案的人就决定枪毙他。一天夜里，部队行军，途中把他带上一条叉路，押他的人高喊：你别跑，站住，再跑就开枪了。接着就响起了枪声。其实他没跑，喊“别跑”是找个开枪的理由。我把这事告诉老头子时，老头子用手梳了梳头发，叹口气，吩咐人去整理那个知识分子的遗物，还厚葬了他。在抗大门前有块平地，军官们下了课，常到平地上去打网球。球拍都是缴获敌人的，

有的是正宗美国货。他们打球，我就跟他们去玩，帮着捡球。在球场出了两件事，一是，他们和我在一起照了像。二是我被打昏过去了。那次我在边上看球，没注意，万里叔叔用力打了一球，正巧打在我的阑尾部，我哎哟一声，倒在地上。他们开始还以为我是装的，见我半天起不来，才晓得是真的打中要害部位，把我背进窑洞，找来医生。医生来了也不管用，吃了药止不住疼，药的质量差。我哎哟哟躺在窑洞里，不吃饭，也不想吃那样的饭。人不吃饭不行，他们就想法让我吃一些。林彪端来一碗面条，让我吃，我不吃，他就是把面条吸溜得嘶嘶响，逗引我的胃口。最后我还是没吃，那儿的饭我已经吃腻了，闻着那味都难受。再说，我的阑尾部确实疼，别说吃东西，就是动一动，都疼得受不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我才弄清疼的原因。78年，我开刀割阑尾，医生竟从我的阑尾处取出一把小刀，也不知怎么弄进去的，想想很奇怪。在此之前我的肚子从没破过。那段时间是张叔叔整天陪着我，他在一边愁眉不展，其实他早过不惯延安的生活了，就对我说：这里太苦啦。上海比这里好哇。

我说：是啊，光吃小米，药也没有。

张叔叔说：小米在南方可是喂小鸟的。

我说：在上海就是要饭，也能要到大米饭。

张叔叔问：你想不想回上海？

我说：想啊，可怎么回去？

张叔叔说：这好办，你哭起来，我就有办法了。

他是有武功的人，伸手把我的下巴壳端下来。下巴壳端下来，嘴巴就显得大啦，我使劲地哭，张叔叔就背上我去见老头子。

老头子见到我们，看我哇哇大哭，也不高兴啦。张叔叔说：他要回上海。我看就让他回去吧，在哪里都一样为党工作。

老头子不耐烦地挥挥手，说：行啦行啦，我这里不是上海，留不住你们，你们回去吧。

张叔叔又问老头子有什么吩咐。老头子想了想，口气缓和下来，说：回去后让他好好读书。我这个伢子，象个烈马，不好驾驭，要严格要求他。他就托付给你啦。

张叔叔一听，单腿跪地，双拳一拱，对老头子说：您放心，只要我不死，就能把他抚养成人，以后交给您。说完，他又撕开小袄，从绑腿拔出两只匕首，插进他的双肋。

这是武林豪杰的双肋插刀，表决心啦。我一看血流出来，也不哭了，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哎呀，血流出来了。

老头子赶忙扶起张叔叔，又让警卫员去唤卫生员，说：好啦。你们去吧。找军需处领些路费。

张叔叔也没要卫生员包扎，拔下匕首，插回绑腿，带着我，高高兴兴地走出窑洞，去找军需官领钱。路上，他一伸手，把我的下巴壳端上，对我说：我这点伤不算什

么，皮毛的事。几天就好。

我不晓得他练的什么功。那匕首肯定没插深，见了血，就行了，做做样子。

我们找到军需官，打开军需库，银洋都是装在布口袋里的，很多，军需官只答应给我们一百块大洋。张叔叔给我使个眼色，我就哭着喊少。军需官正数着大洋，我伸手就抓。军需官又不能从我手里抢回去，没办法，看着我们装满一千粮袋大洋。张叔叔把那袋大洋缠在腰间，带我走了。

一路上，能坐车就坐车，牛车、马车、汽车、火车；不能坐车就地走，走只能靠两只脚啦。我的脚没长大，走不动，只好靠张叔叔，我一喊累，他就背上我。

走了十几天，我们来到徐州北边，不敢进城，就住进城边的一个大地主家。

那个地主有一个大院子，很多房子，好几个老婆。他的小老婆，和他女儿差不多大，虽不倾城倾国，也有几份姿色。我们住进去，张叔叔就和她搞上了。

张叔叔这个人，男子汉味道实足，对女人有魅力。进了地主家，地主招待我们，吃饭时小老婆就献起殷勤了，对张叔叔又是挟菜，又是敬酒，饭后上茶上烟。他们肯定眉来眼去，秋波暗送。我看不出来。只晓得张叔叔为了表明有钱，睡觉前把我们仅有的五块大洋，数来数去，叮叮当当，故意让地主的小老婆听到。我和张叔叔睡在一个铺上，事情都在我睡熟时干的。老地主来打我们的

门，喊他的小老婆，我才醒。醒来就觉得床上多了两条腿，又见小老婆从张叔叔那头爬起来，跳窗跑了。不一会，外边就传来她的骂声，骂老地主：“半夜三更，鬼喊什么，我撒尿去了。”老地主不敢回嘴，怕老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走了，走到徐州城南，听到吹杀人号，就凑上去看热闹。

国民党部队，也有抗日的，战场上的逃兵，抓回来就砍头。我们走上杀人场，见一群国民党士兵押着几个逃兵，从车上跳下来。先在地上挖个洞。挖好洞，把逃兵押上去，脑袋冲着洞口，跪下。指挥官一挥手，逃兵旁边的刽子手大刀一旋，脑袋就滚进洞里，血也流在洞里。

看完杀人，张叔叔去买了几个馒头，跑回来，在一个洞里蘸上人血，吃起来，津津有味，带着我边走边吃，说：吃了壮胆，来，你也吃一个。

我不敢吃，他就说：吃了鬼都怕你，吃！

我想壮胆，让鬼怕我，就接过一个血糊糊的馒头，闭着眼睛咬了一口。腥啊，腥味刺鼻，我恶心得要吐，赶忙扔掉。张叔叔不高兴，跑去把血馒头捡回来。

在一个小站，我们爬上一辆货车，到了南京，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我回到租界里的开明中学，继续念书。

第十章 钢军的成长：伤身与伤心

一个人的成熟，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事件有关。时间到来，事件发生，人就长大了。不晓得别人有没有这种体会。我觉得自己是突然长大的，在一夜之间，由一个嘻笑的孩子变成一个庄重的大人。

回到开明中学不久，41年11月份，顾小汀、杨国夫、宋望社等人来到学校，以看望我的名义，秘密集会，筹建抗日游击队。又没会场，大中午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学校操场边的竹篱笆旁，装着聊天的样子，商量部队改编，决定把浦东八区宋望社的自卫队和鞠家自卫队，统一收编成一个支队。顾小汀任支队长；杨国夫化名姜太公，任政委；我化名刘长生，任副支队长。那时说是18岁，我实际年龄只有14岁。当上副支队长，就象突然长大许多。国难家仇，涌上心头；肩上担子，也觉得沉重；打鬼子除汉奸的心情，异常迫切。行为举止，少一些顽皮，多几份稳重，象个18岁的青年了。

支队成立后，由顾小汀、姜太公率领，活动在浦东

地区。队员多是农民出身，平时在田间干活；一有任务，便扛枪战斗。这种亦兵亦民的战士，灵活机动，也便于隐蔽。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见机吃掉小股鬼子汉奸，骚扰敌人，搞得鬼子伪军惶恐不安。我在开明中学，负责搞情报工作。在法租界，看上去很危险，其实是较为安全的，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出乎他们的意料。安全有时就存在于危险之中嘛。开明中学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许多情报，比如鬼子出动，扫荡、清乡，汉奸活动地点等等，都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在外滩76号，打掉大汉奸张小林，情报是我传的；除奸时，也是我掩护的。

就在我得心应手工作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41年12月8日，日本鬼子动用大量飞机，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群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并向英、法等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发动全面进攻。美国当时是盟国，损失惨重，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国作为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员，也加入对日战争。日本鬼子就进驻了法租界，开明中学被迫停课。

我只好退学啦。鬼子疯狂进攻抗日部队，部队隐蔽，联系不上，我便坐船回到浦东泥城镇北的鞠家，在鞠家等待组织联系。

过完旧历年春节，上海党派一名女同志前来同我接头。她化名陆暮云，长得挺秀气，瓜子脸，大眼睛，白静静的。来到鞠家，告诉我准备接受任务。我正一身劲

没处使，一听有任务，非常高兴。要走马上任。可她说不急，让我在鞠家等着。

我只好不急啦。陆暮云急急忙忙地走了，没出村口，被一只恶狗窜上去咬了一口，咬着腿了。没法走，我便让蔡关福，他是鞠家亲戚，也是地下交通员，送陆暮云回上海。几天后，蔡关福从上海回来，给我带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蓝苹从延安写的。信上大意说，让我读书，参加抗日，不要做亡国奴。这些我早就付之于行动啦。我让蔡关福再跑一趟上海，向上海党及蓝苹，转告我的抗战决心。

钢军是一种理想，我想当钢军，也不能以钢军自称啦，那时的抗战意志，是钢一般硬的。这与我的身世、家仇及革命前辈的教育有关，与我的性格有关。最终我没成为钢军，就要由别人评说了。

一 走进动摇不定的地盘。两次接头

我在鞠家呆到 42 年 5 月份，春暖花开，桃红柳绿，上海党派人前来接头，让我去“友军”做策反工作。这不是我向往的刀对刀枪对枪的战场，但也是革命任务。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动身前往崇明县县长孙云达部，从此结束学生时代，成为一名专业士兵。

孙云达是对抗日动摇不定的国民党县长，属于顽方，

在统一战线中也算是“友军”。他有两个支队，几百人。一个支队的队长叫魏显庭，是个土匪出身的草头王，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另一个支队长是徐家杰，他是鞠家的亲戚，抗日决心比较坚决。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放在魏显庭支队。

我来到魏显庭支队。魏显庭对我是有戒备之心的，公开排挤共产党人。在他的支队，不准有党组织活动，更不准发展党员。唯恐共产党人“赤化”了他的队伍，拉走他的人马。

那时的部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党部队里有共产党员，共产党的部队中也有国民党分子。不准发展党员，魏显庭支队也有党员。我就是个，是秘密派入的，还有别的同志，趁魏显庭招兵买马之机，混了进去。我们秘密成立政工队，我当班长。不准搞宣传活动，我们就搞游艺活动，比如打球、游泳比赛等等，这些活动没有政治性，其实有，我们接触了士兵，与他们交流感情，用一些生活用语，比如鬼子杀了人，大丈夫能站不能屈等等，把抗日思想传播给他们。士兵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抗日思想，就进步了。很多战士，都是这样站到革命队伍这边的。

孙云达部的秘书长荆志刚，是个地下党员。解放后，他曾在浙江省体委工作。他当时是我的领导啦。因我们与上级联络不方便，我们就盯上孙云达的电台。孙云达有两部电台，电台在那时可是稀罕之物，在传递情报及

作战方面非常重要。为了及时向上级报告，掌握孙云达部的动向，光靠人传递消息不行，也危险，我们就想“现代化”啦。

负责发报的杨电台长和李报务员，是进步人士，都是有文化的人嘛。要掌握电台，就必须拉过来他俩。我们就做起思想工作，晓之以大义，没费多少劲，两位进步人士就成为我们的党员。

掌握电台，就要向上级要秘电码，有了秘电码才能发报。我受命执行接密电码的任务，在一座很高的木桥上，同党组织派来的张尧山、施义之等四人取得联系。他们把密电码封在一个竹筒里，交给我，嘱我千万小心，泄漏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放心，没事。

来时没事，回去时，有事了。鬼子在路上设置了临时哨卡，过不去。

这也不算什么事，我咬着一根苇管，从河里潜泳过去，绕过了鬼子的哨卡，平安无事地把密电码交给荆志刚。

取得密电码，同志们很高兴的啦。可还是不能发报，为了安全，发报要约定收发时间。前来接头的同志怕出万一，发报时间没有一起交给我，让我再取一次。接头地点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如约来到一个小镇的一个小商店，进门一看，几位同志正在商店里买烟。我走过去，张尧山热情地递上一支烟，点上火，问“烟味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把衣袋里的一包前门牌香烟掏出来，拍在

我手里，“都拿去抽吧。”我晓得烟里有内容，客气地推让一番，才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就这样，我取回发报时间。

有了密电码和发报时间，我们就可以定期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孙云达部的变动情况及我们的工作情况，随时接受新的任务和指示。这比用人联系，方便多啦。也安全。

二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42年9月，日伪集结重兵，对苏浙皖等地区实行大清乡，妄图一举歼灭抗日部队。为保存实力，抗日部队，包括新四军、游击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还有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杂牌军，统统撤到浙江东部，部队番号叫“崇德部队”，进入灰色隐蔽系统。忠救军比我们溜得快，兔子似的，一到浙江，就抢占地盘。

各种部队聚集浙江，难免混乱，为了统一领导，成立了第三战区游击司令部，由国民党专员薛天白任司令长官。司令部下属以支队为编制，一支队长是我义父顾小汀，二支队长是鞠家亲戚徐家杰，三支队长是我的老师林有章，四支队长是我孟兄鞠富卿的内弟吴建功，五支队长叫柏连生，十二支队长是魏显庭。新四军正规部队改称浙东纵队，由何克希领导。新四军这个番号，暂

时保密。

我化名杨永泰，跟随孙云达部撤到浙江嵊县。各“友军”的政工队，改成青训队，集中学习。学习期间，我又改叫鞠幼钦。因我在部队中的亲戚熟人多，后台硬，许多人喊我小叔叔，很客气。

游击司令部下属的支队，成份复杂，支队之间，经常发生磨擦，战事不断。一有情况，浙东纵队就来平息。打了几仗后，那些挑起事端的草头王也安静了。于是流传一句话：三个胡子打不过一个麻子。三个胡子是指田胡子、艾胡子、张胡子。田胡子叫田蚰山，是个流寇队长，曾在南汇、青浦等地当过草头王，部下多是游兵散勇，一会打鬼子，一会打中国人，是个摇摆不定、有奶便是娘的家伙。艾胡子与田胡子一样，也是占山为王起家，属于土匪类型的人物。张胡子好一点，后来起义了，率部参加了新四军。麻子是指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他脸上有几个麻点，大家都叫他何麻子，亲切，也有点戏弄。

青训队结束后，我去徐家杰的二支队任副官，当时徐家杰已有个陆副官，副官是个闲职，“老老实实当军需，吊儿浪荡当副官”嘛。可我不愿闲着，一心想打鬼子，对部队撤到浙江，还有点不理解。手中有枪，干嘛不抵抗？一次生病，我发高烧，说胡话。徐家杰告诉我，我说的胡话都是“打鬼子”。可见那时我的抗日热情是挺高的。

鬼子没打成，自己却挨打了。

游击司令部下属的几个草头王支队，因骚乱曾被浙东纵队打了几次，可改不了本性，仍在明争暗斗，抢地盘，拉队伍，想尽鬼点子拉大自己的队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事件，又发生了。竟吃到我们二支队的头上。

二支队与田胡子田蚰山驻防较近，隔一条河，田胡子就打起我们的主意。10月份的一天，他谎称司令部在他的支队开会，让徐家杰前去参加会议。徐家杰一到，便被扣住了。田胡子逼着徐家杰下令，让二支队缴械。徐家杰没办法，就说兄弟们不干，若晓得他被扣下，便会打过来。田胡子也不想付出代价，又经别的支队领导调解，徐家杰便被放回来。

徐家杰回到二支队，我们晓得情况不妙，开会商量，要提防田胡子。可是没提防住，徐家杰支队有通风报信的内奸。

中秋节过后的一个晚上，二支队的的一个中队长，叫王连生，带着老婆潘佳莲和他的中队坐船跑了。田胡子勾结魏显庭部，从王连生的防地摸上来，把二支队围住。天刚亮，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就听到外边有人喊“缴枪”。我晓得有情况，赶忙爬起来，带着双枪，我那时有一支很漂亮的德国造左轮手枪，跑出门一看，兵变了。

田胡子主要是想吃掉二支队的枪支，他的士兵和魏显庭的士兵，把我们围住后，派人传话，让二支队放下武器。队员不干，叛兵就喊起话来，限令我们缴枪，否

则就不客气。

情况紧急，一边喊“缴枪”，一边要拚命，眼看要打起来。打起来二支队准吃亏。徐家杰就派人找来县长孙云达，前来调停。孙云达没讲几句话，被田胡子手下的人扣下去。二支队的队员见县长被扣住了，向徐家杰请战，要拼个你死我活。田胡子欺人太甚，把二支队的战士逼火了。可明摆着，一打，我们准吃亏。徐家杰一家老小，也在包围圈里，他死活不让打。说“要留下子弹打鬼子”，队员们听了，说不打枪，与他们拼刺刀。叛军人多，一对一拼刺刀也能把二支队拼完了。徐家杰又劝说：不能拚，兄弟们拚光了，怎么打鬼子。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下令放下枪，丢枪不丢人。可让一个怒火满腔的战士放下自己手中的枪，太难了。队员们不听，还把枪紧紧握在手里。

我也不想打，不是害怕，是考虑到双方都是打鬼子的部队，鬼子没打着，自己却打起来，伤亡的都是中国人。这种窝里斗，是不能干的。我就给队员们说：不能打呀，我们都是打鬼子的，自己不能打起来。丢了枪可以再夺回来，丢了命可什么都没有了。不能打呀。

队员没有命令，不敢擅自开枪，也不放下武器。田胡子见我们不缴枪，便带人围上来，要强行缴械。他的士兵都喝了酒，酒能壮胆。一个矮壮的士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满脸通红，跑到我跟前，啪地一个立正，向我行个军礼，嘴喷酒气地说：“小叔叔，对不起了。”他不

敢下我的枪，就走向二支队的机枪手，去夺机枪。机枪手不给，两人就扭在一起。矮壮的士兵用刺刀，捅破机枪手的肚子，肠子都带了出来。机枪手临死前，身子一歪，扣动板机，枪口朝天，没打着矮壮的士兵，把人群打乱了。

我见队伍乱了，没法控制，便挥着双枪在阵前来回跑动，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可我的声音已被抢夺枪支的叫骂声和争吵声压倒了，他们也听不进去。局面难以挽回，我只好走了。领着徐家杰的儿子徐保亚、侄子徐保民、徐保王和陆副官，带着几支短枪，趁着混乱钻进芦荡。也有人拦我，但不敢硬拦，我敢发枪打他们，他们却不敢轻易对“小叔叔”下手。我的后台强大，他们伤了我，性命就保不住了。

我们几个人坐上一条小木船，来到一支队顾小汀的驻地。次日见到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他们得到兵变消息后，率部前来接应二支队。来迟了，未能接出来。徐家杰只好空着手，把部下，大都是上海附近的人，带回浦东，重整旗鼓。

三 蹲一次班房

在一支队住了几天，顾小汀便派一名警卫员，把我送到吴建功支队，吴建功又送我去浙东纵队教导队，我

在教导队的政治队当起文书，也当文化教员，教没文化的战士识字、学习。41年11月份，适应形势需要，浙东纵队在四明山举办学习班，我改名菊陶，去四明山受训。

后来听说延安曾来电报寻找王英林，名字对不上，我在基层，又经常调动，一直没能联系上。

43年夏，四明山受训后，我回到浙东纵队，在政治部文工团任班长。当时政治部主任是张文碧，宣传部长叫江岚。我们文工团归宣传部管，后划归政工队，在队长丁柯、政治指导员金虹的带领下，去敌方占领区章家埭活动，向国民党士兵演出进步戏剧，做统战工作。我是老演员啦，以前打过演戏的底子，有了底子就干得不错，一直干到44年春，我才离开文工团。

44年，战局发生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阶段。英、美联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苏联红军进军东欧，击溃希特勒，解放许多小国家。在中国战区，中国军队积极反攻，解放自己的国土，日本鬼子收缩战线，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44年4月，日伪对苏浙皖区的大清乡结束了，缩回大城市，乡村又成了抗日部队的天下。8月份，浙东纵队公开新四军番号，浙东抗日部队也结束了灰色隐蔽时期，打回浦东。我调到新四军淞沪支队下属的王荣贵大队当干事。

王荣贵是上海来的学生，是个进步的热血青年，“七·七”事变后，弃学从武，参加抗日部队，作战勇敢，很

快升到大队长的职位。可上级对他抗战前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这个人，平常的言行，又总不和领导保持一致。领导对他的身份便有了怀疑。一次，与日伪作战，王荣贵指挥不当，我方损失较大。领导一气之下，说王荣贵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把他关进了班房。审问几次，王荣贵坦坦荡荡，义正辞严，述说自己的爱国热情，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领导看。领导冷静下来后，想想他以前常打胜仗，又觉得他不象个内奸。但又不放心，就演了一场“苦肉计”，把我当小偷抓进来，关进王荣贵的班房、试探他的底细。

这就要猪鼻子插葱——装象啦。一进班房，见王荣贵满腹委屈地躺在铺上，我就凑上去说：“妈的，他们太不是东西，说我是小偷，我明明没偷东西嘛。大队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冤枉啊！”

王荣贵看我一眼，深表同情地说：“唉，你这算什么冤枉，没说你是内奸，就便宜你啦。”

我试探他，说：“都讲共产党的部队正大光明，你看看，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我们抓起来了。班房蹲到何时才算完呐？大队长，你干脆带我逃走吧。”

王荣贵不愿逃，他慢慢地摇了几下头，说：“不能逃。一逃更说不清了，不是内奸也成了内奸。”

“何必跟着共产党吃苦受罪？能逃出去，跑到鬼子那边，怎么也得给我们个小官当当。大队长啊，你就带我逃了吧，我受不了啦。”

王荣贵“腾”地坐起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气恨恨地说：“我看你小子不是小偷，是个内奸。”他正要揍我，门外偷听的领导走了进来。

我的演出也就结束啦。王荣贵继续当大队长，我继续给他当干事。有时说起这件事，还忍不住苦笑一下，叹口气。

四 放走一个坏人

战争是块土壤，我就是在这块土壤中长起来的，从一名学生，变成一名指挥员。44年底，我成为淞沪支队的一名军官，先后在南汇井中队，华山中队、泰山中队、衡山中队当过政治指导员。中队一建立，我就调去任职；等中队有了规模，领导又把我调到一个新建的中队。我不好说我有什么建队本领。我只是对战士们好一点，没有官架子，把他们当兄弟看待，团结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教育他们为祖国而战，为死去的亲人而战，坚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提高部队斗志。做政治思想工作，有的人一讲就是官话，让人听了不舒服，也就是没有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大义，祖国命运变成日常话语，讲给战士们听，才能打动他们的心。教育人，主要是教育人的心。心正，影子歪一点都没关系。一个斗志昂扬、正义在握、团结如一人的部队，是有非凡的战斗

力的。

战争考验人，它是一面镜子，能照到一个人的骨子，辨别他到底是勇士还是怕死鬼。抗日期间，勇士很多，但也不是没有怕死鬼。有一个共产党的县长，在白色恐怖中，请假回了家，不干啦，怕死。

45年春，我在衡山中队任职时，又碰到一个怕死鬼。他也是个小人，一想到当时没枪毙他，我就后悔。

这个怕死鬼叫白新龙，是个革命投机分子。他怕死，还想在部队混个一官半职。行军时，他总是昂头挺胸走在队伍前边，表现非同一般，可一打起来，他不是肚子疼就是腿疼，可怜巴巴地向领导请假。打完仗，病就好了。他这样做，一次还行，多了就露出怕死鬼的可怜相。45年4月，陈伟达、朱亚民率领淞沪支队主力500多人，从浦东开往青浦时，在蟠龙镇东南柿子园，与“忠救军”殷凡天部遭遇，是遇到埋伏，白新龙来不及请病假，就溜了，不知躲在哪里。那一仗，支队政治部主任曾平、参谋康则焘牺牲了。掩埋烈士遗体时，白新龙又凑上来，帮着挖坑，假积极，假悲痛，总之是假惺惺。可恶透顶。

45年5月，我们衡山中队探到消息：鬼子的运输船要从小蒸庄前的河道里通过，船上装着大批军用物资。据说还有不少机枪。机枪在战斗中的威力很大，可我们中队只有一挺鬼子的机枪。现在机枪送上门来，哪有不收下的。队员们劲头十足，纷纷要求伏击鬼子的运输船；当地老百姓，出于对日本鬼子的痛恨，也成群结队来到队

部，让我们给他们报仇。中队领导研究一下，就决定吃掉鬼子的运输船。

战前要开动员会，分配任务。陈队长刚讲完话，白新龙又愁眉苦脸地请病假来了，说肚子疼，老毛病又犯了。真是又犯了老毛病。可这种老毛病已骗不了人啦。陈队长扇了他一巴掌，又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蠢种！我就让你抱机枪，冲在最前边。你小子敢回头，老子就毙了你。”骂完，就让机枪手把机枪交给白新龙。

白新龙害怕了，病也好了。他望着陈队长发怒的脸色，只好接过机枪。不接，没好果子吃；接了，说不定还能逃出一条命。这种人，眨眼就能把这种得失算出来。

队伍在小蒸庄前的河道两岸散开。我和陈队长守在白新龙旁边，监视他。中午时分，鬼子的五条运输船开来了，全部进入伏击圈，陈队长朝白新龙的屁股踢了一脚，下命射击。白新龙开了枪，可没打起来，机枪象步枪似的，单响。鬼子还击，他们的机枪打起来，象鞭炮似的。我们的火力压不倒他们，虽然占据有利地势，打死11名鬼子，可我们也牺牲了5个人，淞沪支队参谋长奚长生牺牲了。鬼子的五条运输船，在他们机枪的掩护下，也逃了三条。没能全部缴获。

打扫完战场，带上战利品，老百姓掩埋了烈士的遗体，部队就转移了。陈队长气恨恨地把白新龙拉到我跟前，交给我，让我毙掉他。

我也很生气。机枪若发挥作用，战况肯定还会好些。

事情全坏在白新龙身上，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着没用。我执行命令，端着手枪，把白新龙押到一个芦塘边。

白新龙见我要枪毙他，一路求情，到了芦塘边，扑通跪在我面前，口喊饶命，说要立功赎罪，机枪没打好，不是他故意的，我们也看到了。又说他上有老，下有小，死了没人养活他们。我一听，心又软了。就放他一条命。

后来晓得，鬼子的机枪是讲究季节性的，在一定的季节，有特殊的用法。可当时不懂这些，机枪就打成了步枪。

我饶了白新龙一条命，可这小子后来差点要了我的命，老头子说得对：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呐。

五 喘了一口气，负了一次伤

45年8月，美国，当时是我们的盟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一颗原子弹，给日本鬼子致命一击。苏联老大哥结束在欧洲的战争，腾出手来，对日作战，8月8日，红军开进我国东北，攻击日本的关东军。日本鬼子招架不住，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整整打了八年，我们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单靠哪一方，都不

可能这么迅速战胜强大的日本强盗。合，也是历史的大趋势。

可是合起来，又很难。共同抗战，共赴国难，可以；可共享胜利果实，共建家园，就不行啦。这就象人“有难能同当”、“有福不能同享”。共同抗日，就应共同分享胜利果实，可蒋介石不让，以大家长身份自居，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却让国民党所属部队，积极推进，前去受降。共产党人又不是小孩，怎么说就怎么听。我们付出牺牲，就要分成。中央不听老蒋那一套，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占区推进，收复失地，接收日伪俘虏，占领不少中小城市。我们就是以这些中小城市和鬼子的装备为基础，与老蒋争夺天下。

打了八年，我们是不想打了，应该集中力量，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各民主党派也纷纷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可老蒋不干，他想一手遮天，消灭我们共产党人。想消灭也不是能一下子消灭了，要集结兵力，加强战备。老蒋为了作好内战准备，又抛出“和谈”的烟雾，迷糊我们。谈，就与他谈，共产党人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为照顾全局，又作出宽宏大量的让步。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江南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响应中央号召，顾全大局，撤到陇海线以北和苏北、皖北等地区。我们淞沪支队，同其它兄弟部队一起北撤，11月份到达苏中根据地。新四军编入华东野战军，我在华

野一纵三旅七大队三营七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任观杰是中队长。

到了苏中根据地，我们稍微喘了一口气，又开始整顿练兵。我们心里明白，不能迷信老蒋的签字，他根本没有和平建国的诚意、借着“和谈”的幌子，积极调动部队，要与共产党一争高低。我们要充分做好各方面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打内战的主动权握在老蒋手里，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

仅仅过了半年。到46年6月，蒋介石对我们解放区，由骚扰、磨擦，变成大规模侵犯。首先进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解放军，造成“惊人的胜利与奇迹”。随后，便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老蒋是吹牛，不知彼也不知己。人民解放军已不是当年的红军，鸟枪换炮啦。他要打，我们只好奉陪到底。

46年7月8月间，我们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在苏中泰兴、如皋、海安一带的八百里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结果是七战七捷，首创歼敌五万六千人的记录。随后转入淮阳和宿北，又吃掉国民党五万四千人。

胜仗也是用命换来的。宿北之战，我那个中队几乎打光了。

那是46年10月份，我们纵队把国民党的部队围在宿北沐阳，想打净它，拼命堵口子，阻击敌人突围。我

们中队负责守一个小山包，山包下，是敌人逃跑的必经之地，守住山包，就断了敌人的退路。守卫任务很艰巨啦。我和中队长一起去请示，抢到这个艰巨任务。任务一到手，推都推不掉。本来说对面是敌人的一个营，打着打着，才晓得敌人是一个加强旅。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也许战报是准确的，打起来，敌人又来了增兵。

敌人有增兵，我们没有增兵。打得很艰苦、很壮烈，也很惨。刚才还和我讲话，在阵地上欢蹦乱跳的战士，转眼就倒下了，永远起不来啦。真象做梦，那梦做一次就一辈子难忘。

那梦是用尸体垒起来的。阵地前是敌人的尸体，阵地上是我们战士的尸体。一个摞一个，成堆成堆的，血水顺着小沟向下流，真象一个小溪。

我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等待总攻的信号，可那信号迟迟不发。不发，我们就得守着，敌人就得进攻。我们的人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叶飞传来一张纸条，写着“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谢师长亲自督战，在阵地后，手端一支步枪，谁下来打谁。

打到傍晚，中队长负伤了，副队长和副指导员牺牲了，我的胳膊也挂了彩，是轻伤，轻伤不下火线。阵地上能站起来的只有八个人。八个人也得坚持。敌人的炮弹又飞过来，炸得尘土飞扬，看不见人。一打炮，敌兵就跟着冲上来。恶战又开始了。我在阵地上来回跑动，摸

到一个活人就喊“人在阵地在”，给战士们鼓劲、加油。能爬起来的伤员也爬起来了，没胳膊的、少腿的、断处露着白骨头的，有的一身伤了几处，全是血，象个血人。说着也怪了，打仗时，负伤不觉得疼，子弹钻进去，一麻，就过去了。有的人，下了战场才晓得自己负了伤。

我当时就不晓得自己负了伤。负伤的胳膊，打枪、挥舞、全不误。我在阵地上指挥战斗，跑动着，喊口号。摸到活人就让他起来打枪。战士们很坚强啦。我摸到一位小战士，他胸部负了伤，头几乎抬不起来，肩膀仍倚着被血染红的枪托子，我很感动，就说：“小兄弟，打吧。回头我给你请功。”他朝我艰难地笑笑。打退敌人的进攻，他再没起来，那一笑，也就永远留在我的脑子里。

两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总攻开始了，万炮齐发，飞向敌阵。大部队冲上来，敌人也反扑不了啦。我们中队完成了狙击任务。当时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枪从手里滑下来，劲使完了，胳膊也疼起来。

战斗结束后，我们中队立了集体一等功，我立了个人一等功。部队进入山东境内，我同伤员一起，在后方养伤。

六 给别人打仗，吃一通批评

有的人，第一次上战场，一枪打中，就永远倒下了；

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没伤一根汗毛；还有的人，多次负伤，就是打不死。我属于打不死的人，身上的弹孔补了又补，越补身体越结实，伤口处的肉就是硬。

在后方养好伤，我带着几名战士，背起小包袱，北上，追赶自己的部队。到了鲁西南，遇到一支正打仗的兄弟部队。

战士就是为打仗出生的，有仗瘾。我们循着零乱的枪声，悄悄绕过去，来到兄弟部队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一座土地庙里，哨兵盘向我后，我便走进去。

仗打得不顺，首长正在发火，他骂娘，挥手，那挥手的动作，很象扇耳光，我越看越眼熟。有人喊他“钱师长”，我忽然认出来了，他是我在少林寺拜认的师傅钱钧。

我走近钱师长，敬个军礼，激动地喊一声“师傅。”师傅当然认不出我这个徒弟啦。他满腹狐疑地打量我，我赶忙说：“我是钱贵，师傅。”

“钱贵?!”师傅一把攥住我的手，辨认我，当众扒下我的衣服，看清我身上的记号，说：“是钱贵。”他显然很激动，刚才的火气也化为乌有，问我：“你招呼不打就跑了，这么多年，都在哪过的?”

我简单地说了下自己的经历。师傅说：“中！能活下来，成为一名战士就中！”

话题转到战斗上面，我问在打谁。师傅告诉我：打黄经九。黄经九是个大恶霸，大土匪，在这一带烧杀抢

掠，制造方圆百十里的无人区，民愤极大。部队路过，就想打掉他。可一连打了几个晚上，没打下来，部队伤亡严重，主攻营的营长也牺牲了。

我就请战啦，对师傅说：“我来试试。”

师傅打量我：“你行吗？”

我说：“我可是个老兵啦，什么仗都打过。”

“好，你顶上吧，主攻营就交给你了。”

我先观察一下地形。黄经九住在一个大围子里，围子的墙又高又厚，墙边有水沟，沟前有铁丝网，戒备森严，易守难攻。黄经九的部下又多是结拜兄弟、打仗不要命的土匪，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

了解了情况，我制定一个作战方案。敌人总以为我们是晚上进攻。我就决定白天打；围子的北门薄弱，南门坚固，我就让一个营佯攻北门，自己带主攻营从南门打进去。师傅对我的作战计划很满意，参谋部一致同意通过。

天没亮，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埋伏下来，太阳升起来时，守了一夜的敌兵正想睡觉，北门打起来了，枪炮声一响，黄经九就急忙把兵力调到北门抵抗。我见时机一到，挥挥手，对主攻营的指战员们说：“北门打响了，你们上啊！”战士们一跃而起，冲了上去。敌人哨兵发现了，我们的机枪就打响了，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很顺，我们没有伤亡，就打开了南门。

门一打开，大部队就涌进去，一场激烈的巷战，歼

灭了大部分土匪，活捉了黄经九。这个大土匪头子被枪毙了。

师傅很高兴，给我评了奖，记了功。我不在意，带着自己的几名战士，回到自己的部队。领导听说我在归队途中打了一仗，很不愉快，问我：“你怎么给别人打仗？”

我说：“都是兄弟部队，我帮帮忙，有什么关系。”

领导就说：“你是我们的人，功要立在我们的部队，不能给别人立功。”

我一听气啦：“都是为了打败蒋介石，还分什么别人不别人的。”

领导说我强辞夺理，无组织无纪律，说不过我，就让我写份检讨交上去。妈的，打了胜仗，犯了错误。

七 伤 心

47年春，我们转战山东，打莱芜，攻泰安。孟良固之战，打掉了蒋介石的王牌军张灵甫，我们守在凤凰山上，打狙击。那也是一场恶战，我们牺牲了许多战士。

在恶战中，我没被打死，却差点被自己人整死。想想我就伤心。

47年底至48年初，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的“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

工作、查斗志。“三整”，指的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我们的军队是靠整顿建设出来的，上级是好心，可这好心一被下边的坏人利用，就糟了。“三查”、“三整”，出发点是好的，可查来查去，竟查到我的头上。

运动一开始，查工作查斗志，我受到表扬，有目共睹，我曾获“前方杀敌是英雄，后方养伤是模范”的称号。可翻开档案查阶级时，我糟了，我的档案里写着“该同志出身地主阶级家庭”。也不晓得是哪个写上去，颠倒了我的历史和出身。我成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嫌疑。

先是审问，我老实说出我的经历。可审查组的人，抓住根据似的，说我是地主的儿子，干妈是国民党宋庆龄，依次类推，蒋介石成了我的亲戚。

我就辩护，说我不是地主的儿子，是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儿子。审查组的人一听，哈哈大笑，说我有精神病，把我关押起来。

整我的人，一个就是从我枪口下溜掉的白新龙，另一个是一名侦察员，曾被敌人抓去又放回，在运动中表现异常积极，好象找到了立功赎罪的大好时机。

关押期间，少不了提审。提审的地点是刑堂，七八个人，审问我，让我老实交代。

我说：“我的经历和身世，党组织清楚。我相信党组织，他们是不会搞错的。”

“我们就是党组织，只晓得你是地主的儿子。”

“你们是群众组织，群众组织不能代表党组织。我要

申诉。”

“你申诉个屁，老实承认你是地主的儿子，快说。”

说不清，我就不说。他们动起手。我尝过国民党的刑法，又尝到我们共产党的刑法。

先是刘海戏金蟾，在我头上、肩上，放几碗水，身子一动，水洒了，耳光和鞭子就抽过来。一虎难抵群狼。他们一群人打我一个，玩的似的。我反抗，他们就把我捆起来，反吊在梁上，美名“老鹰飞”。真象老鹰，就是翅膀没张开。我的双手被捆住，鞭子棍子打来，也无法躲闪。

“我们就不信治不服你，快说。”审查组的人凶神似的，边打边问。

我几乎气炸胸膛，骂开了：“妈的，别说你们一个班，就是一个师，也休想整倒老子。你们不要过早得意。”

不骂还好，一骂又换了刑法。他们让我跪下，我不干，就被按倒在地，后腿上放一根粗杠子，杠子两边各站上四个人，名叫“八仙过海”。八个人，上千斤。我意志再强，脚吃不消。他们一上杠子，我的脚骨就折了，疼昏过去。

醒来时，我躺在班房里，浑身痛，神志清醒，就想：老头子发动这场运动，竟整到他儿子头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笑，可气，也可恨。他要是晓得我挨整，该有何想法？队伍不纯，有坏人，应该搞运动，可一搞运动，总被坏人利用，坏人没除掉，倒整倒了好人。这

才叫冤呐。这一辈子，最令我伤心的就是这次挨整。心伤透了。

队伍里毕竟还有好人，领导见我死不招供，也觉得我这个地主的儿子和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有矛盾。就要再考验考验我，把我放出来，下放到连队当战士。

关于我的身世，组织也作了认真调查。我下连队当战士，没多久，保卫股长泮平华，干事陈龙标就来找我，把我带到河南濮阳，听朱德总司令做报告。

听报告的人都是军官，朱老总讲了当前形势，对比敌我力量、说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马上要进入反攻阶段。我听了很激动。最让我激动的是，报告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一名团长，对着会场大喊：“王英林，出列！”

我一听，心就发酸，酸得难受，也坐不住了，身子一歪，躺在地上，泣不成声。心想：你们终于搞清楚了我的身世，苍天有眼呐。可王英林已经死了，心死了，还出什么列。我没有出列。保卫股长推我几下，我不理睬，会就散了。

回到部队。团长在晚上把我喊到他家，要和我谈话。我详细讲清我是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儿子，不是地主的儿子。他就说，以前搞错，让我原谅。

我心想：我能原谅打中我的子弹，但不能原谅整我的人。他们太狠了，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上刑，和土匪有什么区别？这帮人，是人民军队的蛀虫，却又是“积极分子”。好多事坏就坏在这种积极分子身上。

可不要把整我的运动积极分子都杀了，团长安慰我，说送我去延安，去见毛泽东。

可我已经不想见老头子了。

八 巧 遇

我是一名战士，心受到伤害，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丝毫无损。我拒绝团长送我去延安的照顾。咬破指头写了血书。要求参加战斗，只盼早日打败蒋介石，解放中国老百姓，别无所求。

我恢复工作，调到华野一纵三旅七团政治处组织股任股长。部队开始反攻。从北向南打。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休整一段时间，随后是“八万勇士下江南”，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团随大军南下，行军途中，师长谢忠良从后边传来命令，让我出列，在路边等候，接受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就是去组建水兵，准备过江。谢师长把我交给九兵团司令宋时伦。宋时伦命令我去安徽蚌埠至安庆一带的长江北岸，收缴船只，训练水兵。我来到安庆附近的农村。

这段时间，蒋介石曾要求“和谈”，利用“和谈”的时间准备兵力，加强长江防务，妄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大军南下，和共产党平分秋色。

我们也利用“和谈”时间抓紧练兵。过长江需要船只，长江北岸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烧毁，带走。我们四处寻找，动手造船，从战士中抽调水乡的士兵，组建海军。在长江北岸的湖泊，进行战前训练。

冤家路窄，亲家也路窄。那天几只国民党兵船起义，加入我们的阵营，安排好他们，我兴冲冲回到指挥部，进门见到了老头子毛泽东。

他是来前线巡视的，询问我们的布置之后，要和指挥部的全体指挥员，合影留念，鼓舞士气。我是一名指挥员，就和他在一起合了张影。

我当时不想认他。就是想认，一名普通军人，喊国家主席爸爸，也说不清。说不定有人又会讲我是精神病。更不巧的是，我没时间解释，刚照完像，敌机来轰炸扫射起义的兵船。他被人护卫着走了。我呢，怕飞机炸了船，就想把敌机引开，朝着一块开阔地，跑开了。别人不晓得我的意思，喊我“卧倒”，我不能卧倒，一卧倒，敌机看不见我就会发现船只。我拼命地跑着，敌机跟着我来回扫射，子弹嗖嗖地落在我的前后左右，就是没打着。最后我跑到一个河滩上，隐蔽下来。跑累了，在河滩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早上被冻醒，返回驻地。

驻地的同志们都以为我牺牲了，四处寻找我的尸体，一见我活着回来啦，高兴坏了。告诉我，我们的船只一条也没损失。那时，搞到一条船太难了，不难，我也不会冒着危险引开敌机。

九 来一个戴大口罩的人

渡江战役结束后，大军集结上海，组织抽调在上海工作过的指战员，组成主攻部队、我把海军交给别人，到上海郊区战地指挥部报到，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

电影《战上海》，把我们打上海的情况展现出来，但不全面。打上海时，有些江浙士兵，不干了，跑回老家，当起逃兵。部队杀了不少怕死鬼和落后分子。逃兵影响士气，尤为可恨。

49年10月，上海解放，我立功晋级，升到正营，任二十军教导营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在上海驻防。50年初，二十军成立教导团，我任四大队政治教导员。

50年夏天，那些留在身上的弹片，好象苏醒了似的，开始乱我身体的组织系统。我病了，住进上海五角场陆军医院。吴建功等人，已当上国家干部，前来看我，谈话之中，告诉我，我的生身父母是毛泽东和杨开慧，要送我去北京治疗。我不干，没去。

我没去北京，北京来人找我啦。中央卫生部的一位张副部长，到医院慰问伤病员，来到我的病房，询问我的身世，取了我的指纹，又看了我身上的记号，还说那记号是“中毒反应”。他一走，我马上转了病房，一个人住一间，条件比以前优越多了，门前还放了便衣哨兵。

没几天，我的病房就来了一个人，他戴着特大的口罩，罩住脸，由几名医务人员领着，来到我病床前，医务人员扒下我的衣服，让他看了我身上的记号。他没说话，我穿衣服时，他就走了。

看体型，我认得他就是老头子毛泽东。他是想认我。正要确定关系，朝鲜战争打响了。我出了院，随二十军开赴朝鲜战场。

十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被我们打垮了，美国佬不甘心失败，又想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与我们再次较量。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就不能熟视无睹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从上传到下，“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战争开始，人民解放军改称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我们二十军上去了。临行前，我作好牺牲的准备。欢送志愿军的人群挥着花朵，把我们送上火车，许多人让我们的战士签名留念，我给留守在南汇县的一名女同志写赠言时，写着：我是杨开慧烈士的儿子，万一我不幸牺牲了，请您转告祖国人民和故乡的亲人。我没提到老头子的名字，怕一提到他，有人不让我上车。

志愿军是支久经考验的队伍，跨过鸭绿江，就把美

国鬼子打退几百里。我们站住脚，准备再次进攻，临战前，开动员会，每个战士都表决心。我表完决心，又补充道：“我是杨开慧烈士的儿子，万一我不幸牺牲，请你们转告祖国人民。”

那时人们还不晓得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我不想提老头子。打仗嘛，每个人都要准备把命送上去，不论他是谁的孩子。我一提老头子，有人会照顾我，照顾，对一个战士来说，是一种耻辱。

入朝之后，中央也派人来找我。当时我是二十军六〇师政治部的青年科长，有一次，开青年会议，吃饭时，有人喊王英林，但不露面，躲在屋里看我的反应。你不露面，我也不会去找你，我只顾吃饭，吃完就走。

50年年底，去师部开会，首长传达大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我听后，当头挨了一棒，心里很乱。没想到大哥也来了，他从小也想当军官，打反动派，反动派没打完，他却先牺牲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啦。想起小时候，他那样子，我就心酸，心疼。但不能哭，正开着会，军人流血不流泪嘛。

一阵“为烈士报仇”的口号喊过之后，散会了，首长喊“菊陶留下。”他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见到李克农，杨国夫和杨秀生。他们看了我身上的记号，认出我是毛岸龙，就决定让我回国。

我听不进去。大哥刚牺牲，美国鬼子又欠下一笔血债，欠下我们家的血债，我怎么能放着鬼子不打，回国

呢。他们再劝我，我转身走了，不理他们。

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老头子赔上一个儿子，牺牲就算挺大了。我再搭进去，谁也不忍心。我理解他们的好意，可他们也应理解我，我要为大哥报仇。

朝鲜战场，我们伤亡惨重，不光是战场上的损失，还有很多战士，是被冻死冻伤的。实话说，领导对我有照顾，可一打起来，想照顾也难照顾了，谁知哪个子弹会从哪里飞来。五次战役时，部队打穿插，我没上尖刀连，留在指挥部。穿插是没有前后方的。最后与美国鬼子混战，指挥部也打散了。我带着两名警卫员，用短枪，边打边撤。火力不行，短枪打不过机枪。正跑着，美国鬼子的机枪扫来。从我腿间横扫去，我的两条腿都打中了，左腿断了大动脉，血流不止，昏了过去。警卫员以为我死了，就扔下我，冲了出去。我命大，昏迷时，血管被冻住了，血没流光。天亮时，醒了，是冻醒的。后继部队发现我，把我抬到担架上，救下去。

伤兵都回国养伤。我乘车来到沈阳，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我们成了最可爱的人，住最好的医院，受到很好的照顾。

我住进沈阳陆军医院，这所医院原是日本人的，还有许多日本护士，是战后留下的。她们对我们照顾得挺周到。日本女人温柔贤慧，当护士是较合适的。

郭沫若曾率领慰问团，来医院看望伤病员，他给我们朗诵了一首诗，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返回

战场。

腿还没有完全好，我就向医生申请出院，回部队去。医生不让，说“你没走到战场就得再抬回来”。还让他说中啦。我强行出院，返回朝鲜时，坐的火车遭到敌机的扫射，一节车厢起了火。我一见，就想：让它打死，不如逃命。我和一位班长跳下火车，这一跳，腿又站不起来了。可我没被抬回去。一位华侨发现我们，他把我背到一个山洞里，用草药给我治伤。那位华侨是山东人，还用山东方言和我们讲话。在他细心照料下，我的腿很快好了，回到部队。

回到自己的部队，首长们都以为我失踪了，见我平安回来，就把我从步兵调成炮兵。这番苦心我也是晓得的，炮兵的危险性相对说，比步兵小。我执行命令，到六〇师坦克自行火炮团任副团长。上任时，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为我接风。

在火炮团，与鬼子没有正面接触，相对步兵来说，我们是在后方。除了鬼子飞机的轰炸和炮击，没有别的危险，我在师部，是上层指挥员，比较安全。

就是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应敏。她原在宁波乡下教书，49年入伍，50年随军入朝，在师部当文化教员。我们的住处只隔一个山头，常见面，但没有恋爱活动。当时，我的老对象还在，她是吴蕴芝的女儿，后来病死了，没当成我老婆，我才和应敏自由恋爱。这已是归国后的事了。

52 年底，师长回国开会，让我跟他回去，说是执行任务，我不晓得他是骗我，就随他回到祖国。这一回来，就再没回去。我被安排到徐州华东装甲兵司令部，让我代训。

第十一章 钢军的继续： 和平年代的种种考验

军人离开战场，并没有离开战斗，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嘛。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教训了美帝国主义，稳定了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新的对手又来了，贫困、落后摆在国家面前。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亚于打败蒋介石。好在我们的人民有热情，听话，中央一声号令，全国便掀起了建设家园的运动，“三反”、“五反”，人民公社等新生事物不断出现。

部队也要建设。为了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支柱，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提高指战员的素质，我们创建起自己的军事院校，培养新形势下的指挥员。

53年2月，刚过完春节，华东装甲兵司令部的首长都曼令、曹鹤丹、郑梦治等同志，决定送我去学习。战争年代没能念好书，现在和平了，应把没念完的书接过来，补学补差吧，提高文化水平，学习理论知识。我从

徐州来到北京长辛店，进入北京装甲兵司令部下属的第一坦克学校第三期完成班，学习军事战术知识。这时学习就很用功啦，以前在战斗中接触过的东西，不懂，经老师一讲，就晓得了。有了实践，又学了理论，素质当然要提高啦。我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最好的指挥员。学习很刻苦，早起晚睡，挑灯夜战，成绩名列前茅，可身体不行，我的身上有很多枪孔嘛。学习班快结束时，我病了，就休了学。后来跟第四期完成班学习，参加考试，成绩优异，毕业典礼上，拿到合格证。也就是毕业证书啦。

一 不在意，沾上光

北京装甲兵司令部下属的学校都在长辛店。54年4月，我结束完成班的学习，分到第二坦克学校训练部教务处，任处长。也就是这时，我和应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互相满意，结了婚，婚后很幸福。自由恋爱嘛，找到的都是意中人，生活当然比较美满。可不尽人意的是，55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六〇师看到了自己的档案，上面的出身栏，仍写着我出身地主家庭。我很不高兴。战争年代过去了，留下的错误，应该改正，可他们没改。我就请求上级，改正我的身世。二十军的领导，也帮我找证人和材料，没过多久，领导就查清了我的身份。

查清了身份，还得再问问。二坦校领导林彬等同志，专门开了一次会，把我喊过去，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为了证明我不是地主出身，在那时候，讲阶级，地主出身的人，不论干得多出色，也是低人一等的。我讲出表明我身世的四句话：我的妈妈姓木易，湖南板仓名开慧，何键杀死在长沙，血海深仇我来报。证明我出身革命家庭。领导们很认真，问明我的经历后，申报中央。那时中央也在寻我，只是有时找到了，我又调动了工作。晓得我还活着，但行动不定。现在终于找到我的固定地点，就认定菊陶就是王英林，王英林就是毛主席的小儿子毛岸龙。我和老头子也就联系上啦。

我本想修改出身，没想到这一联系上，接二连三的事来了。沾了老头子的光。我觉着自己没变，只是改了出身。领导却觉得我变了，从一个普通少校军官，变成一个公子。

二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工作得很出色，我们决定把你调到中南海警卫营，去当教导员，授你上校军衔。”

我听了，不乐意。我在学校干得好好的，何必去中南海？老头子的光，我不想沾；你们想攀龙附凤，你们去，我不去。就对领导说：“我在这里干得很出色，就让我在这里干吧。我不想调动工作。”

领导见我不想去，又变个花儿照顾我，再找我谈话，说：“送你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吧。到了学院，你调到中

校，毕业后，再调到上校。”

学习我是想去的，多学一点知识总没坏处，可一听到调我军衔，很反感。打了许多年仗，立了许多次功，不调我。现在要调我啦。有功不受禄，我无功干嘛受禄？心里很不舒服，不舒服我就不会干啦，婉言说：“我的学习基础差，到了军事学院怕跟不上，还是让别的同志去吧。”我又给领导推荐了一串人名。

领导还是想照顾我。调动工作，送去学习，我不干，他们又让我转业，到中央农村工作调查组去任职。这也是中央的意思啦。那是个有权的位置，提升快。可我是个军人，打了一辈子仗，是自己打出来的，工作家庭都不错，已经满足了，“自能成羽翼，何必仰天梯”？我不去，说“那个地方不适应我这个军人。”

领导们关心我的工作，没关心成，又关心起我的家庭。我的大孩子出生不久，一位领导把我叫到他家里，组织科长和保卫处长也在，关上门，你猜干什么？劝我离婚。

领导先问我：“你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我很干脆：“很好！”

组织科长说：“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应找个门当户对的妻子，这也是组织的安排。组织决定，把我们敬爱周总理的养女介绍给你。”

保卫处长命令我似的接着说：“你马上和现在的老婆离婚。”

这算什么事！新中国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新事新办，自己找到爱人，结婚生子，却让我马上离婚，找个门当户对的。门当户对不是封建社会提倡的吗？就是你提倡封建社会的这种门户观念，我这个野孩子似的人，找一个平民的女儿，也算是门当户对。我对他们的“好意”很反感啦，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毛主席的孩子，就觉得我的地位升高了。老实说吧，我没觉得自己的地位提高，就是提高了，高到天上去，对我爱人来说，我还是她的丈夫。”

他们见我不要吃那一套，就好言相劝，说都是为我着想，为我的前途考虑，组织是一片苦心，希望我能理解、服从。最后又说：“你现在的这个老婆有毛病，神经不正常。”

我火了，问他们：“我和她在一起生活这么久，都没觉着她有毛病，你怎么晓得她有神经病？我看你们才有毛病！”我起身就走，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这样照顾我了。

学校领导的照顾被我拒绝了，中央领导的照顾又来了。对于他们的照顾和关心，我觉得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就领情；不能接受的，就谢绝。周恩来总理给我发个请帖，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加官晋级，我就去赴宴了。邓力群同志给我签发一张中南海的出入证，想让我常去看看老头子。出入证我接过来了，但不常去。中南海是高级领导人住的地方，我这个普通一兵，去干什么？我和老头子又没什么感情，见

了面，谈谈什么？他的话，我不一定感兴趣；我的话，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话不投机，不如不见面不说话，免得尴尬。他有他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谈笑风生，不亦乐乎，何必去找那个尴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可不是一见老头子当了国家主席就和他有了感情的那种人。感情这东西，是相处来的，不是地位能带来的。

二 接收四万万同胞

我不常去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同志也有来往，有时碰到非去不行的场合，就能见到他们。象朱老总、周总理、陈云、邓小平、康生、陆定一、杨主任杨尚昆，见了面，我是小辈，该喊叔叔的，喊叔叔，该喊伯伯的，喊伯伯。他们待我都很好，就江青，对我冷淡。我晓得她在上海的底细，她当然从中作梗，不想让我和老头子相认。一次，我和吴仲超在西单的一个饭店吃涮羊肉，她带李纳去吃炸酱面，顶头碰上，她没招呼我，我也懒得理她。

空闲时，我常去吴仲超家，我们是老熟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他带过我。他妹妹吴蕴芝的女儿，就是我的老对象。虽没结成婚，总算沾点亲戚关系，我去他家也算走亲戚。那时，他是文化部助理部长，他妻子在

战争年代为掩护他牺牲了，他发誓终身不娶，住单身。也有情人啦，只是我不晓得她是谁。表面上，他是个单身汉。单身汉住一个大房子，少不了人来人往，象个俱乐部似的。

在吴仲超家，也见到不少保护过我的前辈，象宋庆龄、胡乔木、茅盾、周扬。一次，还见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喊我“小公子”，还有什么事似的，约我下个星期天再会。

下个星期天，我如约赶到吴仲超家，溥仪早在那里等我，见我进来，便带我走进一间房里，神秘秘的，有点迂腐。关上门，让座后，对我说：“小公子，我是个战犯，人民的罪人。要感谢老人家不杀之恩呐。”

他很诚恳，让我搞不清他到底要干什么，便说：“你不能感谢他一个人，要感谢我们的政府。我是个普通老百姓，你也别叫我小公子。”

“是是是。感谢人民政府。现在我劳动改造完了，成了共和国的公民，有资格把这个交给您了。”他拿出一个笔筒似的东西，古香古色，里边装着一把桔杆，双手捧给我，一片诚心地说：“这是四万万同胞，就交给您了。我真心盼着，您们能把咱们的国家治理好，不再受洋人的欺压，使普天之下的百姓，安居乐业，颐养天年。强我中华，盛我国土。”

我接过那个“笔筒”，也接过了他的一片心意，说：“我会尽心尽力建设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国家。谢谢

您啦。”

“我是老朽了，以后就看你们的啦。”他的眼睛里，满是期望的神色。其实，谁不想强盛自己的国家？就是让他再当皇帝，从他内心来说，他也不想使天下的百姓没有饭吃。“位卑不敢忘忧国”，位高更应忧国忧民。

溥仪的一片诚意，给我带来了麻烦。“文革”时，“革命战士”从我家抄出那个“笔筒”，认出那是个封建社会的坏东西，给我罪加一条。可他们却把那个坏东西当成好东西归为己有，“革命战士”中也不乏识货之人嘛。后来听说这个“笔筒”流落到日本人手里，不晓得是真的假。

那是珍贵文物，我当时不晓得，要是晓得，早“坚壁清野”啦。流落到国外，太可惜。

三 解放台湾再回家与一通虎威

那几年，我和老头子的关系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示：若即若离。以前他不是看不惯我吗？现在我也不攀他。对他来说，我这个儿子可有可无；对我来说，他这个老子也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不是完全没有。毕竟有血缘关系，老头子心里有我，也想见见我，可他，是绝不会亲自出马的。

56年12月初，学校保卫处长丛树生把我叫到保卫

处，交给我一封信。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的寄信地址被涂掉了。我便问：“这是谁涂的？信是谁寄的？”

丛树生便说：“这是我们的保密工作，你看看信吧。”

我挺不舒服地撕开信。是李纳寄来的，告诉我“爸爸过生日”，让我回家吃饭。我晓得这肯定是老头子的意思，他不发话，李纳也不敢让我回家。可我也不是那种招之就来、挥之就去的人。再说，这信是让保卫处转交的，还涂了地址，怕我泄密。怕我泄密，就是不相信我嘛。我不去，总泄不了密了吧。我把信扔给丛树生，说：“我不回信了，也没法回。你替我转告一声，等解放台湾，我再回家。”

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6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就加紧战备，准备解放台湾，喊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口号，我把这句口号当成拒绝回家的理由。没料到，还让我说中了。直到今天，台湾也没解放，我还在家的外边。

我在学校是教务处长，也给学员们上课，讲战术。12月26日，就是老头子生日那天，学员结业考试，我监考。吃过早饭，我戴上大盖帽，走出家门。正走着，一辆华沙小轿车“吱”地停在我前边，挡住去路。我正疑惑，车上下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穿着便衣，开口便说：“主席今天过生日，他老人家让你回家吃饭。”

我说：“我有事，不能去。”

那位女的说：“主席一年才过一次生日，你还是去

吧。”

我心里别扭起来，便问：“一年过一次还嫌少？中央组织部有文件，不准过生日，不准做寿，不准请客送礼。那可是主席同意的。”

那位男的挺严肃地说：“主席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想震住我，我就不吃这一套！回敬他一句：“我的脾气主席也是晓得的。”

女的软了，劝我说：“还是回去吧。我们是特意来接你的，你不回去，我们完不成任务。”

“我要给学员监考，要是去了，我也完不成任务。”

“监考可以换个人去嘛。”

“他请客也可以请个别人。”

说着说着，声音大了。那位男的问我：“你到底回家不回家？”

“今天就是不回家！你想怎么着？”

“你认不认这个爸爸？”

“今天就是不认！他能把我怎么样？”

这就是口角啦。说不过我，他们就动起手，男的拉，女的推，让我上车，把我的帽子也弄掉了，差点把我推倒。我火啦：“你们要绑架？”

男的说：“今天就得把你拉回家。”

我死活不进车门，正挣扎着，扭头看到站岗的卫兵，便大喊一声：“你过来。”

我们在这里吵吵嚷嚷，卫兵也注意到了，听我喊他，

便提着步枪正步跑过来。一男一女，见卫兵跑来，也放开手。我捡起帽子，拍打拍打，扣到头上。

卫兵跑到跟前，“啪”地一个立正，向我敬个军礼：“首长有什么指示。”

“你看到了吧？这两个便衣要拉走一个军人，是怎么回事？你这个卫兵管不管？”

卫兵就问那一男一女：“你们是什么人？”

我把手一挥，虎声虎气地命令卫兵：“别管他们是什么人。先把他们抓起来盘问盘问。问清楚再放走；问不清楚，就把他们扣下。”

卫兵“是”了一声，把步枪一摆，对一男一女说：“走。”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我虎声虎气地扣下一男一女，那一男一女回去告诉老头子，说不定还要添油加醋，老头子肯定要发一通虎威。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让两只老虎在一个桌上吃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啦。没过多久，中南海就传出话来：敬酒不吃吃罚酒，要是回到中南海，先打三十六下杀威棒，再关禁闭蹲猴房。

在延安，老头子打我十八下吹火棍，这次要翻一番。我不去，总打不着我了吧。

可后来想去，也去不成了。

四 建议与封嘴

老年人羡慕青年人，总说“一事能狂便少年”。56年，我不到30岁，还不老嘛。身上少不了年轻人的狂劲。狂，这狂可不是疯狂，是一种激情，里边也有意志和自信。人有了自信，就有了胆量，敢想敢干，敢于直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敢于直言的人，这些人也大都是因为直言，被罚被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仁人志士、忠臣清官。

我不是讲假话的人，也不敢自称仁人志士，可也是因为直言，倒了霉。在新中国，倒了霉比封建社会绑赴刑场要好一点，我这倒霉也不是政府所为，是老头子的一句话，象如来佛压孙大圣似的，把我压在一座山下。

57年，一些右派分子，乘我党整风之机，鼓吹“大鸣大放”，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开始了反右斗争。我们学校来了工作组，是总政的人，共有七八个。开会，学习，搞运动。稍微有点过激言论的人，都判成右派，批斗。有的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惯的事，就要讲出来，不讲出来，憋在心里难受。事情坏就坏在我这张嘴上。

那一次，学校政治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总政工作组的人，和学校党员干部，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商量反右斗争的战略部署。会场就是学校的小会议室，贴满标语口号，气氛很严肃，现在想想就有点可笑了，先

喊“毛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听了这口号就别扭，不合实际，我是晓得老头子的身体状况的，这句口号，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听烦了。会上，领导让我发言，我就讲啦：“同志都讲毛主席身体健康。我晓得他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他低血压，有严重的胃溃疡，身体不是太好，应让他老人家退居二线，掌舵压阵，由周恩来总理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当党的主席，陈毅老总当总理。”

这一席话，象个炸弹，把会场炸翻了。他们反驳我说：“你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他怎么能游过长江去？”

56年，老头子在武汉游过长江，震动全国，举国上下欢呼他“身体健康”，可他明明有病嘛。我就直言了：“正因为他老人家有病，才去游长江，做个样子，给人看，让人相信他身体健康，继续当主席。”说完，我又补充一句：“有那么多人保护，谁游不过去，老太太都能游过去。”

会议没法开下去啦。按那时的标准，我这已不是右派，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阶级敌人。可他们也不敢轻易给我扣上这顶大帽子，要请示中央，请示毛主席。老头子听到我不让他当主席的传言，肯定会怒发冲冠。

三天后，学校召开处长级以上的干部会议，是专门为我开的批判会，把我的直言定为反党反中央的言论，还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我不服气，我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嘛，说了几句实话就定我是“敌人”，那我以前打的敌人不都成了他们的朋友啦。我想发言，表明我的衷

心，可举了三次手，他们就是不让我说话。群情激愤，一顿猛批。批了半天，他们也累了，了解我身世的人便说：“是谁把你养大的，你忘了本。”

说这句话的人，以为我是毛主席的儿子，儿子都是老子养大的。除了在延安吃了他一顿饭，我这个生身父亲可没养过我。给我饭吃、给我衣穿、保护我养育我、为我流血牺牲的人，都是那些普通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正因为忘不了他们，我的心中才找不到老头子的养育之情。

听了这话，我又生气又难过，便说：“我没忘本。养活我寻找我保护我的人，我都记得。就是不记得生身父亲。我在马路要饭时、挨打时、别人卖我时，他在哪里？他管生不管养，根本就没有照顾过我。这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说完，我就退出会场。

人小时候，年幼无助，最需要慈父祥母的温暖，需要父爱母怜，可我没有。最需要的时候，没要到；长大，也就不需要了，也不想要了。生身父母不养自己的孩子，孩子长大就与他们没感情。我对老头子不但没感情，一想到我经历的苦难，想到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就生气。这当然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他没尽养育的义务，是因为他一心扑在中国革命上，领导人民打下新中国，功德无量。可他功劳再大，我的觉悟再高，也不能改变我这种心理。这是人性。

老头子下令批判我，也有人保护我，是周总理。批

判会召开的当天晚上，我就被一辆小车接走了。后来听说，学校领导准备对我再次批判，已让几个积极分子背熟了批判稿，第二天找不到我，没批成，前功尽弃。

58年夏天，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右派批倒了，左派又上来了。从58年5月份起，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学校竟把旧装甲车拆了，扔进炼钢炉。旧装甲车修一修，还可以用嘛，至少可当教学用具，何必再炼掉，重新制造？真是无知。在一次“大炼钢铁”表决心大会上，我说“这种做法不科学，劳民伤财。”一句直言，我又受到批判。我的话还总有人通风报信，传到老头子的耳朵里。积怨就越来越多啦。

一次，在上班的路上，碰到来学校做报告的朱老总和赖传珠，他们坐在车里，老远就喊“王英林”，我没看清是谁。那时候好人和坏人是混在一起的。不清楚，就不敢走过去，也没理他们，快步离开了。这是不礼貌啦，也给老头子带去了怨气。

尽管老头子有怨气，中央里还有人想培养我。60年，我们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波兰过建军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去发表讲话，向波兰军人表示祝贺。当时我是个中校，一个中校代表中国几百万军人向一个兄弟国家的军人表示祝贺，我觉得是抬高我了。

在这段时间，对一些社会现象我还是有抵触情绪，心直口快，话多必失啦，难免捅出一些漏子，在老头子的眼里，我好像是稀泥糊不上墙，儒子不可教，糟糕透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捅的洞子越来越多，还挺大，何况还有江青拒我门外，老头子更觉得我这个儿子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我们的关系就算崩溃了。

后来，谢富治、刘湘萍等男女来到学校整顿工作，带来了老头子的指令。他们一走，校领导就找我谈话，传达主席指示：“以后你不要再讲你的身世了，也不能讲你是王英林。”封了我的嘴。一封就是许多年呐。但我这个人，是妈妈生过的，怎么处理？这边一封，那边就传言，说我失踪了、死了。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何况那时老头子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笔者附言：主席青年求学时，曾写过一篇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贴在长沙学堂的墙上，提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半个世纪之后，本文的主人公对中央领导的组合提出类似的建议。真巧。

五 藕断丝连：华沙小汽车

北京呆不下去，我只好走了。走，也不是随意乱走，有组织安排。60年底，我离开北京，到了洛阳，在洛阳军委装甲兵第六坦克学校训练部，任副部长。干了一年，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反攻，加强海防，部队南移。62年洛

阳军委下属的第六坦校与第三坦校，合并成一个学校，迁到浙江省江山縣，校长是黄策同志，史世屏任政委。学校办得不成功，不到一年便下马。人员另找工作，我没地方去，便被派到山西大同装甲兵学院学习。

临行前，黄策和史世屏找我谈话，本以为我要走了，他们要讲一通让我好好学习之类的鼓励话。没料到，他们一开口，让我大吃一惊。

老头子用稿费买了三辆华沙小卧车，二哥毛岸青一辆，李敏李纳一辆，给我一辆。

不是封口了吗？还给我买车干什么？是想拉拢我，让我负荆请罪，恢复关系；还是念父子之情，真心照顾我？不管老头子出于什么目的，那车我没要。我级别不够，走路也走惯了，坐在里边不舒服。

黄策问我：“老人家给你买的車，你不要，怎么处理？”

我说：“交公。给学校门诊部，用它接送伤病员和产妇。”

政委史世屏很有顾虑地问：“是不是征求一下老人家的意见。”

我不太喜欢前怕狼后怕虎的人，说：“不用。他给我买的，这車就归我了，我有权交公。你们要有顾虑，就告诉他这車我要了。”

黄策很激动，表扬我：“你要車不坐車，一心为公，我代表全校同志，谢谢您啦。”

“还是感谢毛主席吧。”我说。

为了表明我是华沙小卧车的主人，政委又提议：车随人行。我到哪个单位，这辆车就交给哪个单位。反正单位都是公家，我交公，交给哪个公家都行。我赞成他的意见。

可后来并没有“车随人行”。那辆小车现在在哪里，是否还有，我就不晓得啦。

63年2月，我去大同装甲兵学院第十期完成班学习，学期为两年，64年底毕业，分到济南军区二十六军坦克二师工作，没干一年多，到65年春，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和济南装甲兵司令部政委罗通，又把我调到装甲兵处，当处长，给我一个任务：筹建坦克八师。

筹建一个坦克师，可不是筹建一个步兵师，困难很多，也不用讲啦。筹建完毕，我病倒了。有病就去找医生，谁知找到一个二百五，也不晓得他是给我吃错了药还是打错了针，反正是“误诊”。误诊比生病更要命，我卧床不起，休息一年。站起来时，已是68年了。

六 “清队”重点对象

老头子一挥手，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派哄起，造反派、保皇派、革命派，五颜六色。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经过一左一右的中国，又乱了套啦。

我参加的运动多了，也看透了，哪一派也不沾边。他们游行，我不去；他们呼口号，我不喊；他们斗人，我不参加。

我不斗人，人要斗我。逃都逃不掉。68年夏天，军区专案组的人找到我，让我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说“学习能提高觉悟。”本以为学习班是个避风港，一进去，才晓得受骗了。学习班里的人都是“清队”的重点对象。

专案组的成员十分复杂。我不晓得他们要玩什么鬼把戏，又担心他们从我这里搜集材料去整人，对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闭口不谈、只字不提，只表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

他们就是让我开口的，想从我嘴里掏出中央某些领导人的材料，中央里边也在斗嘛。我不开口，他们是有办法的。

先是审问，问我家庭出身。

我说：“我不是清队对象，”想了又想，又老实回答，“我出身革命家庭。”

“不对，你老实交代。”

“那我出身地主家庭。”

“也不对！”

左右都不对，我生气了：“那你说吧，我出身什么家庭。我服从你们的决定。”

他们是成心整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不对，恣

度就不老实啦，不老实就是罪过。他们硬说我“破坏文革的战略步骤”，让我“坦白从宽”。

我上火了：“坦白什么？我的一生组织都是清楚的，你们问组织去。”

“问哪个组织，它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队伍？我们就是组织，要清除其它所有的组织。”

我大声向他们：“你是哪一个组织？你是哪一个阶级？清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队伍？清哪一个队伍。”

“我们是共产党，是革命群众，是无产阶级。怎么，你还怀疑我们？”

“我就信不过你们这样的党和群众！”

我肚里有火，是压不住的，一放出来，就烧着自己。审问不下去，就变相体罚，有的体罚是凌辱人格的，一些人受不了，就上吊了。我能忍受，但也不想长期受下去，他们让我写材料，让我写清过去工作中接触的人物。我就写了，捡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再胡编乱造一些化名，交了上去。不晓得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谁的材料、整谁。看了材料，当然没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说我“戏弄革命群众，态度极不老实”，最后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把我送进农场劳动改造。

文革中的事，上级不让涉及太深。我就不多谈了。

林彪摔死后，我结束劳改生活，因劳动卖力，表现良好，重又回到济南军区。我向军长赵峰和新来的专案组常组长讲了我的身世和经历。赵军长又让

我写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他。我一一照办，要求恢复工作，但想换个地方。赵军长问我想去哪里，我就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生活惯了，让我去浙江吧。赵军长亲自去杭州，找省、军区领导，给我调动工作，把我安排到浙江军区炮兵处。转组织关系时，因个别领导不同意我调动。我的关系几年之后才从二十六军转到浙江军区。

我身体不是太好，78年后，生了病，就在家休息。后来军区调我去独二师当政委，我不想干啦，干了一辈子，也该歇歇啦。年轻人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让他们去干吧。

第十二章 结束语与新序言

他的独白到此结束。我补充几句。

打倒四人帮后，他明白“与老头子相认，至少没人敢斗我”，可是已经晚了，老头子不在了。主席不在，也就没法认他。

他做过努力。79年，全国开始对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他上报自己的身世材料，要求领导按级上呈，直至中央，请求组织本着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启封他的档案，调查核实，恢复他本来面目。可不幸的是：他相信组织，组织不相信他。军区党委在他的材料上写了三次批语，说他虚报党龄、军龄，对他的身世也没做结论。还让他签字，就那么定音。他没干。

他不干，别人就不让他干。现在他一无离休命令，二无军衔、身份比较特殊地闲在家里。种草养花，修心养性，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是准备保卫，他说：“我是一名老兵，内战是再也不会打啦。若打世界战争，我一条老命送上去，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这话是从海湾

战争引起的，尽管很忙，我们每天都看国际新闻，关心天下大事。从今天美伊战争——他说是世界战争，我说是地球村的内战——谈到他经历过的战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苍海桑田，不能改变的是：他是一个军人，什么也动摇不了他保卫祖国的志向和决心。

他家庭美满，有一儿两女，并当上了外公。令我吃惊的是，除了他老伴应敏，孩子们均不知道他的身世。说句戏言：他象一个高级特务潜伏在家中。我采访他，是偷偷摸摸的，象搞地下工作。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关上门，他讲我记，孩子们一回来，立即停止。我不理解地问他干嘛这么神秘。他说这是教育子女的一种方法，让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工作吃饭，做一个普通人。孩子们也遂了他的心愿，儿子是印刷厂制版工人，女儿也在工厂工作。

他是一个隐名人，经历犹如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流，回旋、跌宕，布满漩涡和恶浪。

我象一条光滑的鱼，在他喧腾或呜咽的声音里，游过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沉重来临，十多个紧张的日子，若一堆五颜六色的石子，哗哗啦啦，丢进我的脑袋。

采访，如释重负地结束了。黄昏时分，我心情畅快地走出他的家门，沿着保一叔路，走到久仰的西子湖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西湖。眼中的她与传说中的她相差无几，美不胜收，而我，却坐在湖边的石凳上睡着了。

疲惫的是身体，沉重的是脑袋。出生在一个伟人的

家庭，是幸福？还是不幸？

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在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幸运的光环。他那伤痕累累的躯体，倒让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几千年前的一场对话。

庄子和惠子，袖着手，相对盘腿而坐，中间是一个茶壶两只茶盅。

庄子口若悬河，发表高见，惠子听了却皱起眉头，无限伤感地说：“我有一棵很大的树，名字叫樗。它的主干，木瘤盘结；小枝，也都凹凸扭曲，完全不合乎绳墨规矩。这树就生长在路边，却从没有木匠去理会它。”他停顿换气，望着庄子，“你的话就跟这大树一样啊！大而不当，没人相信。”

庄子听了，失去学究的体统，拍手称快，开颜大悦，连声说：“对了对了。这树既然无用，也就不会有人来砍伐，你自然也不必操心了。对樗树来说，它的无用之用正是它本身最大的用处。你有了这么一棵大树，何不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在遮天蔽日的荫凉下盘桓、休息？这样何不快哉？”

惠子若醍醐灌顶，亦拍手称快，开颜大悦。两位老先生一下子变成两个小顽童。

庄子的意思是：正直的树总是要被砍伐的。他的话里不知有无这个含义：正直的人亦然。先生的话太深奥，非我后生理解得了。还是回到现在吧。

春节象个快乐的孩子走进千家万户，也毫不例外地

走进他家，并要在他的年龄柱上刻下深深的一刀。过了春节，他64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时间对他这位老人来说，是宝贵的。他不想稀里糊涂去见马克思。我们英明的马克思也不要身份不明的人。

出于对主席的热爱，全国人民都在关心他，他还要隐蔽多久呢？

两个月之后，我写下了以上的文字，本人才疏学浅，一无嚼纸喷墨之神奇功能，二无海阔天空的幻觉本领，只是老老实实、记录他的经历。

我出身寒门。从小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做主席的好学生。热爱主席。热爱的程度令现在的小学生们难以想象：76年，广播主席逝世的那天下午，我和我的两个小表弟正嬉戏在一片一望无际的青青的庄稼地里，大喇叭一响，仿佛天塌地陷。我们惊呆了，我说：毛主席死了，我们也别活了。我们都一屁股坐在地上。这种热爱至今也难以消失。

我从小爱玩打仗，做泥枪、抓特务，还在一块活血止痛膏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神气活现地贴在胸前衣袋上方。我第一个理想就是想当解放军。对这个钢军，当然有崇敬之意。孩子时的心理，对长大后也有影响，但不会左右或控制。受到党的教育多年，觉悟也有所提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在热爱与崇敬之间，我选择真实。我们需要真实的历史，不论国家还是

个人。

那些带过这个孩子的叔叔伯伯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还记得这个孩子吗？这个孩子已在战火中成为一名钢铁战士，现在家隐居。

那些知道他的经历的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愿意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吗？愿意证明他吗？

资料，为了彻底搞清他的历史，我需要更为翔实的资料。恳请知情的人们，关心他的人们，向我提供，拜托了！

编 者 的 话

领袖毛泽东和他的第一夫人杨开慧，共有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长子、次子行踪昭然，唯有三子毛岸龙鲜为人知。自从与两个哥哥失散后，萍踪无定，时现时隐，生死茫茫，众说纷纭。有人云他夭亡，有人说他失踪，有人传他神经……真可谓一条龙，一个谜，为华夏平添了几多话题！

然而，毛泽东逝世之后，一位自谓毛岸龙的老人赫然现身，消息不径而走，传遍千家万户，一时竟成了新闻热点，于是出现本文作者这次颇具卓识的采访。

本书便是这次采访的忠实记述。书中有记叙，有描写，有分析，有理解，有不同的令人警觉的思考。

但它确是自称是毛岸龙的老人的真真切切的人生经历。

也许有人说，把死人说活，纯属文学的浪漫；

也许有人说，领袖的儿子，神话般失而复现，有如臆语；

也许有人说，把疯子的胡说，权当历史，是理智不全……

随您怎么想，都不要紧，您只要将本书捧读便可。因为“我们需要真实的历史，不论国家还是个人。”

作为一个记者，“我选择真实”。本书仅仅是一次真实采访的再现。作为一种资料，跳出了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世俗之网，难道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当前，毛泽东的研究热风靡全国、全世界，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为这个热点的研究，提供一份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